

天下第一家



威爾基著
劉尊棋譯

中外出版社

一四九三

目次

引 言	一
第一章 艾爾阿拉敏	三
第二章 中東一瞥	一三
第三章 土耳其——一個新興國家	三〇
第四章 我們的盟國蘇聯	四二
第五章 雅庫次克共和國	七三
第六章 中國繼續在抗戰	八二
第七章 中國西部的開發	八八
第八章 自由中國用什麼抗戰	九九
第九章 中國的通貨問題	一一九
第十章 善意的貧庫	一二五

天 下 一 家

二

第十一章	我們爲什麼而戰？	三〇
第十二章	這是解放的戰爭	四四
第十三章	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	五一
第十四章	天下一家	五九
譯者跋		六九

前言

我於八月二十六日（一九四二年）搭乘一架四引擎統一式轟炸機，由美國陸軍軍官駕駛，離開了紐約的米契爾飛機場，週遊世界各地，看看各個戰場，各國領袖和人民。過了四十九天以後，在十月十四日，我返回美國，着陸於米內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我這次環行全世界，並不是僅僅經過圓週較小的北緯，而是兩度穿過赤道。

我旅行了三萬一千英里，單就數字而言，的確使我很驚異，甚至感到有些迷惘。原來我這一次旅行的總的印象，最深刻處不在於和其他各國人民間的距離。而是和他們的接近。如果我對於世界變得小了而且完全是相互依賴的這件事還存有任何懷疑，那麼，這次旅行就把這些疑雲一掃而空了。

一件不平凡的事實，是我們走完這樣長遠的路程，在空中的時間總共不過一百六十小時。我們在途中每天通常航行八小時至十小時，這就是說，我有三十天左右的時間完成我預期的目的，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這個大陸到那個大陸，身體的移動並不勞苦，不過像一個美國商人在他的生命中的任何一天為做生意而旅行一樣罷了。真的，在世界上走來走去已經是如此之容易，甚至我竟允諾了中部西伯利亞一個大共和國的主席，說在一九四五年某一個週末我將飛回那裏，打一天獵。而且我當真希望實踐這個約會。

世界上已不再有什麼遙不可及的地點了。從這次旅行中我知道遠東許多萬人口和我們的相距之近，宛如洛山磯乘最快的火車到紐約一樣。我禁不住相信，從今以後凡是涉及他們的事情，必然涉及我們，猶之乎加皇福尼亞人們的問題也使紐約的人們不能忘懷一樣。

將來我們的一切想法必須擴及全世界了。

第二章 艾爾阿拉敏

八月底我們往開羅途中，不好的消息接踵而來，在尼及利亞的加諾（Kano, Nigeria），人們公開估量着還有多少天隆美爾將軍便要將他的前頭部隊推進幾英里而攻佔虛歷山大城，當我們到達哈爾瓦（Khartoum）時，這種估量已變成爲言之隆隆的報告，說埃及已陷入一種恐慌狀態。開羅的一些歐洲人正在扮攏行裝，準備向南或向東逃離。我回想起羅斯福總統當我快要從華盛頓動兵時給我的警告，就是我没有到開羅，也許它已被德國人拿去了。我聽見一些傳說，德國的傘兵會降落在尼羅河南岸，破壞它的最後的防禦工事，大家都相信英國的第八軍正在準備完全放棄埃及，退入巴力斯坦或向南退入蘇丹或怯尼亞。

自然，我要證實一下這些報告。可是開羅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證實任何事情的地方，那裏有好人。美國駐埃及公使克爾刻（A. Kirk）對於時局已無希望，但我與他幾度長談之後，知道他原來是利用他的尖刻的悲觀態度作爲一種面具，來掩護他對當地實際情形的真正淵博的知識和他努力維護當時脆弱局勢的手法。開羅還有另外一些消息靈通的人士，而其中最不可忽視的便是埃及總理那哈斯，他的興趣真好，又富有雅趣，因此我告訴他，如果他會到美國參加競選，他會成爲一個可怕的候選人，是毫

無疑問的。

但是胡漢威幾句話把滿口豪言和惡語，衝得七零八落，這些軍官士兵走來走去，極端嚴密的檢查辦法使當地老百姓懷疑並且罵罵一切來往商方的英國報告都不可靠。倘若在歌浦哈德酒店坐上半點鐘，就可以聽到關於一百英里外沙漠戰場的十萬種不同的說法。

因七之故，我高興地接受蒙哥馬利將軍的邀請親自到艾爾阿拉敏前線去看看。我同柯爾斯君和當時駐埃及軍司令麥克羅斯威爾少將，一道驅車離開開羅，順着沙漠大道向前去。我預先在開羅的一家法國百貨公司買了一套卡戎風衫褲——比我內身改小了幾個號碼。但是無法買到再大的了——並借了一套直單行李，那是在沙漠作戰中每人必須隨身帶着的。

蒙哥馬利將軍在他的地中海濱沙丘上的司令部裏接見我，這個司令部極靠近海岸，第二天清晨他和道羅日大將軍會邀我一同去享受海水浴，司令部是由四輛美國式大卡車構成的。各輛相隔幾十碼，停放在沙丘背後，以資掩護。在這幾輛車中，蒙哥馬利用了一輛放他的地圖和作戰計劃。他撥了一輛車給我住，另外一輛中是他的參謀副官等，最後車輛是蒙哥馬利不在火線上督戰時下榻之所。

但這並不是常常如此。蒙哥馬利將軍的彬彬清雅的風度，輾轉到幾乎狂烈的性格，當我在埃及時給了我深刻的印象，而他的忠誠於自己職守的精神比他的這種性格，尤為熾烈顯著。他差不多從來不在開羅，他經常在前線與士兵同甘苦。他居然連統帥中東一帶美國武裝部隊達數星期之久的麥克羅斯威爾

將軍都不記得，這使我嘆了一聲。我們開車到他的司令部後，他將我引到一旁問我：「和你同來的那位軍官是誰？」我答道：「麥克斯威爾將軍。」他又問：「麥克斯威爾將軍是作什麼的？」我剛剛向他解釋過，麥克斯威爾將軍便走過來，我把他們兩位介紹了一下。

幾乎沒有等我們下車，蒙哥馬利將軍就開始原原本本暢談起一個戰役的經過，這個戰役已達到最後階段而且是數月以來第一次扼制住隆美爾的部隊。這個戰役的真像始終還沒有傳到開羅，或對報界發表。蒙哥馬利將軍一再將戰事的始末復述給我們聽，並告訴我們爲什麼他感覺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雖然他的部隊還沒有推進很遠。這是一個大規模的實力的測驗。倘若英軍打敗，隆美爾在幾天以內便會進駐開羅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關於沙漠戰爭之戰略戰術的課程，原來在這種戰爭中，距離是沒有作用的，機動與火力決定一切。最初我很難理解爲什麼蒙哥馬利一再用沉着口吻說，「埃及已經救住了。」敵人還在埃及腹地，並未退出。但是我離開了蒙哥馬利張掛地圖的車廂時，我對沙漠戰爭總有了較多的知識，而且相信他證埃及的威脅已然解除的話，的確不同於一般英國的軍官和紳士遇事自負的表示。

蒙哥馬利將軍很熱烈地讚揚美國製的「舍曼將軍」式的坦克。這種坦克剛剛開始大量運到亞歷山大港和塞得港。他還盛讚美國造的一〇五公釐自發的平射砲，這種砲也正開始證明坦克是有法子阻止住。

的。大約他的中心話顯是他相信英國初期在沙漠上的敗挫，是由於缺乏坦克部隊，砲隊與空軍的適合聯絡。蒙哥利利告訴我，現在他的空軍指揮官開他一道住在司令部裏，過去幾天中間能對隆美爾施行決定的打擊，主要是飛機，坦克，和砲兵完全合作的結果。他估計在這次戰役中德軍損失了一百四十輛左右的坦克，也就使他們最優良的坦克的半數，而英方損失僅僅三十七輛坦克；他並且預料他在地商上也會獲得和他在空中已有的同樣的優勢。

當晚我們在蒙哥馬利將軍的帳幕裏和他的上司中東所有英國武裝部隊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麥克斯威爾將軍，中東美國空軍司令布列里頓少將，中東英國空軍司令泰得爾空軍元帥一道進餐。泰得爾空軍元帥是我在開羅時曾經談過的，是一名極其動人的戰士，每次壽命在沙漠出征，他總是攜帶着蔚藍色的旗幟。他是個航空英雄，一個深恩的人。

布列里頓和泰得爾在那天夜晚談到這個軍事的前途，從他們談話以後的戰局發展來看，那是絲毫也不算自負或誇耀的。他們都相信地中海有重新開放給聯合國航運的可能。他們共同認為這事的實現，須在驅退隆美爾到班加西隆地帶以西之後。然後，據他們說，我們便能仰仗以直布羅陀，馬耳他和班加西為根據地的，以及在巴力斯頓的美國大空軍根據地的一長串空軍掩護，來接濟並駐屯我們的兵力於埃及和它以東靠近非洲海岸的航路。他們並說，如果他們佔有了班加西區域，則大規模轟炸義大利

稍便真的可能了。

這「晚的談話涉及到許多問題，不過蒙哥馬利將軍除了前綫的事外，什麼事都不願意多講。他很有禮貌地傾聽別人的談話，但過了一兩分鐘後他便將話頭扭轉到沙漠戰爭上去。過了一會，他伴同我離開他的帳幕到我下榻的地方，察看我的床榻是否佈置妥貼，然後我們坐在車子的階板上，眺望海上的月華。聽見遠遠他的砲兵轟擊隆美爾步兵的聲響，這時他纔一面追憶往事，一面娓娓縷述他的童年生活，他在多年來參加英軍在世界各地服役的往事，以及他在戰爭爆發後不斷奮鬥，向文武官員鼓吹應有一種積極的而非防禦態度的必要。

「我告訴你，威爾基，祇有這樣我們纔能打敗波舍鬼（Boches）——他一向叫德國人為「波舍鬼」。——不讓他們休息，不讓他們休息」。

我問他隆美爾怎樣。他說：「他是一個有訓練有才智的將領，但他有一個弱點。他總是重復他的戰術。那就是我抓住他的地方。」

他要起身走了，希望我好地休息，並且說：「我睡覺以前老要讀一點東西。」接着，他帶着些黯黯的神情說，他身邊帶的書很少。事實上他身邊攜帶的東西便是他的全部財產。他離開英國以前不久，將他一生收集的傢具書物存放在多佛市的一個堆棧裏。「波舍鬼轟炸時把那個堆棧全燬了，」他說。

第二天我們驅車直往前線，我親眼看見一組一組的坦克兵和砲兵。一些戰鬥機的根據地，和數量驚人的供應隊，構成着在沙漠上進行的一個象棋式的流動性戰爭的流線。在這裏，蒙哥馬利將軍對於他自己職務的淵博知識又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不管是一個軍、一個師、旅、團、或營，他瞭解他們的部署和坦克的位置，比各個單位的直屬指揮官還要詳盡，這話聽來好像不免誇大其辭，但事實上的確如此。這個人的精密細緻真是了不得。

我們參觀了停在沙漠上的幾十輛德國坦克。它們是被英軍圍獲後遵照蒙哥馬利的命令加以殲滅了的。我們要爬上這些殘破的坦克，他便打開了那些食物盒，遞給我一些燒焦了的英國給養的殘渣，那是德軍攻佔多布魯克後奪取了去的。「你看，威爾遜，這些鬼子原來靠我們活着。但是他們休想再如此了。至少他們永遠不能再用這些坦克來打我們了。」

我們在前線參觀的全部時間以內，英國的砲兵都在不斷地轟擊，英美飛機也在掃蕩薩美蘭的敗兵。德軍爲報復計，派了幾架杜卡特式飛機，英國的砲兵陣地迅速地掃射投彈，我們的前後左右的晴朗的天空中，不時看見一架飛機中彈冒出煙火，向地面衝下。我們偶然還會看見，幸而免死的駕駛員吊在颶風的降落傘下徐徐降下——在我看來都像是一股南面吹來的微風飄到扯中海上似的。

我倆在前線看到的軍隊有英國人、澳洲人、紐西蘭人、加拿大人、南非人，還有大約三十名美國兵組成一連隊。這些美國人是用飛機從美國運來的一小隊坦克兵，專來在實戰情況下受訓練的。我和每

個美國兵都談過話，發覺他們來自許多個不同的州府。這些人剛剛打完仗，盼望立刻再上火線去打，不過他們也不作英雄姿態，不誇口。他們祇是一組體格健壯，機警伶俐的美國青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見到台克薩斯，百老匯，和艾歐華的農莊。

中午，我們在一個師部裏進餐。面外是一組大卡車。這頓飯完全是桑維治——還有茶鹽。茶鹽在前線頗受兵士和德國軍隊一樣。它們會鑽進你的襖裏，耳裏，鼻子裏。此外，許多軍官對於經常吹進他們眼裏和皮膚裏的細砂也頭痛不堪。這使一切機械裝備受到極大的消耗。有一位飛行員告訴我，普通的飛機引擎到了沙漠上，壽命不過為常態之下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在埃及到處遇見的第一流英美航空工程師，都提到沙漠如何眼他們搗亂。

在回到蒙哥馬利的司令部途中，他就我所目睹耳聞的一切，綜述了一遍，他暢所欲言地說他的局勢如何良好，剛剛結束的這一場戰役又是怎樣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這一次戰役的結果，我確保了坦克和飛機的優勢，同時隆美爾已不能越過東地中海獲得接濟——因為我們的空軍對於他的每五隻供應輪可以毀滅兩隻——因此現在可以像數字公式一樣準確地說，我終必消滅隆美爾，這一次戰役是嚴酷的測驗。」

我會看見他紀錄下來的他自己的和敵軍的坦克損失與坦克後備力量的數字。敵人的許多損失我已親眼看見。他薄薄幾張戰報前所得到的一個消息，就是到那時為止還泊在亞歷山大港以東的美國船隻

上有大批的供應品還未卸下。

於是他請求我一件事。他說一種失敗主義情緒滲透了埃及，北非，和中東一帶，接連不斷的英軍敗績已使許多人相信德軍將攻佔埃及。還有，因此之故，大不列顛已然大失體面。這個損失影響到他的機密工作，而有利於敵人的活動。他已經扼止住隆美爾，但他很想使他不要在三個星期內（在已經達到塞得港的三百輛美國「舍曼將軍」式的坦克車參加作戰以前）退入沙漠中。他預料如果他正式公開宣布這次戰役的結果，恐怕隆美爾就要提早撤退了。而如果我作一種非官方的聲明，隆美爾便不會把這聲明當作對他積極行動的表示，並且還可以比一個正式的英方公報更有效地提高埃及，非洲與中東一帶的民心士氣。

從我所眼見耳聞的一切，我相信他並未過分估計他所成就的重要性，因此我欣然答應如他所希望的辦到。

於是他邀請了所有報界代表到他的司令部來，我使用我們兩人事前商定的措詞告訴他們這次戰役的結果：「埃及已經獲救。隆美爾被扼止住了，把納粹趕出非洲的任務業已開始。」這是當時那些新聞記者在很久期間內第一次得到英國方面的好消息。他們已經受了許多次欺騙，漸漸變得小心謹慎了。在他們的眼中，戰線並沒有怎樣改善，隆美爾離尼羅河仍然不過幾英里遠，由我們所在之地到的黎波里的路程似乎遙不可及，而到開羅的路程却短得可怕。

我從那天下午許多新聞記者的面容上看出一種涵蓄的懷疑。他們已經碰到很多祇作預言的將領，沒有經歷過真正實行的將領。

我從豪哥馬利將軍的司令部乘一架德國的小型偵察機，低飛在戰地上空，而抵美英空軍根據地。這架飛機的機槍幾乎全部是用玻璃做的，四面都可以望出去。泰得爾空軍元帥自己駕駛着。

我們在基地看見好幾百名美英飛行員，有些剛剛作戰歸來，有些正要起飛作戰。另外一些坐在那裏交換經驗，討論風向氣候，大家都很怡然自得。我相當關心地詢問那天早晨我看見的幾位乘降落傘下來好像落在地中海上的飛行員的命運，他們不知道那些是誰，但負責的軍官說：「他們逃回來的數目，實在驚人。有些落在敵後，有些掉在海上，還有些降在很遠的沙漠中。但是由於他們的忠誠和自助精神，竟有大量人數返回司令部來。」

我又和若干美國空軍談了些話，我覺得和我在沙漠上見過的那些美國兵神情差不多。談完後，泰得爾元帥便和我一同飛往亞歷山大城。這是一段插曲，它使我想起這整個的戰爭並不像我所見到的沙士、坦克、或長大而潔淨的砲身那樣地直截、撲實、簡單明瞭。

直到今天，關於亞歷山大城的兩件事還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是和法國海軍少將高得弗洛阿的長時間的討論，他統率着留在亞歷山大港內法國艦隊的幾個孤零零的單位。他的船隻，從全城都可以看到。它們的砲衣放在岸上，它們的艦身都用遮攔物掩蓋起來，它們的油紙能支撐極短的時間了。損壞

是它們仍然代表着一支重要的潛在的戰鬥力。同時，它們停泊在那裏，是那樣的「些錘大的致死的武器」，其中不知消耗了法國農民們多少辛苦得來的儲蓄和法國工程師與水手們多少才智血汗？在法蘭西依然這一切毀滅的今天，却設法置置於不問，或名掃地，這真是一個悲劇的象徵，表明這個戰爭依然是一個混濁不清的爭論，在其中想沒有英法美各國的人們和團體還很多。

當傅弗洛阿少將說一口很好的英語。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主流的幹練的法國軍官，介紹我和他意見的英國軍官們證實了我的這個印象不錯。法國國事的變幻使他煩惱以至於苦痛，但他除了單純的軍官的調兒外，對戰爭的任何意義都體察不知。他對於一九四〇年六月英國海軍攻擊法國艦隻一事，顯然是深感痛心的。不過他對於美國表示極大的友情和我們勝利的希望。他們，他雖然在貝當未死之日唯有聽命貝當，可是他對談談到他個人的感情和他對水兵的感觸時，他却希望美軍能夠開來，他充分向我表明，如果美軍從到，他們當然縱然抵抗也不過是一點姿式而已。

自從我與他和其他在北非的法國軍官及海陸軍兵士談過話後，許多人所說的我們如果直接動手而不與達蘭明來往便會在法國人中遭受到何等等的損失云云，我再也不全盤相信了，我總在懷疑那些既不能證明又未嘗證明而又太容易支持一種政策的種種說法。

我對於亞歷山大城的第二個紀念，是當晚在哈爾烏德海軍上將家中的一次宴會。他就是英艦「艾克羅特」號（HMS Eclair）在南美領海與德艦「格拉夫斯比」號（Graf Spee）進行史劇般的搏鬥中的英

雄，現在是東地中海的英國海軍司令。他邀請了在亞歷山大埠的他的十位海軍外交界和領事館的同伴，與我們共餐。我們討論戰爭，用的是那種與全世界正在作戰的軍官們討論戰爭時同樣冷靜客觀的方式；隨後談話便轉入政治方面。我試使促起這些英帝國富有經驗的幹練官員，談談他們對於前途的看法；特別是對於殖民地制度以及我們與東方許多民族的共同關係的前途的看法。

結果我聽到吉布林君的一片談話，但是一位連羅得斯（Cecil Rhodes）的自由主義的色彩都未沾染的人。我從他知道，在倫敦和不列顛協同體的所有消息靈通的人們，都在致力於這些問題。舉例說，許多人正在試圖尋覓一種比較接近自治的公式，以代替舊日的一「監護」觀念。但是這些人在倫敦執行着政策，並未觸及到世界在變動中。在他們眼中，英國的殖民地制度是不健全的，但是我看看他們之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曾經以為這種制度可能有任何改變或以何方式加以修正。大西洋憲章是他們大家都厭惡了的，可是他們之中無論誰都不會感覺它會影響他們的前途和他們的思想。那一天晚上在我的心中產下了一個信念，這個信念，當我後來在中東旅行的許多日子中益發加深了，就是說：戰場上的精彩勝利不足以使我們打勝這特殊到世界各角落的戰爭；惟有新的人物和新的壽命支配我們與東方民族關係的機構。方能獲得全勝，不致使和平僅僅成爲另一次休戰。

第二天我們驅車回巴羅，與埃及國王法魯克，埃及總理，以及英國駐埃及大使兼埃及實際上的統治者薩瓦赫，舉行長談。我們在途中經歷了古代和現代的二種奇異的混雜。長列的駱駝隊，背上踏着法

人，徐徐地從旁邊走過，戴著尼羅河流域的土產，另外則有一串串的現代載重汽車，裝着強大馬力，現代軍用飛機，透過開羅到現代的工廠去修理；同時一路上我們都可以滿眺古埃及光榮的遺跡——獅身女首像和金字塔。

第二章 中東一瞥

從開羅到德黑蘭的途中，我們飛越過許多通商道路和城市，它們是和我們的文明一樣的古老，並且保存了幾千年歷史的形形色色的遺蹟。尼羅河邊那些蒙上眼罩，無止境地環繞着灌溉水田的鵝鵝的牛，與我在埃及看到的巨大的美國機器修理站，似乎完全不相關。在耶路撒冷古城骯髒的街頭上玩耍的那些營養不足的孩子們，貝魯特飛機場上青年的法國軍官，工作在巴格達的毛毯廠的十歲左右阿拉伯男女兒童，聚集在德黑蘭城從龐大營房中的波蘭難民——這就是我在這叫做中東的區域中所見到的第一幅圖畫，它是一幅色彩極不調和的混雜的圖畫。

一個現代的人在飛機中一站一站飛過時，心目中對他所飛越過的國土可以刻上一個輪廓。從貝魯特到里達，到巴格達，到德黑蘭，我們都飛行很久，可以從容地將我們在各地的筆記比較一下，消憶追憶自己的印象。在我們離開伊朗赴蘇聯的途中，我對於向自己提出的若干關於中東的最緊急迫切的問題，已找到回答了。

首先，我相信所有這些人民中支持我們的比反對我們的要多。一部分原因可以簡單說是因為美國地處遙遠，而且對他們沒有任何統治權。同時這也是德國人依然享受着——例如在伊朗——相當的人望

的主要原故。此外，美國參加戰爭以後，很多人便開始相信，不管暫時怎樣挫折，聯合國終久會勝利的。換句話說，這些中東的人民，因為自由歷山大時代以來就不斷遭受征服者的蹂躪，所以在他們的心理上有一種單純的實際的想法和一種苟存的本能，以至使他們在一件衝突完全揭曉以前便趨向於行將勝利的一邊。

其次，我相信幾乎所有我到過的這些地方都有某種酵母在發生着作用。即使是最嚴格的中立也不能使戰爭不對這一區域的居民引起深刻和劇烈的變動。他們的生活在今後十年中的變化會比過去十個世紀還要大。

第三，我發現不出任何保證，證明這些變化會自然而然地有利於我們。我們西方政治觀念的魔術，很尖銳地刺激着許多回教徒，許多阿拉伯人，許多猶太人，和許多波斯人的心靈。他們現在密切注視着我們已歷三十年之久，在這時期裏我們彼此之間以及自己與自己之間相互戰鬥，不定着我們自己信念的中心結構。我到處看見這摩羅遜但抱着懷疑主義的人們，他們對於我所提出的關於他們的問題與困難的詢問，倒轉來以謙和但尖刺的口吻詰問關於我們自己的問題。美國對各種族的不當措置常常被他們提出來。我並且相信每一個與我對談過的政府官吏都對我們與維琪的關係莫測高深。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都急想知道我們所謂的自由，它的意義是否僅僅是新的和擴大的委任統治地區，而這種委任統治在黎巴嫩，敘利亞，與巴力斯坦的場合，無論對與不對，在他們心目中卻祇意味着一種外國暴政的

「形式」。

最後，我在中東無論走到那裏，都看到一種技術的事後和貧困競賽。作這種評語的任何美國人，我都都受不了受到人家的責難，說他過於把浴桶小題大做。但是我在耶路撒冷第一次明白了爲什麼他的許多美國人每到當地的浴室時便有一種真正回到聖經時代的感覺。理由很簡單，他們實在也是回到了聖經的時代，兩千年來，絕少變化。現代的飛機場，長條的石油管，碎石子馬路，以至於儲鉛場，構成一層薄薄的外衣，掩蓋着在本質上還和西方文明發生以前一樣簡單刻苦的生活。僅有的一些主要的例外，就是在世界猶太民族運動督導下的、或是阿拉伯人已然得到相當自治的地方（如巴格達）的工業，農業，和文化的發展。

在我看來，有四件東西是這些人民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需要着的。他們需要教育。他們需要更多的公共衛生事業。他們需要現代化的工業。並且他們需要自由和自我統治而來的更多的社會尊嚴和自信力。

即使尼羅河邊戰爭很遠很遠的時候，凡是順流而下的旅客，我相信都不能不意識到教育可以如何助成埃及人民恢復他們的歷史感與他們的元氣。這個國家已經設有學校，美國人和英國人曾經幫助過他們；我會到許多埃及人，從國王法魯克和總理那哈斯以至工程師和醫生，他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做受過教育的人。但是在埃及甚至全部中東，除土耳其外，沒有人曾考慮介紹我參觀一個本地人

的學校而引以爲民族的驕傲。有人促請我看過的唯一的學校，是一個美國女子辦的女學校，她在重大挫折之下試圖教育埃及的孤兒歷三十年之久。

我參加任何招待會時都會見到「巴夏」們。他們有許多已同外國女子結婚；他們是風流倜儻，和藹可親的人物。「巴夏」這個台銜在埃及是從奧托曼王朝時代便殘留下來。以前這是一個加子有功帝國的軍事領袖和各省首領的官階。現在它成了由國王賜與的頭銜，以示優眷之意了。「巴夏」到了什麼地方，都有埃及人民替他鋪開一張紅毯子，因爲他有錢可以雇人這樣侍奉他。

我有一次問過招待我的主人，一個年青的埃及新聞記者：「一個人靠寫一本偉大的著作也可以成爲巴夏麼？」他答道：「我想他可以，不過在埃及沒有人寫書。」

「你們繪圖繪得好可以做巴夏麼？」我問他說。

「沒有理由不可以，只是這裏沒有人繪圖。」

「有過一個偉大的發明家獲得巴夏的頭銜麼？」於是他又告訴我：「據我所知，自從法羅阿布以來，我們便沒有過偉大的發明家。」

我在埃及住得時間太短，不能瞭解這種文化淪落的一切原因，一項事實是與此有關的，就是在埃及最大的都會開羅，所有文化和教育都操在非埃及人手中；這正和埃及肥沃的土地絕大部分都操在少數「巴夏」手中一樣，而這些「巴夏」之所以能獲得他們的頭銜，大多甚至並非由於政治活動，而是由

於使用他們的財富之故。

但是主要的原因，似乎在於完全沒有中階級。在整個中東，祇有極少數富裕的地主，他們的財產大都是由繼承而來。我會見過一些這樣的人，發見他們多半是對任何政治運動都漠不關心的，除非影響到他們自己的身分地位時。除了游牧的部落以外，廣大的民衆都沒有財產，貧困不堪，受制於古舊的神權殘餘的積習，生活在骯髒的情況之下。創造的鼓勵和力量向來不會從資產太多的人們或一貧如洗的人們發生出來的。而在中東是沒有中間階級的。

可是，看來也頗奇怪，你可以在這些地方感到一種醞釀，一種長時間情緒支配下的憂鬱的潛滋暗長，一種日漸顯著的對於宗教拘束性儀節與積習的蔑視了。

在每一個城市中，我見到一部分——通常祇是一小部分——頻頻思動的青年的知識分子，他們知道那促成俄國革命的羣衆運動的技術，並且討論着這些。他們也知道我們自己的民主運動的歷史，他們和我談話時，好像在腦中權衡着一種怎樣可以使他們自己緊張以至狂烈的希望獲得實現的道路，同時我在這些地方發現到，正如我在俄國和在中亞所發現到的，一種日趨高漲的狂熱的民族主義精神，這對於一個相信世界唯一希望存在於與此相反之途徑中的人們，是一個不安的因素。

我在伊塔克，黎巴嫩，和伊期發見到差不多相同的不滿，饑餓，以及不耐煩的情緒，而在同時，這些國家中的總理和外交部長們雖然是精明強幹的人，卻對這個問題缺乏正式的承認。

在貝魯特，德羅爾，和朋羅，美國人已開始幫助設立和經營入水可入的學校。在貝魯特，我會和美國人辦的貝魯特大學校長多治博士在他的花園中喫茶。同一餐中，我會會見過戰鬥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將軍，戰鬥法國的總代表賈德魯將軍，英國公使司皮爾斯少將，並和他們每人談過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前途。但是，我可以決不誇大地說，多治博士關於那些區域前途給我的希望和信心，比其他三人總和起來給我的還要多。

不過，我永久不會忘記我與戴高樂將軍的會見。他曾在貝魯特飛機場接我，披了服裝彩色鮮明的衛隊和樂隊隆重地歡迎我，一路上奏樂護送我幾英里，直到他的寓邸——那是一座巨大的白堊建築物，周圍是精緻的花園，每一轉彎處都有衛兵敬禮。我們在他的私人住室中暢談幾小時，那間屋子裏每一個角落，每一面牆壁，都陳放着拿破崙的半身像，銅像，和書像。在隆重的宴會中間我們一道談着話。後來我們並坐在一片星光閃爍的美麗的草地上談到深夜。

這位將軍在描述他與英國人爭論敘利亞和黎巴嫩究竟應由他還是由英國統治時，常常會戲劇般地揮布說：「我不能犧牲或委曲求全來修改我的宗旨。」正像 John P. 一樣，和他的副官接續說：「當我說到我對戰鬥法國運動極感興趣時，他立刻糾正我的話：『戰鬥法國並不是某種運動。戰鬥法國就是法國本身。我們是全部法國及其屬地的當然繼承人。』我提議他說：『敘利亞不過是國聯下漸的這個代價。』他說：『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將它引為己任。我不能取消這個代價，或聽任別人把它取

消。祇有當法國再有一個自己的政府時，纔可以這樣做。在全世界無論什麼地方我都不能讓出法國的任何權利。自然我完全願意和邱吉爾及羅斯福坐在一起討論暫時利用法國權利和領土把統治法蘭西的德國及其附庸趕走的方略。」

「威爾基先生，」他繼續說，「有些人們忘記了我和我的同伴代表法蘭西。他們的心目中顯然沒有法蘭西的光榮歷史。他們祇想到它的暫時的衰微。」

後來我同一位黎巴嫩的高級官吏談到法國與英國爲統治利比亞和中東所進行的鬥爭，他問他同情那一邊，他答道：「兩家都遭殃。」中東的知識階級對於任何一種委任統治和殖民地——無論統治者是誰——都沒有什麼信心。

我離開貝魯特便赴耶路撒冷。新舊的對比再沒有比這裏更顯著劇烈的了。憑依着我們這架風馳電掣般的現代的飛機的窗口，我們可以俯瞰晴空下面一處屹立着黎巴嫩殿堂的山岡，死海，加利里海，約旦河，橄欖山，和蓋斯馬尼的公園。

到了耶路撒冷，我便做了麥克米舍爵士的賓客，他是一個酷嗜體育，吸煙斗，十足幹練和十足英國式的巴力斯坦與外約旦的高級專員。他引我看舊城，並且不憚煩地，與級極高地解釋給我聽一個美國人難於看出的殖民地與委任統治地的差別。

但是替我安排去親眼看看巴力斯坦問題的真正詭秘的，卻是美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平克爾頓。在他

殷勤招待我的家裏，他將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所有互相衝突的派來的代表介紹來見我。在一個極繁忙的日子，巴恩斯和柯爾斯和我，我們三個人都會見了他們。當地英軍司令麥克康奈爾少將進來了，麥克米舍爾爵士公署的代理秘書長司考特也來過，此外還有猶太事務屬的政治部主任歇爾杜克，麥克米舍爾爵士的阿拉伯秘書官貝哈第，主張全國都應屬於猶太人的猶太民族運動中的修正派，主張全國都應屬於阿拉伯人的阿拉伯律師及民族主義領袖奧尼貝哈第。他們每人都有一套話向我們說。

當天晚上，我情不自禁地斷定，對於這一個盤根錯節問題的唯一乾脆的解決辦法，祇有所羅門纜纜得到。不過這時我會去拜訪哈達諾會（Hartmann）的創辦人索爾得女士，在她那小巧的佈置樸素的寓所裏談了一席話。我告訴了她我這一天會客的經過，我與麥克米舍爾爵士的談話，我的茫然和我急欲得到答案的心情。我曾問她，有些列強爲了維持它們自己的統治起見故意煽動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糾紛，她對這種說法是否也以爲然。

她說：「我不能不傷心地告訴你，這是實在的情形。威爾基先生，這個問題在我腦中盤旋了好幾年。這個問題如不解決，我到美國住着都不舒服。世界上沒有別的合適的地方使歐洲飽受摧殘的猶太人得以安身，而且不管我們如何希望，這種摧殘在你我有生之日決不會終止的。猶太人必須有他們自己的祖國。我是一個熱烈的猶太民族運動者，但是我不相信猶太人的希望與阿拉伯人的權利非發生衝突不可。我極力勸說在耶路撒冷的我們猶太人作一些簡單的事來破除各民族之間的偏見和軒輊。我總

勸他們每人交幾個阿拉伯朋友，以他們的生活方式表明我們來到這裏並非要做征服者或破壞者，而只是發揚光大我們這個感情質的宗教的祖國之傳統的生活。

她告訴我她如何相信教育的作用。她雖然是一位老女子，將近八十歲了，但是她所說的在猶太民族運動指導下的猶太移民村及猶太工業中種種成就，都是充滿着青春和活力的。

像猶之問的這樣一個復雜的問題，根源於古代歷史和宗教之中，又和國際政策與政治牽連在一起，如果相信它可以藉着善意和誠意而得到解決，未免太不現實了。但是當我坐在那裏，夕陽通過窗戶照耀着那付她容而敏感的面龐時，我使想到——至少在這一時刻——以她所有的成熟的大公無私的智慧，難道她不比所有那些野心的政客更為淵博麼？

中東的每一地方和教育問題相提並論的，是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在那些地區，無論你旅行到那裏，永遠會很不安地驚惕着疾病和瘟疫，倘若沒有一種堅強的運動來改善他們的健康和活力，這些人民的前途實在黯淡得很。

在教育方面，有幾位本地人和幾位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已經表現出大有可爲了。我在埃及，巴力斯坦或伊朗所見到的美國部隊中的瘧疾情形，在戰爭完了後公布出來，一定是很驚人的。紗窗、風門、對於僕役的詳細檢查，池沼的疏通，蚊帳和蚊靴等等，我相信在中東一帶的人民心目中，一定刻

吐了很深的印象。畢竟無論是誰都不喜歡瘧疾。

這國家內的公共衛生改善以後，就會發生任何醫書上所見不到的影響。原來衛生設施必須普遍方能生效；疾病是不管人的貧富貴賤的，而且普通男女人民如果分享到減低死亡率 and 增進生命力的利益，那麼，如果我們的不錯，他漸漸會喜歡分享別的市西了。

自然，像我們這一組外國人抽着煙的士榻設備，決不能代表當地一般的情形。在那路撒冷我受麥米金將軍招待時，床上並沒有煙草，與我看見桌上有一盤長長的彎曲起來的綠香。我完全置之不理，但我的一個同伴抽了一根。後來他說那一夜之中清烟繚繞，氣味馨香，至少使他在心理上發生了一種安全感。在巴格達時，我們住在特爾摩的旅館拉特，那臥室的天花板上安設了很大的扇子，終夜響個不停。這個旅館原來是幾年前由英國軍醫員雷勒勒下榻而建築的。在貝魯特，我們住在巴德將軍軍官邸，臨前有好幾個鐵刺的小孩子拿着蠅拍子小心翼翼地肅清所有的蚊蟲。不過，你開始厭煩這個問題之時，並不在你注意這一專為特種設備的臨時久遠的防範辦法，而是當你清晨醒時一隻好惹蠅火的蚊子逃出了各種防範辦法，使那聲落在你的手臂上，同時你又不能忘記目紐約巴格達每到一處所聽到的關於蚊子的說教和警告。

當然，公共衛生的真正癥結，還是貧困。在埃及，因為住血吸蟲病 (Bilharziasis) 而死的人口，實在驚人。這病是由蠶居在尼羅河裏的蝸牛帶來的。埃及的人民喝尼羅河及其渠道裏的水並在裏面

洗澡，於是大受其中傷害元氣的病毒。但是問題不在於僅僅肅清河裏的蟻牛，還須使埃及人得到沙灘水的供給。而這就需要金錢了。

在一切炎熱的國家裏，沙眼使許多小孩子失明。我們在開羅，耶路撒冷，和巴格達看見不少這樣廢廢的孩子。除非人們追求一種使蒼蠅不能滋長的生活方式，否則，即使有醫藥設備和預防辦法，這是不能肅清它的。這種方式包括適切的居住，冷氣和籠帳的設備等。

我們所看到的衛生普遍惡劣的最驚人例子恐怕是伊朗首都德黑蘭了。全城的給水全是靠街道兩邊的露天溝渠。人們在那裏洗澡，用唧筒打到樓上去飲用養飯。有一句老話，說水用七遍不清自潔，固然可以使他們感覺心安，但是決無法使他們免除痢疾，霍亂，瘧疾，和無數種水生的疾病。德黑蘭城中每五個兒童中就有兩個能活到六歲。

你儘可以說，正如開羅和耶路撒冷有些人向我說的，「本地人除了他們已有的外，再不需要什麼更好的了。」這是若干世紀以來，無論何處，滿足於現狀的人爲了反對改善被歧視的人們的境遇，而用以解嘲的口頭禪。然而一部文明史證明，「貧苦人得以改善他們境遇的經濟條件，決不是一種分化過程，而是一種改善，整個社會可藉此提高其福祉。因此，在我看來，整個中東的教育和公共衛生問題，繫於生活水準的提高，而這又有待於生產與勞役之現代技術和工業方法的實施。

毫無疑問，這樣的生活水準的改良是會增進世界市場的。因爲中東是地中海大而乾燥的海帶，隨時

準備着汲取無限數量無限種類的貨品和勞役。在這些人民之中提倡較好的生活水準還有它的潛在的實際的好處。但在今天應付這個問題實有一種更有力更迫切的原因在。那就是說，目前這些民族和他們所處的世界之間既然沒有平衡存在，這本身便是一個衝突的潛在泉源，和另一次戰爭的可能的根苗。事實簡單之至。如果我們對這個區域的橄欖林，棉田，和油泉，置之不理，聽其自然，我們也許可以不必憂慮這種平衡問題——至少還不必如此。但是我們並不是聽其自然的。我們已經把我們的觀念和理想，我們的電影和我們的無線電節目，我們的工程師和我們的商人，我們的飛機師和我們的兵士送到了中東，我們現在就不能規避那結果了。

在實際上，這個結果是使一切舊的生活方式變為陳腐無效。離開開羅城幾英里的地方，我看見不到十歲的埃及孩子們用頂原始的汲水器汲水到灌田的溝渠裏。那些小孩子看起來誠然無馴服得很，可是他們不會久安於此。整個的埃及，在它與英國訂有「非交戰同盟」的奇異的立場上，竭盡其能事地表現出根本不在乎誰勝誰敗的態度。這並不能完全歸咎於英國，但在我看來，似乎與英國和我們自己未曾履行我們的義務，有密切的關聯。

把中東的人民在技術和工業方面推進到二十世紀上，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進一步又與政治上的自治問題密切關聯在一起。在中東許多和我會談過的人們告訴了我許多在他們認為真實的原因，說明為什麼大多數阿拉伯人的生活是這樣極端原始的落後。這些原因中，有的責怪阿拉伯人實際上喜歡年費

青地死去，有的說他們的宗教不讓他們積蓄資本實行他們在生活方式上所需要的改善。在我看來，這些理由大半都是無稽之談，把機會給我所見過的任何阿拉伯人，讓他們感覺他們是自行料理自己的事，你看，他們一定會改變他們所居住的世界的。

在中東談到的自由或自治，是一個絕對的觀念。反對它的人們說，如果他們突然得到自由統治他們自己，必然發生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在另一方面，贊成他們的人們把西方人在中東的勢力，渲染得過於黑暗，將它描寫為單純的帝國主義剝削，而忘記了因法、英、美在那裏的商業發展而造成的許多真正的好處。

不偏不倚的現實的真理，在於這兩個極端之間。我祇見到很少的阿拉伯人、猶太人、埃及人，是要求西方勢力一古腦兒地立即退出中東的。大多數人們都要求一種逐步實行的計劃，以使英法轉移給他們日漸增多的責任來負起自己政府的重担。

這在我看來是一種十分合理的希望。像伊拉克這樣的國家，我認為是一定是可以實現的。伊拉克是世界上很少數之中的一個國家，它經歷過殖民地地位而成為委任統治地，進而在技術上變為一個自由的有主權的國家。我會有機會見到它的主權依然因英國的需要而受着限制，但是至少這些需要是軍事性的，與爭取戰爭勝利有關。

我喜歡那些在伊拉克會見過的人們。攝政阿布都爾伊拉親王曾在巴格達星光閃耀下為我舉行盛大宴會。

會，使我一生不能忘記。他站在草地鋪着的一塊地毯上祝賀他的政府首長並恭維他的地毯上。他們之中有的一些穿着大袍子，帶着包頭。很奇怪地，經濟部長如此，上院議長也如此。當他不恭敬的外國人都稱這位議長是「上帝」，因為他穿着一套沙漠式的服裝。鬚髯很長。其他的人們穿的是西裝。我後來知道，幾乎每一個官員都會擔任過差不多每一部部長的職務。

一位伊拉克朋友告訴我：「人材如此之少，自然必須調來調去了。」

過了兩晚，又舉行了一次宴會，這回是伊拉克總理努利阿薩得做東。他身材不高，面容有付敏銳而追求的神情，是我遇到的人中頭腦最圓滑的一個。一九四二年，他的前任受德國收買了的穆希得阿利阿蓋爾尼氏，被英國用武力推翻之後，他纔重行執政的。努利氏是作為英國的一個非交戰的盟友而返回伊拉克的，滿懷着參加戰爭的希望，而且後來也果真實行了。英國駐伊拉克的公使康爾恩瓦里斯爵士，也是一位身材高大，喜岐風斗，精明強幹，恬靜沉着的人。像我在中東一帶所見到的許多只是英國式殖民地的帝國建造者一樣。毫無疑問，努利氏是以一種敬重的注意方合得溫和平靜地聽取這個人的話的。不過，我總覺得努利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關於在理論上從英國控制下實現完全自由的團體有所爭論時，他是不會容忍屈服的，而且他知道，在他建造第一個真正現代的阿拉伯獨立國家的奮鬥中，時間是逐漸於他有利的。

努利招待的這次宴會簡直是中東的一幅天方夜譚式的畫面。我們那一天會在那裏觀看過阿拉伯的壁

陵，金碧輝煌，高聳入雲，看見曬乾了的土磚砌成的民房院牆，參觀了一個市場。其中銅匠銀匠做碗、鑊、器皿，但是店舖裏賣的却是從紐約或科物浦來的機器製的飾物。我們還看了世界最精緻的博物館之一，陳列滿了烏爾查爾地（Ur-Chal）發掘的古物。那時間可以追溯到我們歷史的最初期。我們又在一個咖啡店喝阿拉伯咖啡，那裏有成羣的人們談天。讀報，在我們周圍下棋。在這樣的背景上，那宴會真可謂近於神話了。

在總段冠冕堂皇的演說之後，筵席變成了一個音樂會，一會兒變成了一個阿拉伯舞女的展覽會，然後又是西方跳舞會。英國女說士和來自巴斯拉與波斯灣的美國兵士及伊拉克軍官們，在阿拉伯的天幕下捉對跳舞。凡在那一晚上加宴的人，決不會再存有東西方永不接近的觀念，或仍可以為天上的主命定了阿拉伯人始終祇是沙漠上的老百姓，由那些渡海而來的外國人統治下去。

第二天我從巴格達飛往德黑蘭，一路上想着頭天夜晚經過的事情。於是我逐漸明白了隱伏在那狂歡之下的若干清新的時流，也就是我在整個中東一帶到過與學生，新聞記者，士兵們談話時所會注意到的時流。這更加深了一個信念，就是：如果他們對於教育和從舊式宗教與政府積習下解放出來的新的時流，不能由他們自己的統治者和他們的外國主宰方面得前滿足，那麼，祇要有一個極端主義的領袖，振臂一呼，這些新覺醒的民衆勢必揭竿而起。蒙面紗，土耳其戰船，疾病，污穢的教育與現代工業的缺乏，政府的腐敗獨斷的專制，一切在他們的心目中都代表着一種過去時期的陳跡，而他們自己社會的時

內部勢力和外國統治的剝削聯合一致加諸他們身上的。我再查諸人們問道：因為我們碰巧處在世界的軍事與商業通路的戰略要點上，美國便因此有意支持一種制度，聽任我們的政治操在外人手中（儘管是溫地），聽任我們的自由由外人支配（儘管是間接地）麼？或者換一句話，他們便會說，這是因為我們就是戰略要點，必須控制起來以防止強心或什麼其他的非民主國家攫取世界主要軍事通路和通商孔道之故。纔如此麼？是因為我們的運河，我們的海，和我們的國家對於控制東地中海是必需的，而且構成通往亞洲的孔道之故，纔如此麼？

我知道這個問題講起來未免過於簡單，而實際上則不易覓得答案。我知道，祇要我們西方的民主國家不甘受敵對勢力的威脅，則如蘇彝士，東地中海，以及經由小亞細亞通往東方的道路之類的要點，必須設置在友好而且穩妥的手中。我同樣知道，現行的殖民地「保護」制度，有不少歷史的甚至當前的存在理由，但是，歸根結底，由於現時進行着的種種醞釀，這種制度是否能夠保持下去，倒是一個問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就是：這個制度與我們所說我們正在爭取的原則，完全背道而馳，不但此也，我們越鼓吹這些原則，越足以激起破壞這個制度的醞釀。

這都是我所知道的，不過我在這裏所報告的，全是中東各國總理，外長，和每一城所能覺到的覺醒的知識分子的心境，甚至也是一般未受教育的羣衆們的模模糊糊的心境。不管怎樣，這個問題必須解答，否則終有一個新的領袖充滿可怕的幻想一躍而起，號召着這些憤懣的大衆。而其結果所屆，必終

不外兩途，或者是外來列強全部退出，一切民主的勢力也隨之全滅，或者是由那些外來的列強將這樣國家全部實行軍事佔領和統治。

如果我們認真相信我們所聲明的目的，如果我們要中東內部的濺刺的斯與力量與我們合作來實現這些目的，我們就必須終止那種操縱士著勢力，為我們的利益而挑撥離間以此制彼，延長統治的一切企圖。

第三章 土耳其——一個新興國家

從北非繞過世界最古的海的東端，到通往中國的陸路上的巴格達的那塊地球上廣闊古老的部分，很能成爲決定我們此次戰爭勝敗的地區。它還是一個潛在的戰場；那兒有英國的坦克飛機和英國的，戰鬥法國的，及其他聯合國國家的在一起。然而它不但是個戰場，它還是個偉大的社會實驗室，那兒有千百萬人民正以緩慢而堅定的步驟試驗着觀念和忠誠，而戰爭進行和最後的勝敗也以這種方式在人心裏發展。

中東在動盪，在改變，這種感覺，在土耳其可以找到確證，因爲土耳其共和國在過去三十年中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模範，作爲古老的奧托曼帝國的廣大區域中一切事件的借鑑。今天土耳其給予一個美國人的印象，等他在中俄印邊境上見到一切之後，更爲加深了。

土耳其是個新興共和國；去年秋季纔紀念了它的十九歲誕辰。它比它的某些歐洲隣國弱些；我在土耳其時，和我接談的土耳其人親切實的意識到他們的國家隨時有被侵的可能。此外，現在的土耳其比從前的土耳其小得多——一個虛有其表的帝國變成了一個精巧的結實的國家。

土耳其雖然年青，雖然比較弱小，但在我看來，它倒很好。它看着好，因爲它十分顯明地決心以一

切力量保衛它的中立。它看着好，因為它面向着現伏的世界，而且辛勤迅速地從事建設。它看着好，因為我見了許多有的穿制服有的沒穿制服的顯然爲了未來而奮鬥的人民的堅韌誠實的面孔。最後，我覺得它看着好，是因為我認爲我在土耳其看到了這麼一種氣象——進步的健康，教育，自由，民主的觀念，在這個世界最古老的部份和在世界最新的部份是一樣有力量的。

安哥拉不是世界大的國都之一，它是現代的，在一個小山上留着古代鄉村的一部分，好像在提醒土耳其人他們已經進入了多瑙，另一個小山上有土耳其共和國國父（Atatürk 指凱末爾）的住宅，你可從寬廣鋪石的茂樹成蔭的街道走到城市的中心。街上充滿了車輛；人民穿得好而且忙碌；建築物新穎整觀。

有一天我租車出了安哥拉，到了安哥拉以東大約四十英里的鄉下。出了城市的範圍，你便進了古代的安納託里亞。這一帶有堅苦和力量，可以使你瞭解爲什麼土耳其國父決心不要現在叫伊斯坦布爾的傳統的奧托曼國都君士坦丁堡，而要把他的國都設在這個安納託里亞平原的中心。

就一件事而論，土耳其是一個難於攻侵的堅韌的國家。它那訓練有素裝備優良的小小的陸軍，的確能夠抵抗侵犯者的機械化部隊而長時保住這樣的一塊地方。

敵人在山裏放飼他們的畜羣。但是縱然在鄉下，也有土耳其改建共和以來十九年中奮力推行的改造的事實。人們正在建築通往東面的公路，我們從正在這條路上工作的亂路機和打石機旁邊駛過。這兒

有許多現代的渠道——有一天要把大部分安納託里亞變成繁榮的種植區的渠道。土耳其人以他們公共教育。灌溉的進步和工業發展引爲自驕，而且很盼望我們去看他們的工作。

在一個鄉村裏，我們首先參觀一個師資訓練學校，他們在水泉的周圍築了一所房子。房子是用水泥和玻璃建造的；它止在村子的中央。房子一邊是喝的水；另一邊是洗衣服的設備；有一道小溪供鄉村的兒童游泳。我站着注視這種愉快的發展時，看見一個房頂上坐着傳統裝束的戴着面罩的婦女。但是我也看見和我一樣注視着清潔的水泉的男女兒童——注視着某種新的，優良的，令人興奮的東西。

在短促的逗留中，我儘可能看了許多土耳其的工業。和可能侵襲它的德國工業比較，它的規模並不驚人。不過它的素質和它發展的前途是驚人的。我看見飛機場？機械化軍隊的裝備，鐵路，和最新式的建造工程。我看見了這一切和其他，我又相信產業革命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一個種族的獨占，內燃發動機喚醒了中東千百萬人民——喚醒了他們，也搗亂了他們。對於這些土耳其人，內燃發動機已經帶來了新的技藝和新的渴望。今天他們需要現代的世界，而且已開始學習怎樣使用現代世界的工具，再阻止他們是很難的了。

比土耳其在戰場中間進行的工業和經濟改造更爲驚人的，是已經發生的社會和教育革命。在外人的眼裏，服裝是對改革所持態度的表面象徵。在巴格達，我看見政府的官員有的穿西服。有的穿傳統的阿拉伯衣服。在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因爲順應古中國的習慣和服裝而受人尊敬。不過蔣夫入的中國裝

東，至少在一瞥之下，仍帶出一點時尙的風氣。在土耳其，每個官吏都穿西服，昂然闊步，紅色黑腰土耳其帽已依法廢止，這是改革的象徵之一。爲數寥寥的戴面罩的婦女已好似一種年代的錯誤。在土耳其國父及其後繼者的果敢幹練的領導之下，土耳其人確實取消了古代東方的面罩。他們從人民的臉上把面罩扯去，代替面罩的光明在那兒閃爍着了。

這個古老風俗的革命沒有經過武力或羣衆的不安便實行了。沒有攻陷任何別的國家便成功了。

在這方面美國有若干理由可以特別誇耀，伊斯坦布爾市外的羅勃次大學 (Roder's University) 雖然是多少年來如一日——一種大公無私的國際主義教育的實驗。可惜這次我沒有能夠看這個學校者。這個學校的畢業生有些坐在土耳其最重要的辦公桌邊。教授他們的先生唯一的目的，就是消除世界的一部分的迷信與愚昧以促進全世界更大的富足。他們把這些美國教授給予他們的知識和觀念着加利用。

但是甚而美國人也不易瞭解這個教育問題影響全部亞洲何等之深。我們對我們的學校和我們的書本，已經習以爲然。我們的孩子入學讀書，至於什麼或怎樣，是從來沒有置疑的。

在土耳其鄉下，你可以看見人民所不以爲然的教育。我站在一個小學生和他們教師建造的樸實的小小的學校裏，聽年青的孩子們唱他們的國歌，我看他們學習會在安納託里亞盛行的帶有古代技術姿態的民間舞蹈。但是他們在按照現代教育方法受教，他們研究科學的農業。我深信這樣地把書本向人民

打開是歷史上決定的事件之一。那是路上的一個抹角，而且是個不能向後轉的抹角。

現代的土耳其雖然年青，雖然它的人民對於自由和自治比較缺乏經驗，它很清楚地是個有所爲而奮鬥的國家。你且從和你接談的人的臉上看出這一點；從他們的話裏你也能聽出這一點。在安哥拉這種縣城裏和像埃里士耳其鄉，有見的那樣老農村里，也到處大聲呼喊着這一點。

但是土耳其人不僅打仗，這是很自然的。他們知道軍事的入侵對於他們新的成就是何等可怕的破壞。土耳其是個小國，它的一千六百萬人民沒有超越國界的野心，對於搖動這個全球戰爭的均衡也沒有幻想。所以他們決定了一個武裝中立政策。去年秋季，土耳其軍隊有一百萬以上。他們發展了一個軍事機構，這個機構堅決訓練許多現代軍事裝備中缺乏的若干部門。我和土耳其軍隊的團參謀長談話，在我所到的地方我總看見有他的士兵放哨，演習，在軍校受訓。他們使我深深感到他們對於任何打擊假道土耳其及征服東方的侵略國家，是個很可考慮的問題。

除去見過土耳其軍人而外，我還和政府的要人談了相當長的時間。這些要人帶着一種不知何時要捲入戰爭來拯救他們國家的焦慮，注視着歐洲。

那是一種難於忍受的可怕的焦慮。但是在土耳其沒有一個人會給我任何輕微的暗示，表示對於任何破壞他們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不予以猛烈堅決殘酷的抵抗。

我想這是勝過專爲感動外國人而虛構的任何故事。我和多才而可親的現任土耳其總理薩拉茹格魯談

話。我和繼續薩拉赫格魯魯作外長的外交家貝努門（Bay Noumen）談話。我和政府其他許多官員談話，和土耳其新聞記者、士兵、農民、工人談話。這些人都告訴我同一個故事：「我們不要戰爭或戰爭的一部分。但是越過我們國界的第一個士兵必遭槍殺，而且我們在山裏、樹林裏、和沿着我們公路停止射擊之前，要有許多死掉的外國人。」

他們常說「外國人」，而且時常強調他們對於從任何方向來攻擊他們的任何國家加以抗戰的決心。但是不用他們說，他們目前的恐懼顯指着一個方向。今天他們不怕我們，或者英國人（他們是土耳其的朋友），或者帶着重廠的俄國人，雖然他們疑慮俄國的最終計劃，他們目前的焦慮在西方，在最近幾年於歐洲建立起來幾乎認出他們領土伸入亞洲的一個頭重腳輕的強國。他們焦灼而且恐懼地看，因為他們不想打仗，但不驚慌，不懷一點緩靖主義的念頭。德國兩度企圖在他們的國都發動大的一「平攻勢」，但是都失敗了！

他們喜歡和我們往來。他們準備和我們作買賣。土耳其出產的路差不多佔全世界供給量的四分之一。各國也非常需要他們的煙草和棉花。土耳其使用這些財產，無論如何總能支持一時的自立。我終費苦心地發現他們需要食糧——特別是小麥——他們需要製造品和機器。我回來之後，知道我們把更多的食糧和其他物資運給他們，我非常欣悅。因為今天我們是唯一能夠充分供應他們的國家。我深信這樣做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能夠盡力阻止土耳其物資運往德國，保持想和我們交朋友的一個國家的

中立。

關於這個是沒有疑問的，幾近十年的戈培爾的重擊和他的納粹宣傳機構，沒有改變了覺醒的土耳其人民和世界偉大民主國家更密切聯繫的緩慢而深刻的趨勢。土耳其人是我們的朋友。他們喜歡而且尊重我們，他們不怕我們，也不嫉妒我們。

但他們的中立是認真實行的。例如他們不許我乘坐我環行世界的美國陸軍飛機到他們的國家，於是我只好在那種改搭汎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飛過地中海東岸和凹凸荒涼的陶魯斯山（Taurus Mountain）到了安哥拉；在我們降落的飛機場上，我們看見有嚴密監視下的三架解放式轟炸機。這是美國飛行員轟炸羅馬尼亞普羅斯納油田之後飛返途中被迫降落由土耳其扣留的。

我是在這個正確中立之下，却有一種誰都不誤會的熱誠。在我訪問土耳其期間。軸心電台對於我到土耳其的訪問發出極端惡毒，我對新聞記者說這個答覆是簡單的：「請希特勒派一個反對黨的候選人，代表德國對土耳其好了。」後來我發現這兩句話在土耳其政府官員之中造成了十分安靜的快悅之感。十分有趣的是，民族主義在土耳其雖然是有許多威脅的一個口號，但是土耳其及其官員比我訪問過的任何其他國家更接受超越他們目前需要的國際合作的請求。在總理，外長，及主要出版家和我想過的長談中，都向我強調這一點。

當然，像在各國的國都一樣，這裏也有一些國際社交的悅人的表現。一天夜裏，外長貝努門自安哥

拉市外設筵招待我。那是在土耳其國父的別墅裏——他在市區以外創辦的一個模範農場和牛奶場。最低限度他們告訴我那是個模範農場；我所見到的完全是三個小冊子的漂亮的現代宮殿。層層的花園結下向安哥拉方面紛延很遠。

這座房子裏有一間屋子現在給外長招待外賓之用，屋子裏有一具純金作的電話，是從前土耳其國父用的。在另外一間屋子裏有個舊式的作 *Onsai-Kobas* 的土耳其的機器；一個廚師把一大圓筒的羊肉在木炭火上慢慢轉動，將烤熟的表面切入飯碗裏。

我們的東道主貝勞門站在大跳舞廳裏。他是現在這個世代裏最有成就的外交家之一，他還在這般努力。他的健康不好，但是他的蒼白和孱弱正好加強他的禮貌的技巧，他似乎也在用這種技巧注視着歐洲和世界。我看他的心情也好像他的容貌似地有點兒憂鬱，有點兒激憤，很堅強，而且很精細。

我們盟國這方面的各國外交家在他的周圍跳舞，飲酒、談話。和軸心一鼻孔出氣的新聞記者來參加我在安哥拉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但是在土耳其的軸心外交家沒有混在聯合國的聚會中的。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事物。蘇聯大使返國述職，但是他的代辦參加筵宴了，穿着很正確的夜禮服——我沒有這樣正確的夜禮服——但是態度嚴肅，也不笑。另一位穿着韓羽衣的高身量的英國太太和他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後來我知道她的丈夫是在克里特島作過戰的，希臘和南斯拉夫的代表連袂而來把他們歐洲聯邦的計劃告訴我。另有一位外交家，他的名字我始終沒有知道——他很興奮也是極不正確地對我說，他

聽說英國有個翁叫康恩(O. C. C. C.)的翁德家^{德文}選把魯易斯(Joe Louis)打败了。相繼堂皇的阿富汗大使對我訴冤說他選擇駐土大使的位置主要地爲了打獵，現在才知道土耳其的戒備手段阻礙了他所愛好的娛樂了。

在這足可反映我們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形形色色之中，我的東道主貝努門是個出色的人物。饒他的前任薩拉赫格魯一樣，他沒有從貴族世家或某種主義獲取他的力量。他和土耳其國父及土耳其人民一起苦鬥了一個長的時期，現在他只有土耳其人民一起苦鬥了。那天夜裏我在他自己的筵席中細細着他，在這個宴會上，我們在外交界奇異的國露去美氣氛中喝英國的威士忌酒，吃俄國的鱈鱈，伴着美

國的音樂跳舞，從此發發相信土耳其人民在戰後的新世界中要佔一個相當的地位。我覺得貝努門像在土耳其每次見到都令我驚異的紅精藍體的兒童，或堅硬的鐵色面孔的兵士。或在維勃次大學學會溫雅流利的華席的學校教師一樣，是現在一半人類生命中發醇的龐大的藤素的形象化。他是一種古代人民的產品，而且是種可驕傲的傳統，他是他在自己的世代中經歷了任何人民沒有經驗過的一個長大的變化。

上次大戰時土耳其就在德國方面。這個新共和國的前身奧托曼帝國在世界各處都沒人說好的。裏面「土耳其人」這個字都是個壞字兒。變化是這樣地快，我們裏有許多人都趕不上，不到二十年的工夫，土耳其國父及其友人^{土耳其}家兒

努門和薩拉茹格魯——的非凡的奮鬥把他們的人民的力量和野心導入新的生活方式裏。

他們像中東的阿拉伯人，像中國的邊疆地帶或西南太平洋各島上的人，像印地安人似地，在現在這個世代之前沒有自治的經驗。他們幾乎沒有教育，他們有標準極低的公共衛生和療養設備，和一部悠久的剝削，貧苦，與悲慘的歷史，在短短的幾年裏，他們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他們的古代風俗，和他們的思考方式。

在土耳其我認識了一個女子，以特別現實的方式使我熟知了這些變化。她是純土耳其人，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子，她談話很寡的言語，她的談話是今天一切有智力的女子談話的典型。她在家伊斯坦布爾，但是她在安哥拉高等法院裏為許多案件發表辯論，她是個事業興隆的律師，是土耳其最出名的律師之一。我從看到她是個女子又是個律師，這件事情，並未引起特殊的批評。事實上我還見到幾個正在研究法律的女子，其中有政府官員的女兒。

這是在土耳其。我禁不住回想起僅僅四十年前我的兒時，那時我的母親積極從事律師業務，參加公共活動，在中部印地安那州被看作一件非常的事——幾乎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

第四章 我們的盟國蘇聯

九月十八日，星期四，我在裏海的上空飛進蘇聯國境。我們的飛機越過烏拉爾河沖積地上蒼紅色食鹽的泥濘的平原，再溯伏爾加河而抵達古比雪夫，過十天後，我方離開蘇聯，順着伊犁河從中央亞細亞的塔什干沿通中國的古代的運絲的大道飛行。後來，從中國飛回美國時，我們的飛機又在西伯利亞停降了三次。

我在俄國一共勾留不過兩星期。我以前從未去過俄國。我連一句俄國話都不會說，不過我同行的義國人中有擔任傳譯的。我讀了很多關於蘇聯的書刊，但我沒有讀過一本東西對那個廣大的國家給過我一個極清晰的描寫。最後，當我要去俄國之前，我開始想像，當我在蘇聯勾留之際我越發相信：那個國家是如此之廣大，它所經歷的變化是如此之繁複，除非用一生的研究和滿滿幾架子的書，是無從着手談論蘇聯的全部真象的。

蘇聯政府給了我一切的機會使我考察我要知道的事物，這是絲毫不假而且值得報告的。這使我能使用我自己的辦法檢閱它的一般工業，軍火工廠，它的集體農場，它的學校，它的圖書館，它的醫院，它的作戰軍隊；我在蘇聯走來走去，毫無拘束，如同我在美國旅行一樣，而且我提出許多問題——

意外的人們提出意外的問題——全然不受任何干涉，此外隨時隨地都有一位懂得說得俄語的美國人在我的身邊。

一個初次到俄國的人，免不了要時時追想它的過去。有一天黃昏，我在古比雪夫自己沉思着革命前的時代。我獨自漫步到伏爾加河西岸陡峭的河邊，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俯視着河水。蘇聯政府撥了河邊上的一個紅軍休息所給我們住。空氣已經冷得令人震抖了，不過樹上的葉子還沒有墜落。沿着河岸都是一些玲瓏別緻而更加漆加的「住宅」——俄國人很喜愛的一種郊外別墅——和松柏樹。空氣中有着一種深沉的寂靜和潛力，正和底下的河水一樣。松樹下面便是伸展到河邊的麥地，而那河水則浩蕩蕩地流向史達林格勒，在那裏，俄國的士兵正在破瓦殘垣中抵抗着納粹的坦克和飛機。

我坐處的下面，在河邊上，有一隻船剛剛卸完一堆紅楊木的木料。這一堆木料若散佈開來，恐怕要鋪滿好幾畝地。頓河盆地失掉了，軍需工場把一切可以獲得的煤炭都佔用了，於是俄國各城市在今年冬季只得靠這些木料取暖了。一個牧羊人領着一羣羊到河邊來。河的中央有一隻油船，裝滿了貨慢慢地順流而下。一位年青的俄國士兵在羊羣後邊順着小路走過來，用他的足尖無意地踢着石子到河裏去。當他取下帽子，微風吹散他的頭髮時，他越發顯得年青了，那時我便注意他的帽子上維有幾個字，表示他是一位祕密警察。

我於是回想起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時代，那個建築我身後這座房屋作為他的避暑地的造船主人。我

說？他是當地的一獨，頂有勢力的一個地主和米穀商人，當古比雪夫還叫做薩瑪拉時，他利用伏爾加河的運糧，很發了筆財。薩瑪拉的名字是革命以後改過的，以紀念當地出生的第一個孟希刺刺母起草人古比雪夫。這座房子因為紅軍認為有用，特別保存了下來，不過比起它鄰近的其他房子來，已經是很相形見绌了。

這似乎可以看出，在俄國革命的名下，整整一代的男女已給消滅掉了，家族離散，田園荒蕪，威于成萬的人民死於戰爭，暗殺，與饑餓之中。

那個時期的真正歷史恐怕永久沒有人會詳細地報告出來。因為除了很少數的逃往外國的以外，俄國的中層階級差不多完全給消滅了。

我在來到蘇聯以前並未體嘗到上面這樣的情形究竟正確到什麼程度。因為我在估量現代的俄羅斯時，並未充分考慮到一個事實，就是統治它和構成它的是這樣的人們，他們的父母幾乎都是沒有財產，未受教育的，有的祇是民間的傳襲。在今天的俄國，幾乎沒有一個大，他的生活不如革命前他的父母生活那樣好，或比他們還要好的。俄羅斯的每一個人，和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一樣，自然是擁護這頗改善了他的生活的制度的，而將實現這個制度的一切無情手段，置諸腦後。

不過，我不是為追想過去而到俄國去的。除了羅斯福指定給我的具體任務以外，我還決定為我自己找出幾個實際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是由於蘇聯——不管我們喜歡與否——客觀地存在於世之故，使

我們這一代的美國人面對着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有一些我相信我已找到了，而且至少在我個人認爲已經可以滿意。我可以把三個最重要的答案間幾句話概括一下：

第一、蘇聯是一個有效率率的社會。它行得通，它有存在的價值。蘇聯對希特勒抗戰的成就，已足以向我們大多數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我必須明白承認，在我去蘇聯以前我是沒有準備相信如我現在所知道的這樣，蘇聯在人的組織上有其偉大的力量的。

第二、蘇聯在這次戰爭中的確是我們的盟國。俄國人遭希特勒實力的殘酷考驗，有甚於英國人，而他們雄偉地應付了這極考驗。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納粹制度的憎恨是真實的，深刻的。尖銳的。這種憎恨使他們的決心從歐洲和全世界上消滅希特勒和納粹的惡毒。

第三、我們必須在戰後與蘇聯合作。至少在我看來，除非我們學習這樣做，否則似乎是不會有持久的和平的。

這些議論，經過我在蘇聯各地耳聞目睹的一切，更加信而有徵。我看了一部分蘇聯前綫，實地明白了一些紅軍的作爲。我看見了前綫後面的許多工廠。它們都出乎我們許多專家的預料，蘇聯的工人們正在大批的不斷地製造軍需品供給作戰部隊。我引看見了集體農場。在工廠與農場的後方，我還與蘇聯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會談過，他們使全體俄國人民都熱狂的感到自己處在參加愛國戰爭的十字軍中。

在新聞記者背後，我又看到克里姆林宮，兩次和史達林先生長談，並多少觀察出來無產階級獨裁在實際上怎樣運用它的政權。最後，在這一切的後面，我還看見了從俄維斯一端到另一端的俄國人民，我所會見到的也許是全俄蘇聯人口二萬萬中的一小部分，但好處是我完全是在偶然中會見了他們的。最使我增加見識的一次經驗，是出發到塞夫作戰前線去的旅行。要到塞夫去，必須驅車沿列寧格勒到里加的公路，向西轉赴克林，再進駛到前面一個鄉鎮，叫做斯塔里查的。天明時分，我們在斯塔里查換乘美國造的做達小汽車。和我同行的有美國軍事代表團副團長費蒙維爾將軍，布拉特列少將。米勒拉上校，美國駐蘇大使館陸軍武官，戰鬥機的四個旅伴，和我們的俄國嚮導。

在做達小汽車中我坐了十四小時，以致對這種車子的機關構造都熟習了。在那一望無際的大路上，長時間的奔馳着，越過許多粗劣的泥濘的道路，坐在車子裏顛仆起伏，使我生平第一次真正瞭解到我的父親從前常常說過俄國人間發印地安那州時作的故事。

我父親的這番話，是這道前線中將士們常說的。這道中將士們如此出色而且殷勤，簡直在我所遇到的人物中他是沒有不能忘記的一個。他祇有三十八歲，但已以中將階級統率着十六個師的官兵，在世界上是一個最重要的戰線上健鬥着。

他中細身材，體格強健，天生是一位馬上的戰士，兩條腿有些彎曲，顯露出他是哥蘭克的後盾，為人機警而富有活力。他帶我們進入他的地下室指揮部。她說明了他的戰鬥要圖，他們軍隊的部署，他

的攻擊計劃，及當時正在我們前方和左右猛烈進行着的戰局重大的變化。

他當時立即開始出動，準備繞過諾夫，切斷通向維雅茲瑪的鐵路。這項工作在我們返回美國後的數星期中便進行了。而且緊接着列寧格勒便宣告解圍。從他的隱蔽在一個山坡上的無花果樹林中的指揮所，我們可以看見並聽到距八英里的一個鄉鎮外進行的砲戰。

他的幕僚們那種熱心任事的精神使我驚異不置。列留盛科中將需要一開口，他的兩三位副官參謀立即站在一邊傾聽，等待他的命令，穿制服的婦女數目之多，也使我頗為驚異。我們在那司令部周圍的樹林中看到的觀測所，有她們站崗，在地下室中她們和那些軍官到一增見辦公。

我們又從司令部驅車前進，更走近火線，勘查了一個最近被紅軍克復的德國的強大據點。那原是一個小山崗上的村莊，現在却變為一片瓦礫，死屍還沒有掩埋。在一個廢墟的底下，我瞥見一個還未打開而有一半埋在土中的罐頭，上面有印文字寫着「午餐火腿」，我奇怪在這個全球戰爭中德國人在其他什麼前綫上得到的這種東西。

中將告訴我，他的部隊剛剛捉到幾個德國俘虜，他問我願意看看他們不。我說我願意，並且還想和他們談談。中將答道：「我已奉到命令，一切都如你所願意的辦到。」

我看了看他新近捉到的那些俘虜，一共十四個，凄苦地排列在那裏。我走近一些，再看看他們。然後我對自己說道：「這些衣履單薄，面容憔悴，像有肺病似的人們，就是那可怕的德軍，那在許多敵

意中我曾讀過的捷勝軍嗎？」

我開始通過傳譯人員和他們攀談起來。我問他們在德國時住在那裏，問他們的年齡，是否得到家信，他們的家裏自他們出征以後如何生活，我還問了許多許多其他簡單而親切的問題。在他們的回答之中，德國的軍事前線連最後的一點精彩也都消失淨盡了，這些士兵變成了形容悲慘的思鄉病者。有些大約已四十歲光景，有的還是十七歲的孩子。

我轉過去把我的印象告訴了列留盛科中將。

「不錯，威爾遜先生」，他回答說，「但是你不要過度相信。德國的裝備還是極優秀的，德國軍官也仍是多才多藝的行家。德國陸軍的組織是難與匹敵的。不過我們德國如能接濟我們所需要的裝備，紅軍是可以從高加索以至北極的每一個前線上把他們擊潰的。因為我們的兵員更好些，他們是為保衛他們的祖國而戰。」

我想他的兵員的確是更好，這一話從那一天和那第二天的一切表現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們是真正為保衛他們的祖國而戰。在前線後面的幾里路的地方，我們看見不少俄國農民趕着牛羣用的大車，載着他們所有的傢具，行李車後邊還帶着一頭牛，緩緩地沿着大路走。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非向後方走。而是朝向前方走。他們帶着原始的精力趕回到紅軍從敵人手中奪回來的土地上去。他們發現那些村莊除了光禿禿的煙囪外，一無所有，但秋耕的時季到了，於是他們趕回來。

一陣侵人的細雨——讓德國軍隊領先警管此後一兩個月天氣的滋味——阻止我們離開司令部，列雷盛科將軍便邀我們和他同餐。我們大約共有四十個人，蘇聯軍官，士兵，和他們的客人，都設法擠在一個帳幕裏面，我們吃的是煮熟的冷鹹肉，小麥麵包，番茄，黃瓜，泡菜，還用佛得加酒彼此祝賀。

在進餐時，我來假思索地請傳譯員替我問一問列雷盛科將軍，在俄國二千英里前線上他所防守的是多寬一部分。列雷盛科將軍面帶懼色看着我，傳譯員慢慢翻譯他的話說：「先生，我不是防守。我是在攻擊。」

我參觀了空軍前線以後，較前越發清楚地意識到，在俄國「這是一個人民的戰爭」這一句話，有其真正的意義。不折不扣，完全是俄羅斯人民決心與捷威希特勒主義。他們所曾經歷的和他們在未來數月中所將進行的一切，不能不令每一個美國人心驚膽戰。史達林在我去前線以前告訴了我許多關於蘇聯偉大犧牲的事實和緊迫的需要，並且我也親眼看到這兩方面的很多實證。

蘇聯人民死傷和失蹤的已有五百萬。西南部蘇聯廣大肥沃的農地都陷在敵人的手裏，那裏的出產品正在養活著敵人，而他們自己的男女同胞則被迫為奴隸，成千成百的蘇聯村莊都毀滅掉了，人民失去了家園。它的運輸系統都在過度工作着，工廠生產到最高限度，要求着全國儲存的油裏面，煤礦以最大量地出產。

俄國的燃料已感到缺乏。在今年冬天，俄國人的家中恐怕沒有多少煤可以取暖。甚至當我在莫斯科時，婦女和孩子們已經到周圍五十英里以外去找柴火爲冬季取暖之用。除了軍隊和重要的軍需工廠工人以外，衣物也很不易得到了。許多重要的藥品根本沒有了。

這就是我所得到的一幅蘇聯的時局畫。但是沒有一個俄國人談到逃開的話。他們都知道納粹佔領區中變成什麼樣子了。但蘇聯的人民——不僅是他們的領袖——我相信，蘇聯的人民已經選定不是勝利便是死亡。他們所談的，完全是勝利。

我用了一整天時間參觀一個蘇聯飛機工廠。我曾參觀過蘇聯其他的工場，糖菓工廠，軍火工廠，鋼鐵廠，鑄造工廠，電力廠。但是這一座現在設於離莫斯科很遠的飛機工廠，在我的記憶裏始終是最生動的。

那地方很大。我估計大約有五萬工人，分三班工作，每天出產的飛機數目是很可觀的。他們製造的飛機就是現在有名的「斯托里莫維克」式，一種單引擎的，武裝火力極強大的型式。這種飛機已被蘇聯發展成爲一種真正有力的新式武器了。它的飛行高度並不大，升起並不快，所以在實際上它還需要一個戰鬥機的保護。但是用來當做一種反坦克的武器，在低至而速的飛行，配以重火力，的確是紅軍的一種最有力的武器。

與我同行的有美國的航空專家，他們也證實了我的印象，就是我們在裝配廠的最後的一端看見開出

去在那工場近傍一個飛機場試飛的樣子，是很好的飛機。此外，最爲特別的，是保護駕駛員的裝甲設備，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各地任何種類飛機所不及的。我不是一個航空專家，但我生平參觀了很多工場。我睜大眼睛看，我想我的報告是公正的。

製造過程的各部分開，組織並不能算精密。斯杜爾莫維克式飛機的機翼是用蒸氣壓力壓縮過的薄木板製成的，上面包以漆過的帆布。木工間在我看來似乎過於仰賴手工方面，出品上也可以看出這一點。還有，有些電氣和製版部分也未免顯得原始一點。

除了這些例外不算，這個工場在生產和效率上，比我所看過的任何工場都要勝過一籌。

我把各個部分都仔細看了一遍。我看那些機器工具是從世界各地蒐集來的，從一件一件的商標上可以看出它們來自舍姆尼茲，斯種達，希非爾德，西西那提，斯維爾得，洛夫斯克，安特衛普。它們都得到很巧妙的利用。

這個工場中的勞工有百分之三十五是婦女。在工人中間有些不過是十歲的孩子，都穿藍布工人裝，看來係學徒似的，連工廠中的職員也一點不隱諱地承認說，小孩子们在許多部分中和成年工人一樣，每星期工作六十六小時，很多兒童擔任着車床上的細工，並且好像做得非常巧妙。

就整個說來，這個工場在我們美國人眼中看，用人太多了一點。它比美國一個相同的工場有更多的工人。但每隔三四部機器，必有一個特別的記號，標明那個機器上的工人是一個「斯達哈諾夫運動

「者」，意欲超過完成他的或她的生產定額。工廠的牆壁上懸掛着新鮮的顯然極榮耀的名單，上面是那些在不斷舉行的工作競賽中生產特別出衆的工人和廠間的名字。無論你隨便和哪個工人攀談一下，都會感到這種額外生產的刺激性。我們可以公正地斷定一句，這些刺激性大大抵補了技巧上相對的缺陷。

每一個單獨工人的生產力比起美國要低。蘇聯的官員毫不遲疑地向我承認這一點，在他們可以用教育訓練功夫改變這種情勢以前，他們解釋說，他們必須強調愛國熱誠以增加生產，甚至要動員他們所管號召的一切兒童和老人送來參加。我們這樣談話的時候，一架一架裝配完畢的飛機離開了最後的裝配間的廠門。測驗了它們的機槍和機砲，然後誠過我們的頭頂升入天空。

廠長是一位神清氣爽，將近四十歲的人，名叫特列契阿可夫，他邀我們在辦公室晚飯。我們穿過長條的走廊，裏面殘廢的機器在呻吟着，最後走進他辦公的那間樸素的屋子，裏面實行着全部燈火管制。在一張會議桌上陳置了「蘇維治」，熱茶，糕餅，通常的冷盤，和那到處都有的陣得加酒。在牆角上懸掛着兩幅錦幛，都是蘇聯森林官爲獎勵它的圓滿完成生產計劃而頒贈給它的。

特列契阿可夫表示請我提出各種問題，他準備一一回答。他坐在臺子的一端。他的黑色事務服前襟上祇有一個小小的繡着的銀星，我後來打聽出他是蘇聯文職人員中僅有的獲得這顆銀星的七人之一，它是「蘇聯英雄」的表徵。

經過一小時詳細的問答之後，我開始明白他這個人在任何我所知道的社會中都會成爲一個傑出的人。他沉重而嚴肅地證着，對他自已工作的國家的以及國際的緊迫性，具有完全的自覺，同時他徹底瞭解他這龐大工廠中每一角落的詳情。我問了他幾個問題。如每日出產飛機的數目，工人的確數，新托爾莫維克式飛機的最高的離實速度，這時候他便客氣但堅定地閃避開來。當我用更微妙的探詢試圖蒐集同樣的情況時，他的眼睛使閃着光芒，但他決不受愚弄致輕易洩露任何軍事秘密，正如英美的任何負責廠長不願洩露一樣。

他告訴我們說，這個工廠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間納粹的砲擊可以在蘇聯首都聽到時，整個從莫斯科搬出來的。它在全國作戰的迫切交通困難中運輸了一千多英里。當它重行建設起來以後，原有的工人依然照料他原來的機件，僅僅在兩個月以後的十二月間，它便在新的廠址開始出產新的飛機了。

他向我說，在那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的第一個冬季，工廠中完全沒有取暖設備，工人們在他們的廠房中燃起了一些炭爐，以免機器凍得發生障礙，當時工人們還沒有宿舍，他們只好依傍自己的機器睡眠，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季，情形便改善多了，例如，像我所看到的工廠食堂已能供給工人以簡單但很適宜營養的飲食。對我我知道在同一個城市中，市場上唯一可以買到的東西只限於黑麵包和馬鈴薯，而且價格非常昂貴。

晚餐完畢後，我開始詢問這位短小精幹的青年小伙子，廠長介紹說他是生產監督，他穿的是工人

服，戴着鐵匠的便帽，這差不多是蘇聯每一個產業工人的象徵。他是一位有訓練的工程師，聰明機警，對他自己的工作澈底明瞭。這是一位青年人在美國產業生活中很迅速地會提升起來，充任要職，成爲他所有同伴的領袖。他給我的印象是那樣的青年有爲的美國產業界的活脫份子典型，以至令我不得不想從他身上找出共產主義制度下有什麼鼓勵和引誘，能使他教育他自己，出類拔萃，工作了許多額外的時間而成爲三萬工人的一個監督。

他說這很榮幸回答我的問題。他說他今年三十二歲，結過婚了，有兩個小孩，他住家比一般工人好得多，平時還有一輛小汽車。

我問他道：「你作工廠監督所得的薪金比這工廠裏一般的技術工人如何？」

他想了一想回答說：「大約是他們的十倍。」

這在比率上講，便合美國的兩萬五千或三萬元年薪，也正是一個在美國負同樣責任的人實際得到的報酬。於是我向他說：「我這以爲在共產主義之下大家的報酬都是平等的呢！」

他告訴我，平等並不是現在蘇維埃關於社會主義所持有的觀念。史達林主義的社會主義口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他解釋說，惟有他們的發展達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後，那口號纔變爲「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還說，即使到那時，絕對的平等也仍不是必要的或大家所喜歡的。

「你經常有這樣的收入，是否能儲蓄一部分呢？」我繼續問道。

他笑了笑說：「是的，如果我的太太不過分揮霍的話。」

「你拿儲蓄下來的錢作什麼用呢？你怎樣投放它？」

「我用最初儲蓄下來的錢買了一棟好房子。」他告訴我。

「然後呢？」

「然後我們在鄉下買了一塊地方，我的家庭可以到那裏玩耍，我有假期時也可以去休憩，或者釣角打獵。」

「你買了這許多東西之後，如果還有剩下的錢作什麼用呢？」

「哦，把現金存下來，或買政府公債。」

蘇聯的政府公債是沒有利息的。我想到我生平第一次積蓄的幾個鎊，並想到一個人有錢應該盡可能用它再賺錢的道理，我便問他，看他怎樣回答我，「你為什麼不投資到一種可以得到豐富收入的事業中去呢？」

他帶着一種驚異的，甚至我想還帶一點鄙棄的感覺看着我。「威爾基先生，你的意思是說靠資本牟利麼？這在蘇聯是不可能的，而且不管怎樣，我是不相信那樣做的。」

我試着請他告訴我為什麼。於是他便給我講了十分鐘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理論，弄得我最後祇好用一個問題打斷他：

「那應該什麼使你工作得這樣努力呢？」

他「遲回答我」，「邊揮舞着他的臂膀」，「我管理着這個工廠，有一天我會做廠長。你看見這些獎章沒有？」他用手指給我看他胸前的「一串獎章說」，「這些是黨和政府賞我每而頒給我的。」他說着顯出得意的神情。「若有一天我做得好，黨就會派給我一些管理政府的職務。」

「但是，你若老了，誰照顧你呢？」

「我已積存下了一些錢，若是不夠，政府會派活我的。」

「你不會想自己佔有一座歸你自己私有的工廠嗎？」我問道。

「對於這個問題，他發表了一長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社會管理理論。他談着這些理論和他講習他工廠裏的寫作情形一樣。」

「『那麼，你的家庭呢？』我堅持地問道。『你不願意你的孩子們比你更好些麼？萬一你先於你的太太而去世，你不想想贍養她的辦法麼？』」

他不耐煩地說，「那都是資本主義的想法。威爾遜先生，我出身是個工人，我的孩子們的出身也會和我一樣好的。我的太太現在工作着，她祇要生病，總可以工作下去。當她不能工作時，國家會照料她的。」

「好了。」我又說，「倘若你的工作做得不好，你又怎樣呢？」

他苦笑一下，「我就會被清算掉。」我懂得所謂清算，輕則降級，重則處死，意義是很廣的。因為他顯然以為他自己是幾乎沒有把工作做糟的可能。

是時我又給另一個角度考驗他。

「假設說，在平時而不在此時，你不喜歡你們的廠長了，你能走到別的工廠找別的工作嗎？」

「大多數工人是可以的，但是要作爲一個黨員就必須在黨認爲我最有用處的地方工作。」

「但是假若你喜歡換一換另一種工作，可以做到麼？」

「那要看當局如何決定。」

「我知道你完全贊同口頭的經濟和政治的理論。但是萬一你有了不同的見解，你能表示出來，並爲你自己的見解而奮鬥麼？」

我聽聽用了十分鐘的敷衍，纔使他僅僅考慮一下這樣一個假設，而他的回答不過是聳一聳眉頭而已。這回是我表現不耐煩了，於是尖銳地說了一句：「那時你就沒有自由了。」

他這時顯得緊張起來，幾乎和我對敵似地說：「威爾遜先生，你簡直不懂得，我比我的父親和祖父來，已有了很多的自由。他們原來都是貧農。他們從來得不到讀書寫字的機會。他們是土地的奴隸。他們生病了，得不到醫生或醫院治療。在我們家庭的多少世代中，我是第一個打破了傳統，有機會教育我自己，使我進步，做些事業的人。而這就是我的自由。這在你看來也許不是自由，但是記

住，我們的制度還在發展的階段，有一天我們也要享受到政治自由的。」

我緊追一步：「一切都歸國家所有了，你怎樣會有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呢？」他又無止境地講了很多道理，都不外根據他所十分熟習的馬克思主義。

俄國的農莊也和它的工廠一樣，爲全俄戰爭而動員了。它們支持抗戰的能力真是希特勒所未料到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上驚天動地的一個偉績。

我們會乘飛機越過這些農莊，從最前綫的塞夫。一直到中央亞細亞和西伯利亞最遙遠的農區。原來我羅斯的農地延伸到大後方約六千英里。我想惟有在空中纔可以領略到這個農業大陸的廣闊無涯和它的形形色色。有些地方五穀長遍在遼闊平坦的原野上，一望無際，以至使我們的駕駛員凱特少校思念起他的台克薩斯州的故鄉。還有些地方，如塔什干有水渠灌溉的山田，看來又好像南部加里福尼亞州。

在古比雪夫的伏爾加河邊，我有一次親自走到農莊去看。我們乘坐一隻現代化的精緻的小汽船。我們沿着河岸看兩邊的樹林中隱約有很多富麗的屋頂，以前都是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富戶貴族的別墅，現在改爲勞動者的休養所了。它們使我聯想到在哈得孫河上乘船時所見的高樓大廈。不過伏爾加河比哈得孫河的水流得急湍多了。在河上我請司機的讓開一下，給我來試一試，突然間我們開到一個急流處，水把我們的汽划子衝到岸邊，那些伏爾加的船夫們看了高興得大笑不止。大塊的木筏子順沖下

去，上面搭着小草棚，住着人家，還有牛羊雞豬，整個夏季這些人從俄國北部的森林漂流到南方的都南去。

在古比雪夫，他們告訴我有一個計劃，打算在伏爾加河的彎曲處築一道水閘發展電力。我不是一個輕易會給政府電力計畫嚇倒的，但是後來我明白了這個計畫如完成，便會發出兩倍於美國現在最大的田尼西水閘（TVA），庫里大閘（Grand-Coulee）和波內維爾發電廠三處電力的總和，我不禁領悟到俄羅斯人們夢想和設計規模之大，實在與他們的森林和原野相符合的。

我們在伏爾加河的一個彎曲處上岸，改乘汽車到內地去參觀一個集體農場，那個農場以前是一位貴族的獵場。它一共約有八千英畝，住着五十五個家庭，平均每家有百四十多英畝的耕地。

這塊土地很好——一塊黑色肥沃的農地——但雨水不多，每年祇降十三英寸，他們不大施肥，耕種完全用鐵鍬。農產以大小麥和其他雜糧為主。每一英畝在一季中收割的大麥有十五個半蒲式耳（按四十蒲式耳為一噸），小麥則略小一些，但我想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算是很不壞的了。因為俄國的度量衡與我們的不同，而且盧布時值變動得很大，所以無從將它們出產的比數和價值同美國的比較。我們祇能打量那出產物的素質，似乎都很好。

這個集體農場上每個家庭都私有一頭牛，這些牛的牛種很繁雜，共同飼養在包括一棟一棟住房的小村莊的近傍。不過集體農場本身公有八百頭牛，其中有二百五十頭母牛，都是很優秀的種，飼養照料

得很好，牛欄是用磚砌成的，很寬大；地面鋪以三合土，裏面的柵欄都非現代化。照料牛隻很細心，廄舍整潔；管理牛體的婦女們向我解釋她們如何在看管和飼養上改良牛種。那些方法是科學的現代的。

在這農場上我只看見一個壯年男子，他是經理。大部分工作者是婦女、兒童，還有幾個老人。原來蘇聯農場成了紅軍後備兵的偉大泉源；在今天，飼養全國的無辜是紅軍的妻子兒女了。

經理就是這農場的頭目，也是一位資料學農業訓練的人，幾時而且階級。他計畫着農作，指導工作方法。當地每一個男女和兒童都聽他的指揮。

同時，他負責進行一切計畫和這農場在戰時經濟中的生產定額。他若成功，他的權力和身分便會提高；他若失敗，處罰也是很重的。

我對這每一個農場的經濟情形很感興趣，提出了好多問題，農場辦事處對每一個成員的工作都有詳細的記載。一個「工作日」是一個單位，但是特別的幹才是承認的，例如一個牽引機駕駛員在一天之中牽引了相當數的耕地，是可以當作做了兩個「工作日」的，細收麥梗到刈草的束草，或照看相當頭數的母牛，也可以算爲多做了兩個「工作日」。

這和農場和蘇聯大多數集體農場一樣，從政府所有的機器站租來牽引機和各種機械工具，付租金時不用錢，而用實物。此外，農場還要納稅，不是用金錢，而以實物代之。每當收穫之後，除了各種開

以外，所得的東西依照「工作日」的數目分配給農場的成員。

在這最後的農產品分配之下，每個成員所得到的數額可以到農場上的一個小商店去交換製造品，或實爲現款。不過，在理論上他們在付完農器的租金和賦稅以後，雖可以自由到各地售賣他們的出產物，事實上政府對集體農場的農民是加以各種壓力，使他們將產品直接賣給政府。我似乎察覺和我談過話的大多數農民都須多預備，但無法花出。因爲商店裏的貨物不多，而且由於戰爭幾乎收走了所有工廠和紅軍的需要品，貨品已日趨減少。

我們到這邊我經理家中午餐。他三十七歲，結過婚，有兩個孩子。他住在一座石砌的小房子裏，簡單樸素。那種氣氛和美國的一個興旺的農家差不多。他們招待的非常殷勤，大家歡笑，打趣，很是痛快。食品數量頗多，種類簡單但味道靈活。經理的太太親自做的菜。她再三勸喫。正像印地安那州的農家請客一樣。「威士忌酒，再喫一點吧，你簡直沒有喫到什麼東西。」當然，還有那無往弗屆的伏得加酒。但早沒有看見水。

我詢問那經理和他的太太，並和農場上幾個工作者談話；我想發現他們爲什麼沒有自己獨佔一塊農場的求要。我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人甚至覺得有點奇怪。不過經理解釋說，他和其餘的人們從農奴制下解放出來還不到一百年，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祖先都不會擁有他們所耕作的田地；他們覺得現在的制度非常美滿。

後來我聽說這個農場在物質設備方面比平均的要好一點，但是大體上它的經營方法是和蘇聯二十五萬個農場的集體農場一樣的，於是我明白了集體農場怎樣構成了蘇聯堅韌抵抗的一大支柱。

在蘇聯戰後的後邊，全國工廠和農場都整個動員起來，其方式之徹底，恐怕除德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一國可以與之比。在工廠和農場的後邊，有一付機器保護着全國動員使其完全徹底。

這一付機器就是起碼也是工業的一部分，是和其他部分同樣地在政府統治之下的新聞事業。在莫斯科，我和莫斯科的英國報紙發行人寇爾斯君（Gardner Cowles, Jr.）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男人和女人們站成長列，依次購買新聞紙。蘇聯的日報已發行到幾百萬份，但是還不能應付民衆的需要。

我在全蘇聯到過的所有較小的城鎮中看見一羣一羣的人們站在馬路上的玻璃櫥前面，讀裏面貼放着的「農理報」和「消息報」。人們在寒風中肩臂和膝立起腳尖來讀牆壁上的報紙。

我們飛往塔什干時，飛機比蘇聯任何一架越富的商用機都飛得快些。我們一到那個中央亞細亞的城中，因為居民好多年沒有看見美國人了，許多好奇眼睛都注視着我們。可是後來他們知道我們帶來了最近的莫斯科報紙，是塔什干任何人都未見過的，他們便紛紛過去看我們帶來的報紙，連官方的主人也離開我們專心讀報了。

我對這事很覺得好奇，無論到那裏我便詢問。我終於相信，報紙在蘇聯是政府手中為達成短期目標

向運用的一種最有力量的工具。這正和我相信學校是他們長期內最有力量的工具一樣。現在的蘇聯政府控制了全國學校和報紙達二十五年之久了，外國人對這個政府從蘇聯人民中間得到的支持以及號召他們犧牲的力量，還有加以過低估計的，那簡直是食古不化，不知所云了。

在莫斯科，有一天夜晚，我得到一個機會來檢查那種滲透在蘇聯報紙中的思想和情感。在莫斯科的美國記者可以說是我所知道的最幹練的一個陣容。「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卡爾（Walter Kerr）。「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斯比伊（L. Jani Spivey）。「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另一位記者奧都斯（Maurice N. Valins）。「紐約時報」的派克（Ralph Parker）。合眾社的夏皮羅（Henry Shapiro），美聯社的紀利德（E. I. Gilmore）和加西慕（Henry Oastley）。國家廣播公司的馬基多夫兩（R. B. MacIntyre）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勒蘇爾（Earl L. Suarso），「時代」與「生活」大雜誌的格雷布納（Walter Grebner）——我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城市，也許除倫敦外，都沒有看見過這樣一羣活躍，忠實，努力的外國記者。一天晚上他們中間有幾位邀集了一組蘇聯報人在一間大廳中間懷揣款，有傳譯人員但沒有一個官吏，由我盡量提出問題，絲毫沒有顧忌。

這是一個有趣的集會。在座的有蘇聯記者兼小說家愛論堡，他在法國住了很久，並且我相信他懂得西歐的情形比許多外國記者都清楚。當時還有瓦契霍夫，這是一位青年記者兼劇作家，他在塞把斯托波蘭保衛戰中一直工作到最後陷落的一刻那纔搭乘一隻潛水艇逃出的，後來寫了一部塞把斯托波蘭保

衛戰的故事，響動全國。此外還有葛遜，一位美聯的女記者。名記者西蒙諾夫也在場，他是當天從史達林格勒趕到莫斯科的，穿着俄國舊式的氈褲和皮靴。他寫了一部名叫「俄羅斯人民」的劇本，大約是當今蘇聯最負盛名的青年記者了。還有伊格那契夫將軍，那位六十多歲精神矍鑠的老人，他在一九一七大革命前曾任駐外國的武官，而今是紅軍機關報「紅星」的最重要評論家之一。

我們談的是煙囪內的鱒魚，喝着熱茶，暢談了大半夜。談話是兩方面的。他們詰問我關於第二戰場、關於赫斯的事、關於俄國需要美國更多的供應品和設備問題。他們的消息很靈通、熱心、好奇、不吝詞。但是毫無敵意。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一回大約是十年以來蘇聯報人和一個外國來賓舉行的第一次坦白直率，沒有紀錄的談話。

當日在座的戰時作家中沒有一個人違背了我們交換意見時互守秘密的信約。自然我也不難如此，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生今祇有這一次將報人告訴我，這事說出一點，他們是不至於誤解的吧。

有兩件事值得報告一下。

我曾問剛剛來自史達林格勒的西蒙諾夫，在那邊前線捉到的德軍俘虜表情是否和我幾天前去索夫前線所看到的德國人一樣狼狽可憐。我的問題譯成了俄語，但是沒有得到回答，另外一個人把話題談去了。

和傳譯的人同住了幾個星期之後，你對什麼都用不着奇怪，於是我重複了那個問題，依然沒有答

覆。這一回我等到大家的談話告了一個段落沉默下來後，第三次提出那個問題。最後還是伊格那契夫將軍回答了我，他是一位溫文有禮落落大方的紳士，同時也是當晚座中唯一的能說英語的俄國人。「威爾遜先生，自然你不大同意。當這次戰爭一爆發時，我們都設法搜尋德國俘虜。我們反復追問他們。我們要知道他們爲什麼來侵犯我們的國土。我們發現了很多關於德國人的和關於糾纏付他們的有趣的事實。」

「但是情形不同了。自從去年冬季我們把德國人擊退，奪回了許多城鎮村莊以後，我們感覺不同了。我們已親眼看見德國人以我們人民和我們家庭所施行的一切。今天沒有一個高尚的蘇聯報人願意同一個德國人對談，即便在集中營裏。」

那天晚上我又重復擴大以空歷次的提議，請蘇聯派送他的偉大作曲家夏斯塔科維支到美國去一趟，一定有好處。頭一天起我就曾坐在擠滿聽衆的莫斯科的大音樂院「柴霍夫斯基會堂」中聽夏氏的第七交響樂，那是硬性的音樂，我極不易欣賞它，但它的開頭的樂聲真是我所聽過的最動人的音樂。我對大家說：「我們一定要互相了解。我們一定要學着彼此懂得對方。我們身戰爭中是盟友，美國人民在華浩希特勒以前決不會讓他們吃虧下去。不過我願意看着我們能在和會中乃至以後的歲月中都通力合作。這就需要有極大的忍耐力和容讓，以及雙方相互的深刻瞭解，爲什麼夏斯塔科維支不能派到美國去呢？美國已經對他有極多的愛好者，而且他去那裏可以大大促進我們這種相互了解的鉅大任

務。一

這回是西蒙諾夫答覆我了。

「威爾基先生，了解是雙方的。我們正努力學習美國。我們從你們那裏得到很多借鏡，而且派了我們的好的人材去美國研究。我們已經知道了一些貴國的情形。雖然還不若我們想知道的那麼多，但是已經夠使我們了解爲什麼你邀請夏斯塔科維支去美國了。」

「你們應該派遣你們的幾位優秀人材來研究我們。那時也許你會明白我們爲什麼對你邀請夏斯塔科維支一事沒有熱烈的響應了。你看，我們正從事一個生死存亡的鬥爭。不但我們的生命，而且三十年來支配着我們生活的觀念，都決定於今天。克魯索與格勒的爭奪。你現在竟向我們提議，說我們應該派一位音樂家到那也在從容戰爭並且生死存亡預下的美國去，用音樂來告訴你們一些等於臉上有鼻子一樣簡單的事物，不啻是一種侮辱我們的可恥辦法。請你不要誤會我。」

我想我沒有誤會他。

這天晚上還有一種值得報告的氣質，就是鎮定、沉着、自信、和愛國熱情。對我們華國人多少年以來都談着關於俄國的恐怖故事，而很少見到其他方面的實況，因此很難體會到目前蘇聯的一代人物是如何具有堅強的自信。我後來在中央亞細亞與西伯利亞對這一事實印象極深。這種氣質，我在美國尤其是在西部，知道是頗爲普遍的。

在莫斯科，我和史達林有過兩次長談。當時所談的事情，我沒有隨便洩露的自由。但是關於史達林本人，似乎用不着過分拘謹。他是這一代最有意義的人物之一。

我應他的邀請，在一天晚上七時三十分去拜訪他。他的大部分會議顯然都是在夜間。他的辦公室不大不小，約為十八英尺寬，三十五英尺長。壁上懸有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的肖像，還有列寧和史達林在一起的半面像。這些像片可以在差不多每個蘇聯的學校、公共場所、工廠、旅館、醫院、以及私人家庭中看到。有時候你還可以在這些之外看見莫洛托夫的肖像。在辦公室外面的前廳中放着一個很大的地球儀，直徑約有十英尺。

史達林和莫洛托夫站在長形會議臺的遠邊的一端歡迎我。他們向我簡單寒暄了幾句話，隨後我們便長談了三小時——關於戰爭，關於將來，關於史達林格勒和前線，關於美國的地位，英、美、蘇的關係，以及許多其他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問題。

過了幾天，他為我設了一次招待國賓的筵席，我和史達林在酒肴之間並肩而坐達五小時之久。飯後，我們在另外一間屋裏靠着小桌子喝咖啡，最後又一同看關於莫斯科被圍和防禦的一張影片。

在這一次筵席上。我們偶然地與杯祝賀我們的傳譯員。我們已經與杯祝賀過我們彼此的國家和領袖，我們祝賀了蘇聯人民和美國人民以及我們對永久合作的希望。我們又相互祝賀了一番。最後我感覺席間真正喫力工作的人是傳譯員，他們忙着說來說去。於是我提議舉杯祝賀他們。我當時向史達林

說：「我提議乾一杯賀傳譯員，這不算違反常規吧？」他回答說：「不，一點也不，感爾基先生，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依我判斷，史達林身長的爲五呎四五吋，大有短小肥碩的模樣，我發現到他的身材如此低矮，倒喫了一驚，不過他的頭，鬍鬚，和他的眼睛都是大的。他的面孔在沉靜時顯得堅實。那是九月間，他看來相當疲倦——並不是外邊常常誤報的患病，而是疲倦得厲害。他是應該疲倦的。他說話沉着敏捷，常有一種質樸剛人的命令。當他叫我描寫俄國在燃料，運輸，軍事裝備和人力方面困苦的情況時，他真是令人感人的。

我問他說，他有一付冷靜，沉澱，勇往直前的意志。他提出許多實事求是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把手槍裝有子彈似的，在一個高處的使用。用意都在一針見血，直搗敵人他所關心的問題的於心。他放棄一切客氣的虛言，去不顧煩瑣絕望的計劃。

當他問到蘇聯的軍事問題時，他要求詳細的報告，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而不是關於它們操作方法和效率的空泛議論。當我問他關於史達林三勒的情況時，他很邏輯地對我講述不單是它的地理與軍事的重要性，而且還有它的防禦成功與失敗對於蘇聯，德國，尤其是中東方面的精神影響。他不對蘇聯能守住史達林格勒發表預言，並且誓釘鐵鎚地說，無論是祖國愛還是單純的勇敢都不能保全它，戰役主要是靠力量，智巧和物力來決勝的。

他一再向我說，他們的宣傳是特意增強人民對納粹的憎恨，但是很顯然地，他本人對於希特勒將俄羅斯佔領區中百分之九十四勞動人口移殖到德國去那種手法，還是相當佩服的，而且他得尊重德國軍隊尤其是德國軍官那種全然專門化的訓練。正像邱吉爾兩年前在倫敦向我所說的一樣，史達林也不苟同一種說法，即認為希特勒不過是一羣更有能力的人們手中的一個工具的那種說法。他認為我們不應當過早估計德國內部的動搖。他證擊敗德國的方法，是消滅它的軍隊。而且他相信，消滅對希特勒在全歐洲不可擊敗的信心的最好方法之一，是不斷的轟炸德國城市和德國佔領區中的碼頭工廠。

當我們談到戰爭的，因和戰後世界所將遭逢的經濟政治情況時，他的見解深遠。他的情感極其細正確，而且他的思想的冷靜的現實性，非常顯然。史達林是一個剛直的人，甚至也許是一個殘酷的人，但他是一能極能幹的人。他沒有什麼幻想。

他對美國生產方法的嘆服，簡直可以使美國全國製造家協會快慰不置。但是他不能明瞭進行戰爭的指導混亂情形和民主方法的一些牽制。例如，他奇怪為什麼民主國家不為戰爭的目的而強制使用若干根據地，尤其是那些態度不合作而決不能自己捍衛的那些國家所有的根據地。

完全與一般報道相反，史達林深深敬佩邱吉爾；他幾乎向我說出了這話——這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對另一個偉大現實主義者的敬佩。

史達林在私生活方面是一個質樸的人，沒有特別嗜愛或矯揉造作，他不設法以任何人為的儀節討好

於人。他有一種健康的幽默感，遷就無邪的笑語或巧妙的對答，他傾大笑。有一次我告訴我所看到的蘇聯學校和圖書館——它們在我看來是如何地優良。我接着說：「不過，史達林先生，如果繼續教育着使繼續的人民，首先你要知道的一件事，便是總會把你自己的教育得無事可做了。」

他聽了這話，仰頭大笑，笑個不止，在那兩晚長時間的晤談中，我沒有說過一句話或聽別人說過一句話使他如此之愉快。

史達林穿的上身是藍青色——他那著名的短襖是精緻毛呢做成的，帶淺綠色的，褲子有時穿的是淺黃色的，有時是藍色的。他的長筒皮靴總是黑的，繫得很亮。他不在乎一般的社交上的修文飾節。當我第一次和他會談完畢辭出時，我對於他耽擱那麼長的時間，且兩說佈公地和我談話，表示謝意，他極示不安地說：「威爾遜先生，你知道我是喬治亞的農民出身，我沒有學過說漂亮話。所有我能說的，就是我很喜歡你。」

史達林這種質樸的作風，不可避免地對其他蘇聯領袖造成了一種典範。特別是在莫斯科和古比雪夫兩地，一點也看不出領袖們的顯赫。他們的衣着都極簡單。他說話少而注意聽話。他們極大多數是年青的，不過三十多歲。史達林似乎喜歡在他的左右多有青年人，這是我所推測，自然我不能證明。和我長談過的其他領袖，還有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和他的副手維辛斯基及洛佐夫斯基，前國防人民委員長伏洛希羅夫，供應人民委員長蘇聯對外貿易機構的首長米高揚。他們每人都有教育家

養，關心外國形勢，無論在豐度，姿態，和談吐方面，都與我們漫畫中那種粗獷的布爾塞維克黨人完全兩樣。

在古比雪夫，維辛斯基先生有一次設宴招待我。他是四五年前蘇聯審判那些叛逆罪時的最高檢察官。席間我特別注意到他那銀白的頭髮，他的教授式的面孔，他的安詳的舉止，研究的態度，我不禁懷疑他究竟是否以暗殺和叛國罪而肅清俄國革命若干舊時英雄的那個鐵面無私的人。這些人每將話題引到戰後和平，以及戰爭結束後世界應該準備做些什麼事時，他們的談吐中富有政治家風度和實質的瞭解。

自從我返回美國後，史達林先生擬訂了一個英美在歐洲戰爭中的聯盟。他的目標如次：

「種族特權的廢除，民族平等，它們的領土的完整，被奴役民族的解放，它們主權的恢復，第一民族依照它的願望處理本身事務的權利，對於受難民族的經濟援助，對它們爭取物質福利的協助，民主的各項自由的恢復，希特勒式政體的毀滅。」

我們可以質問：史達林的真意果然如此麼？有些人會指出，僅僅兩年前蘇聯還與德國結為權宜的同盟。我對於權宜，無論它是軍事，政治的，臨時的與否，不作辯護。因為我相信權宜之計在精神上的損失總是超過暫時的收穫的。而且我相信權宜之計省下來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劍取出的二十滴血來補償。但是一個蘇聯人覺得當時與德國結盟不過是延宕時日而已，與慕尼黑會議中的民主國比較起

來，並與美國在一九三七與一九四〇之間以七百萬噸最上等鋼塊，輸往日本之事比較起來，並無顏色。如果我們看到蘇聯千百萬人民爲捍衛祖國而犧牲以及六千萬人民已淪爲納粹的奴隸；看到另外成千百萬的蘇聯男女在工廠礦山中每週狂熱地工作六十六小時，爲前線戰士生產製造戰爭用具；再看到那些大工廠以類似神蹟的搬運力移幾百英里以外，脫離納粹威脅而繼續生產，那種種的努力——那麼，我們對於史達林的聲明，也許更加信而不疑。因爲祇有在人民的態度中間我們纔可以找出史達林目的的最好解釋。

民主國家中許多是害怕和不信任蘇聯的。他們耽心一種經濟制度的侵入會毀滅他們的制度。這種恐懼就是搶劫。蘇聯並不要喫我們，也不會欺哄我們。自然，除非——而這是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的——除非我們民主的制度我們的自由經濟由於濫用和實踐中的失敗而使我們變爲軟弱的不堪一想，那是另當別論的。對於共產主義最好的回答是一種生動的，活躍的，大無畏的民主——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民主。我們所要致力的是站立起來依照我們所宣示的理想去完成。惟有如此。那些理想纔能安全無恙。

不，我們用不着害怕蘇聯。我們需要學着與它合作打擊我們的共同敵人——希特勒。我們需要着與它在戰後世界中通力合作。因爲蘇聯是一個有動力的國家，一個富有活力的新社會，一種任何未來世界中不能忽視的力量。

第五章 雅庫次克共和國

今天人們心裏有許多關於蘇聯的問題。共產黨在蘇聯人民生活中間是怎樣的活動的？是不是他們的人民都能豐衣足食？他們對戰爭怎麼感覺？蘇聯還能發展他的資源到怎樣一個有效的社會？

這些問題都不需要單地幾句話所能說明的。蘇聯幅員廣大，大過美國加上加拿大與中美。也許情形在這廣大土地上的某一方面是如此，別一處可並不如此。不過，在阿伯利亞一個名叫雅庫次克的共和國裏，我的確談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這答案是值得報告的。

雅庫次克的故事——就是它過去的歷史和我自己所看到的——告訴了我比任何我讀過的書籍更多關於俄國革命的詳情。不過，我所看到的這些事情沒有把我變成一個共產黨人。而實際上却使我成爲美國制度的更堅定的信仰者。而且更殷切地爲它出力。但是事情也的確使我相信了，俄國人可不是不能相處的無情的人，同時給世界和平與繁榮，將需要美蘇兩國人民的合作互助。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雅庫次克過去的歷史。雅庫次克人是中西細亞的一個民族，在成吉思汗的時代，給蒙古人迫往北方。從前，他們大部分人靠獵取獸皮和採掘金子度日；他們居住在屋頂低矮，地面狹窄，煙滿了窗裏面的煙的屋裏，牛和人就擠在一個房子裏，疾病和頻年的饑餓，把這一批強壯的

人民消滅了大半。

後來俄羅斯人慢慢地遷到這國家裏來，不過，一直到最近數目還是不大的。當沙皇的時代，雅庫茨克一向以肺癆，獸皮和梅毒著名。兇犯和政治犯被充軍到這個地方，其中曾有詩人普式庚，許多經過那裏的苦生活的人，寫文章的時候，那稱雅庫茨克爲「人民之獄」。

當我們那架「解放者」一式轟炸機停落在這共和國的首都時，九月間的初雪已掩蓋了這個機場。我們用了幾個鐘頭飛越森林地帶，這地帶橫貫在西伯利亞北部，一直延到北極圈內。這地帶空中俯視下來，顯得既大又空曠的寒漠，只留著幾條公路和無止境的雪和樹林。當我們下飛機時，站在機場一邊的一小隊人中開有一位向前走來。

他說，「我的名字叫摩拉諾夫，我是雅庫茨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我奉史達林同志的指令，當你在北地的期間內，負責招待你，陪你看一切所要看的，回答你所有要問的問題。我們歡迎你！」

這雖然是短短的幾句話，可是他什麼都說明白了。機場上的人一共不過十二個人，可是這個人也帶有濃歡迎外賓時圍着軍樂隊和儀仗隊的代表們的威儀。

我向他致謝，並說明我們只是停一會兒，這一天還可以有繼續飛行的時間。

「不，威爾基先生，你今天不能走了。」他回答說。「也許明天也還不可能，因爲氣象報告說天氣

不好。保證你安全到達下一站路也是我所受命令的一部分。」

於是我們駕了一輛蘇聯的黑色大汽車開進雅庫茨克城，在從飛機場到城區的路中，我們試圖地尋找以前在別處這樣的路旁常見的集中營，他往往是四周密圍鐵蒺藜。四角都設有崗亭的。但是在雅庫茨克就沒有一個，或者至少我們就從沒看見一個。

當我們的車子開近城區的時候，摩拉託夫問我：「威爾基先生，你在雅庫茨克希望看看什麼呢？」於是我問：「你們有圖書館嗎？」

「我們自然有一個的。」

我們一直就往圖書館去。摩拉託夫引導我們一行直接走到閱覽室，沒有停下來脫大衣和帽子。這時突然有一個態度安詳，身材苗條的女子在門口還往我們，她一點也沒有因為摩拉託夫那種顯然的官樣的裝扮而感覺羞怯，她謙和地但堅決的說：「我們在這裏不僅要教育人民讀書的習慣，而且要教給他尊重禮節的習慣。請您走下樓去，將您的帽子和大衣放在儲衣室。」摩拉託夫露出驚異的樣子，開始辯論了一會兒，但他所得到的最大讓步，是我們可以將大衣和帽子放在她的辦公室裏。我幾乎要大笑起來了。

在那一間雖然古老而很明亮的，標識清楚的房子裏，藏有五十萬卷左右的書籍，而全城居民不過五萬人。書架是木製的，運書到閱覽室去的機器正象一個舊式的鄉村井邊的轆轤一般在轉動着，閱

覽室裏坐滿了人，分類目錄是新穎而且完善。登記表上可看出過去九個月中閱借出次數達十萬次以上。牆上掛有一些特別的陳列品，期刊和一些參考物都放在任人閱覽的書架子上。空氣感顯得十分緊張。無論那一個城市，有這樣一個圖書館都是可以驕傲的。

我們的旅館是雅庫次克唯一的旅館，是一座新房子，用大木料砌成的，每間屋子有一座俄國式的爐子。裏面有很多像貌堅實的人物，穿着皮衣服和鹿皮的靴子。姑娘們兩腮紅紅的，頭上圍着手帕。她們直楞楞的注視着我們，一會又把頭扭過去笑了。原來我們都是外國人哩。

這城市從許多方面看起來，很像三十年前美國的城市。他的確在生活方面有許多事實引得我回憶到我們自己早年的日子——特別是那種熱情簡樸的風氣，忠厚的態度，充沛的活力。大街兩傍的人行道用木板築成，恰像我小時在印第安納的艾爾伍特城所看到的一樣。

可是，再有許多事物叫我認出這兒是西伯利亞，不是美國。大半屋子是木造的，四週圍的氈毯，屋宇正面遮着複雜的本地製的毯形裝飾品。招待我們吃的食物也是西伯利亞式的——往往是牛腰烤豬，燻茶、雞蛋、牛酪、湯雞、小牛肉、蕃茄、醃品、酒和一種強烈得連蘇聯人喝也潑水的伏特加。甚至早晨都喝特加，茶是整天不停的煮着。這裏究竟是寒冷的地方，雖然我不相信我們旅館外面的人也會像我們一般吃法，他們顯然吃的相當多。

我想知道這地方的娛樂情形，所以問摩拉託大：「你們這兒有戲院嗎？」

他們有，因此當晚我們就到戲院去。我們走進戲院一坐下來，幕就開了。我們看到一個吉卜賽的歌劇，由旅行中的一個列寧格勒的歌劇團演出，跳躍優美，表情動人，歌聲尤其宛轉。雖然這個戲已經連續演了九場，戲院並不十分擁擠，可是觀眾的交聲却十分熱鬧。這一晚，戰爭似乎遠離——這些年青的觀眾。第二天清早我們踏着新雪去參觀當地的博物院，那裏就陳列着許多提示戰爭的生動的事物。牆上用以表明學校、醫院、牛羣、零售買賣增長的圖表，都截止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好像與國人的生活都在這時候停止了似的。他們對於我每一個問題的答覆的後面都接着言個解釋，說是要不是德國人使他們所有的民政計劃警告停止，一定有好些惡的成績做出來了。

摩拉託夫給我一塊真金的型樣看，那是現在雅庫次克最大的富源，還有一種「軟金」——皮毛——的樣子，那是第二種珍貴的產物，在那些黑貂皮、狐皮、和熊皮中間，有些北極兔和松鼠的軟皮。據他解釋說，這些小動物的皮如果不受一點兒損壞，用槍打的時候，務必需打中他的眼睛。當我對打松鼠必須打中眼睛這行業是否還能過得去這一點客氣地表示懷疑的時候，摩拉託夫也還堅持他的說法。他說，所有這些松鼠的獵戶被征召加入紅軍的時候，都自動請求補充射擊手。

這天白天，我也隨時感覺到戰時景象，雖然雅庫次克離開前綫有三千英里之遙，我們發見許多平民，他們多半有生以來從未見過德國人也未見過烏拉山，也熱心地在談論「保衛祖國的戰爭」。

我問摩拉託夫他爲了教育人民做了些什麼。

第五章 雅庫次克共和國

他說：「威爾基先生，這回答很簡單。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雅庫茨克的人民中間只有百分之二識字，百分之九十八不能讀也不能寫。現在數字是恰好顛倒過來了。」

他接着得意地笑着說：「而且，我現在已經從莫斯科接到一個命令，要在今年底以前清算這百分之二的文盲。」

「清算」是蘇聯通行的一個名詞，它可以解釋為一項預定工作的完成，也可以解釋為監禁與處死，我記得我們會訪問過的一個集體農場的幹事的命運，他則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原因是他餉牛中間有一百頭死了，他不能清算這不幸的理由，因此他自己也被清算了。

摩拉託夫驕矜地領我到雅庫茨克最新的電影院，那是用鋼骨水泥建造的樓房之一，他因此之故打破了一個陳舊的觀念，就是以為在永久冰凍的土地上只能建造木製的房屋。

城裏面最大的一座房子專設給本地的共產黨黨部。過去我時常奇怪全蘇三百萬黨員究竟怎樣對二萬萬人民宣傳與控制的。這次在雅庫茨克我開始明白了這一個過程。

城裏面沒有其他的團體，沒有教堂，沒有祕密會社，也沒有其他的黨派，大約雅庫茨克五萬人口中間有百分二到一點之五是黨員，這七百五十個人中間，包括有各工廠的經理，政府官員，大多數的學生，學校的校長，圖書館員，教師等，換句話說，在雅庫茨克正像在蘇聯大多數地方的社會一樣，社會上那些心教育好好的，最機敏幹練的人都是共產黨的成員，他們使黨擁有權威，這就是那歷期的等

覆。

再說，這個共產黨機關的入黨資格是經過嚴格規定的。舉例說，有一個人希望介紹一位朋友入黨，他一定要三思而行之。因為他知道如果他的朋友出賣了黨，不僅他們朋友遭受困難，就是介紹人的他也一樣受罪。

美國人不喜歡那一種一黨專政的制度。但是我在雅庫次克找到一件事情，證明是蘇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是最優秀最進步的美國必然讚揚的事業之一：就是它處置少數種族與民族的可怕問題的成就。

這個城大多數居民依然是雅庫特人，他們佔這個共和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在我所能看到的範圍內，他們的生活和俄羅斯完全一樣；他們身居要津，寫自己的詩歌，有他們自己的劇院。由莫斯科任命的大吏多半是俄羅斯人，但民選的官吏就大半是雅庫特人了。學校裏發着兩種語言。街頭的戰時標語也是以兩種文字印成的。

在這個蘇聯的西伯利亞島嶼，很少事物再比這主席薩拉託夫使我更感興趣了，如果說雅庫次克這城市提供我若干問題的解答的話，那麼薩拉託夫算是給我認識這若干問題的關鍵。因為他既是管理蘇聯的一般新人的典型。在他大部分個性和生活上，他却是很奇妙地正和我見過的許多美國人相像。

他是一個矮胖子，臉上常帶笑容，面頰修的很光。他在伏爾加河的薩拉託夫地方生長，是一個工人。

的兒子，因為他聰明，他被從奧達林格勳一所機器店裏選出來授以特別訓練。他曾先後在中小學，大學，莫羅特爾克等各科的前最高學府教授研究院作過研究工作。兩年以後他被調派主持這雅庫次克的人民教育，他於三十二歲，即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才到，經營着這個大遼蘇聯共他共得國，較得同五倍還大的共和國。

在兩次大戰間我知曉了關於庫拉託夫許多的事情。他確實是一個可能在任何國家裏面工作得很好的人。當我與他同去雅庫次克經濟發展的時候，他的談話正像一個加利福尼亞地產推銷員。我因他之故，一再想起我們美國日已迅速發展的時期。

「威爾遜先生，你想？我們成立雅庫次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是在一九二二年。從那時候起我們已經增加了行政預算達八十倍，每一個住在此地的人，他們心裏和肚皮裏都明白這一點。雅庫次克在地圖上往往只是一大塊白地。這一個月，我們的價值在全蘇聯最發達的競賽中獲得第三位，我們還有新的計畫進行，一接連地說盡了我一大堆數字。

「他主要的軍力最近則在全蘇市立冠軍的競賽中獲得冠軍，因為它把生產成本只化到六點二七個戈比一個瓦特時，他對我解釋這些數字：一半是這十項，自保衛祖國戰爭開始以來，已節省了三七萬盧布。」

「他又說」二十年中我們雅庫次克已投資十萬萬盧布。今年我們要採伐四百萬立方公尺的木材？

一九三五年可只採了三萬五千立方公尺。按每年生產的情形，我們還可以增採很多。我們估計每年生產的數量約有八千八百萬立方公尺。

「當這次戰爭完了之後，你們美國就需要木材了，我們則需要各種機器。只要我們把北極的航路打開，我們和你們可就相距不遠了，你們來取木材吧，我們樂意和你們以貨易貨。」

我當時親眼看到他這些辦法，決不是推銷員的濫詞。雅庫次克離開鐵道線一千二百英里，今年他們造築了一條路而堅實，全年通行的公路，要把這個共和國經由西伯利亞鐵道和莫斯科接通。以往他們只靠着航空和通北冰洋的列那河維持交通。

黃金和皮毛都是貴重的貨品。可是有史以來這些東西都沒隨路可供運輸。現在在雅庫次克，蘇聯考察隊又發現了銀、鎳、銅、鉛、煤等許多礦藏。雖然礦源的詳情是一種軍事祕密，但是摩拉託夫告訴我，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以前就要開採。開始營業。在魚、木材、和食鹽方面，這國家還有大量未經開發的資源。

至於農業，大部分農莊都已集體化，去年九月間已到百分之九十七。馴鹿是這地方主要的原動力，但是現在大約也有了幾百架拖曳機和一百六十架複合機，「威爾基先生，你想，在北極圈裏面有了一百六十架複合機啊！」人數很少，但在逐漸增多的專家們，正竭力要使這冰凍的北極苔原變成花園豐饒之地。

這些人以及其他經營製革、木材和礦冶金工程的人們，的確具有一種熱力與自信心，這些都一再使我記起當年我們自己與西方擴展的生動故事。我懷着一種十年以後雅赫次克會變得怎樣的強烈節好奇心，離開了他。在今天也許任何訪問蘇聯之處地方的人會不喜愛它的無神論，也許會對共產主義者的理論感覺困難，但是沒有一個接觸過這些人民並和他們會着過的人，不承認他們已經建立了現代最有效力的社會中的一個。

蘇聯現在對美國極致讚揚。我們必須明瞭蘇聯。這兩個得天獨厚的國家，在現在和戰後世界中都必須設法合作才好。由於蘇聯目前在戰爭中作巨大的貢獻，它是決不會於戰後被忽視的。

第六章 中國繼續在抗戰

如果我們要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取真正的勝利，對於遠東的人民就必須有透澈的瞭解。在我們直接作戰的第一年中，大多數美國人已經認識亞洲的戰爭並不是歐洲戰爭的續曲。但是如果我們希望進一步避免未來的戰爭，我們就必須知道在世界上這個廣大區域中活躍的勢力。我們需要知道那些對我們友好的人們，而且我們需要充份誠懇地支持他們，至於這樣做來對我們關於世界的傳統偏見，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則在所不計。

正因為我深刻感到我們與遠東方面的新的聯繫，我便決心到中國去。我這次的旅行最初在華盛頓討論起來之後的幾天中，因為總統明白表示我不宜到印度去之故，交通的困難似乎使我到中國去的打算極其難於實現，但我們一離開紐約後，這種困難就消失了。

我動身前幾天曾在華盛頓與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同桌喫飯。他向我公開坦白地說到他的國家的財政與軍事方面的種種困難，以及他對於聯合國實現一種真正統一戰略的希望。他以為惟有這樣一種戰略纔能幫助中國，並使民主國家的鉅大的權力有效地發揮出來，和希特勒與東條儀製他們的計劃一樣的龐大規模。

我同意他的話。但是無論是我到中國的旅行，還是後來設法促成一種真正統一戰略，使中蘇和英美成立完全而斷然的同盟的努力經過，都還未能在這一問題上給我任何切實的保證。我們的許多領袖有意將戰爭分別爲第一等的戰爭和第二等的戰爭，這種傾向，依然使我驚詫不置。當然，我到遠東的旅行已使我頭腦中沒有懷疑的餘地。除非我們在亞洲與中國完全攜手合作，一如在歐洲和英美及各被侵略國所爲者那樣，共同爭得勝利，否則便不會得到真正的勝利。

我知道有許多人相信，控制未來的的方法主要靠英美的優越地位。他們盼望德國充分削弱之後，英美有一天入侵西歐，以聯合的軍隊佔領中東。在他們的心目中，這樣一來，俄國的推進和它將來的優勢，便可以因我們之佔領西歐和被征服人民之趨附於我們的旗下，而加以抵銷。他們預計把希特勒解決之後，英美聯合起來，在中國的若干助力之下，毀滅日本。在他們的心目中，戰後的中國最好是一個受着仁和的待遇，完整但是顛倒；西方列強以其看來似乎對未來世界和平與安全最好的辦法，懷着撫育的心情爲東方利益計而指導亞洲的各種力量。他們所想到的是控制全世界的戰略與通商要道，以英美的優越實力爲後盾而保證一種英美對東西兩方面的受託管理地位。這樣，西方的文化與政治的價值得以保全，和平得以恢復，經濟安全有所保障，而全世界可提升到我們的民主與幸福的開明水準。這是一個娓娓動聽的巧辯。它說來好聽——祇要你把赫斯福總統，而非邱吉爾首相，特別表明適用及於太平洋的人民的大西洋憲章中崇高的詞句，置之不顧；祇要你把我們努力灌注於全世界的四大自

由的計較，置之不顧；祇要你把二十萬萬人民的思想置之不顧。

多少年來，我我一向忽視日本的真正野心和能力以及它利用東方日趨高漲的輿論在太陽之下得到一個地位的要求，結果我們低估了日本人，而且忽視了東方發展中的勢力。我們模糊地知道日本人試圖建立一個帝國。祇有現在，我們纔開始認識這個帝國如果建立起來是多麼龐大。

日本的幻夢終於在我們的眼前一步變為現實。我們眼見日本人征服了他們所計劃的帝國的一大部。除了朝鮮和滿洲外，他們握有中國全部的海岸。他們握有了大部分菲律賓。他們差不多征服了全部東印度。他們選取了半個緬甸，切斷了緬甸公路。他們至少掌握着印度洋的水平。正在敲打着加爾各答的大門。

他們真的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使我們能夠充分把握他們如果成功的話，世界可能變成怎樣的一幅圖畫。假如：假設印度陷落。假設中國切斷一切外援，遭受窒息和征服。我不相信這些事將要發生，但是如果否認他們是可能，那簡直是重復過去的悲劇式的錯誤。

萬一這一切都實現，我們所將看到的就不僅是一個大的帝國，而且恐怕是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一個擁有十萬萬人民住在大約一千五百萬方英里土地上的帝國，一個佔地球三分之一，包括全人類半數的帝國。這正是日本的迷夢。

不但如此，這個帝國在它內部擁有一切可以想像到的資源。無論靠着平時工業還是爲戰爭，它都

會自給自足。那時日本會從菲律賓得到鐵，從菲律賓和緬甸得到錫，從許多島嶼得到石油，還有它永遠用不完的鉛、錳、鎳、製銀的礬礬土，和樹膠。那時大家所知道的富厚國土，便不會是北美合眾國，而是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了。

我對美英兩國人民的勇氣，事業，和命運，懷有無限的信心。但是我相信如果美國人此後被迫面對着這龐大規模的帝國，我們的生活比一個軍營便好不了多少。我們所珍愛的自由也不過是一種空虛的希望罷了。我們就必須生在在驚天動地的驚恐中，沒有止境的戰爭中，並在我們不得不經常努力擴充的軍備重壓之下，在這樣一種爭取生存的奮鬥中，什麼和平與繁榮，自由與正義，都不能發榮滋長，而且不管太平洋是多寬多窄，也絲毫不會有什麼不同。

我相信我們要避免那個浩劫，我相信我們不容為時過晚便要用再三再四地強力的打擊來避免它。但是僅僅打擊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對東方發生的一切事情，對那裏人們的看法，他們思想方法上的變化，他們依賴他們的標準與理想而為自由所提的希望，都有更好的瞭解。我們都說這是一個一爭取人心的戰爭，——一個政治的戰爭。但是我們太輕易，太時常地，如我在北非和東方，依照前式的縱橫捭闔的，純粹的軍事行動的道理，以及所謂權機和表面上顧全實際的道理去行動。我們太時常地忘記了這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太隨便地放棄了我們的理想，我們沒有在我們的積極的意識中充分把握住一件事實，就是：倘若沒有中國人民在過去五個多悠長艱苦的年度中堅持抗戰，要擊敗日本，無論在軍

事上抑在政治上，或許已經失之過遲了。在過去五年中，很少的人體會到中國抗戰對我們整個文明的重要作用。美國人把這五年回顧一下，是不感到愉快的。當我在中國與那些領導進行抗戰的人們談論時，想起來也是不特別愉快的。當我們耗盡精力在激烈的爭辯和孤立主義的濫調時，我們從未用些功夫去瞭解中國人民所扮演的英雄角色，更不用說送給他們切實的援助了。現在我們正處於一個大的戰爭中來減輕我們的過失，我們必須如此了。

中國人對於未來的展望，差不多是和日本人的完全相反。他們不追求帝國的迷夢。他們僅僅努力保持和發展他們自己的廣袤而可愛的祖國。他們要使東方蓬蓬勃勃的新興力量用在爭取他們自己的自由和別國人民的自由上。而在同時，日本却要用這些力量以實現他們的帝國主義的計劃。

中國在地域上和人口上都比美國大的多。它在自己的國界以內蘊有許多富藏。在另一方面，它却不是自給自足的——我們也不能如此。不過這一事實並未困惑中國人民或使他們要求征服世界，這一點也是和我們一樣的。自給自足是全證主義國家的濫調。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的世界中，一個國家再也用不着自給自足，正如紐約市用不着把它自己從實夕凡尼亞洲獨立開來一樣。

我們一定不要指望中國人對於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完全和我們的一模一樣——他們有些觀念在我們看來似乎是過於急進，有些又過於陳腐。我們必須記住，在他們的眼中，我們的一些風俗習慣也似乎過於可笑，甚至格格不入。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心思貫注在一個基本的事實上，就是中國人要得

到自由——在他們自己的方式中自由地管理他們的生涯，以增進他們自己的福利和快樂。他們要有一個自由的亞洲。

最近中美中英兩約成立，我們廢除了領事裁判權及其有關的特權，這是走向承認中國要求自由的決心的一個步驟。美國人和英國人在中國已不能免除中國法律與法庭的管轄，猶之乎中國人在美國不能免除美國法律程序的管轄一樣。但是不要以為這兩個新約已解決了問題。例如說，英國依然保留香港，那是中國人民必須賴以與世界通商的大商埠之一。而香港，正如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在上海公共租界中比權利一樣，在中國人的眼中不過一障礙着他們爭取真正自由的道路的一種象徵罷了。

不幸，依然有許多美國人把中國人看成一大羣蚩蚩之衆；而不看成一國的國民，把五百萬中國人的死亡看成不同於，並且它的價值較低如五百萬西方人的死亡。說不定今天世界上最有意識的事就是東方的覺醒。即使我們在軍事上打勝了這次戰爭，東方的覺醒依然要發生加以考慮。如果我們是聰明的，我們能夠導引整個東方存在着的力量，成爲謀求和平與經濟安寧的世界合作的努力。但是這些力量，如果成了侮慢或忽視，却會繼續擾亂世界。

第七章 中國西部的開發

我將永遠高興，因為我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我不是從一個所謂「條約口岸」進了中國，却是從中國的後門，中國西北廣大的背後地進了中國的。太平洋岸的「條約口岸」——現在都被日本佔領——近百年來在現代中國人的心目中象徵着中國被西方各國看作可以佔據、剝削、和譏笑的一個大而原始的國家。上海、香港、和廣州算是美國的城市；但是對於中國人，然而它們的名字都使中國人回憶起中華民國的奠基者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日子。

我在中國第一次停下是在迪化，俄國人叫它烏魯木齊，是新疆省（或中國的東土耳其斯坦）的省城。我們的解放式飛機只用了一天的工夫便從塔什干飛到新疆。這大部分時間是沿世界最高的山脈天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伊犁河飛行。我們在廣闊的沙漠上空飛了幾個小時，那是我們見過的最奇異的美麗的景色，後來我們到了中國人叫做新疆的出產葡萄和哈密瓜的肥沃的地方。

新疆有兩個法國人，人口還不到五百萬。那是中國最大的省份，也可以算最富的省份。它不但臨近亞洲地理的中心，並且臨近亞洲政治的中心，因為中蘇兩國的接觸就在這兒。在長時間的緊張中，這個奇異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許多美國人從未聽過，但是對於我們的歷史會有決定的影響的。

前三四十年到過那兒的外國人是很少的。我在迪化的時候，招待我的中國主人估計在一年前剛剛開辦的這條中蘇商業航空線上，飛經新疆的英美旅客只有幾十個人。甚將這幾十個英美人在航空設備較好但是較小的城市哈密，比在省城迪化停下的還多。

哈密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它小，醜陋的樣子，而且想像不到的泥濘。街上的路牌是俄文的，政府的官吏是漢人，居民是纏回，他們是中國境內二千萬回民的一部分。哈密可以自誇的是我從未喫過的亞洲最好的香瓜和無籽的小葡萄。哈密周圍的山裏滿藏金礦。新疆的食糧是靠灌溉，目前新疆唯一重要的輸出是羊毛，這項羊毛大多作了蘇聯紅軍的衣服。

新疆是世界上政治與地理合成一種爆炸混合物的地區之一，這種爆炸混合物對於喜歡知道世界局勢發展的人們是很有意義的。地理使新疆傾向蘇聯，蘇聯的土西鐵路離新疆邊界祇幾英里。我們在迪化看見的一切消費品是從俄國來的；我們坐的汽車是俄國的；我們看見的軍隊駕駛着俄國的坦克，但是政治使新疆回向中國。自漢朝以來漢人就統治着新疆。現在的新疆督辦是個漢人。現在中國拚命的有希望的開發自己內地的運動，好似一股清風吹遍了新疆。戰後中蘇關係對於整個世界是重要的，而且中蘇關係也許在這個地區決定。

蘇聯政府一向承認中國在新疆的主權，中蘇兩國從無邊境突圍之類的事情。

一個主要的領袖是現任新疆督辦盛世才。他是個漢人。因為他的故鄉東北在一九三一年被日本佔

領，所以他是極反日的。他的兄弟於一九四二年六月發現在床上被人刺死，一時謠言叢生，傳訟紛紛，在亞洲被人當做新聞傳來傳去。

我聽到的故事中有多少真實性，我不知道，也許完全沒有真實性。在油化我和盛督辦喫飯，蘇聯總領事也和我們同席。我們用俄國的伏得加酒和中國的米酒互祝彼此的健康和三國的萬歲，這中間除了中蘇的誠摯友誼以外，沒有別的暗示。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應盛督辦之邀，和他同進早餐，不管他以前的傾向如何，近來他已矢忠擁護蔣委員長。他告訴了我許多暗殺，陰謀，間諜與反間諜的故事，聽起來令人毛骨聳然！如果從周圍環境中看出許多猜疑與神秘空氣的實證，一個美國人是不會相信的。很顯然的。戰爭完了以後，我們的問題之一就是幫助中蘇兩國處理它們在亞洲的世界屋頂附近的土耳其斯坦面對着的共同問題。而且這又是一個理由，說明我為什麼再三主張，有促成中、蘇、美、英四國當它們今天正在作戰之際共聚一堂學習如同互相合作的必要。

盛督辦的宴會，不僅是世界上最殷勤的人們爲我而設的一長套中國酒席的開始，而且是最有趣的一個。我們坐在一個長條的拱形屋頂的大廳中，人們在大廳兩邊狹長的桌旁面對面坐着。牆上用十七種不同的文字貼着歡迎一個美國人，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以及對我們勝利的信念等標語。

盛督辦身材高大，有一付美好而濃黑的短鬚。他是一個東北的漢人，曾留學日本。他做新疆督辦有：

十多年，對於當地情形，各種陰謀和傾軋的勢力，十分的明瞭。下午我在他的辦公室和他談話，報告訴了我一些主持新疆的問題。

在迪化，正如在每一個後來到過的其他中國城市一樣，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所實證，證明美國人在世界到處所享有的好感。那個九月的夜晚，離那發軔最遠的所在，莫過於美國了。甚至我們間席的大，大部分是文武官員，都用一種好奇的眼光注視着我，顯然表示出來其中有許多還是生平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然而在他們招待我時，有一種熱情和友誼充溢其間，使他們所心懷的美國長此以往爲中國之友的希望，不啻而喻。

迪化的一切事物都較喀什干，或德黑蘭，或巴格達更生動地提醒我們注意到亞洲的真正活力。第二天，盛督辦爲他的美國來賓們舉行了一次軍事檢閱。我們在一個極寬大的操場上參觀了新疆的軍隊，或者說至少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全副武裝列隊過去。

那是一個生動的景色。士兵看起來都強健壯，訓練得很好。他們的裝備數量有限，但大部分似乎足俄國製的而且很好，他們有機械化的砲兵，擔任與騎車上架起的機關鎗，裝甲的偵察汽車，還有些輕而迅速的坦心車。有好幾家用卡車運載的步兵。有一團砲兵是用蘇聯馬拖的運兵車（卡昌卡一機着在我們面前奔馳過去，這種烏克蘭農民用的大車在蘇聯內戰時第一次給海峽利用起來），上面架設機關鎗，現在紅軍在烏克蘭對付蘇粹作戰又再度使用這種戰具，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這回表演的最高峯却富有濃厚的地方性。有好幾十名鬍勇輕捷的蒙古和哥薩克騎兵，坐在鞍子上就和馬身上的一部分一樣，依次表演着約有十五個節目，每一個節目都令人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他們一面才馬上奔馳，一面用兩刃的短刀刺入小樹樺中，或將一個假人頭切去一小塊，或從地面七拾起一些東西。看了他們，你就不難瞭解成吉思汗為什麼在他的敵人中間造成那樣的恐怖。

蔣委員長派了正式代表在迪化歡迎我，這就是他的最親信的朋友和部屬中的兩位，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博士和西北戰區的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他們在中國一直陪伴着我，在我離開中國以前，我對他們兩位十分敬愛。

董顯光是米蘇里的派克大學和紐約的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畢業生。他曾充任由國報紙的發行人而有顯著的成就，以後就成了蔣委員長最親信的顧問之一。協助主持一個重要的中央機關，同時擔任蔣委員長翻譯、秘書、和諮詢的人員。我後來清楚地知道他，在我看來，他是任何一個偉大的領袖都喜歡在他身邊有的一種輔翼人員。

董顯光博士的華語真是流利的驚人；朱紹良將軍就與他完全不同了，他說的話沒有一個字我聽得。但他那和藹可親的人品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每次坐在中國的宴席上，或作完一次演說，或從一個會談的地方走出，都看見他滿面笑容地迎着我。他不大談話，而且具有一個出人頭地的軍人所能有的威儀。原來他會與蔣委員長一同經歷過早年統一中國的那些最艱苦的戰役。不過他始終能使我感到

說中國不是一個化外的國家，雖然充滿着奇異的服裝，却也充滿了美國的朋友的一塊古道熱陽的國土。

另外一位中國人曾陪伴我們從莫斯科一路到中國。他的熱烈的友情也是難以忘却的。他是中國駐蘇大使館的一位武官附，徐煥昇上校。我們在中國有幾次飛行，是他親自駕駛飛機的。在一九三八年，美國參戰前三年，這位看來仍不過十七歲的青年，因駕駛參加對日本本土第一次空襲，投散傳單，而一舉成名。我很高興，因為和我們旅行這一次的結果，他竟能在西安前線附近見到他的妻子。當我們返國途中，他在西伯利亞同我們分手，回到任所去了。

第二天，九月二十九日的早晨，我們翻身向蘭州飛行的時候，這些人都在我們飛機裏。這五個小時的飛行，從某個觀點來看，是我們環飛世界中最可注意的一段。當你環飛一個烽火連天的世界時，每次停下之後，要試圖準確如何瞭解次一站，或者偷空小睡一會，於是風景當然佔了次要地位。但是油化到蘭州的景色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個奇觀，在飛機上俯瞰下去，那真是一片引人入勝的大塊文章。

單說美地，那是難於捉摸的。我們飛過的路程一部分是沙漠，一部分是開闢了的綠色田野。到處是山，但是我們把雪掩的天山山脈拋在後面之後，山就比較低，而且異常肥沃了。有的地方，中國人開闢的梯田一直到山頂，山下的地好像一個龐大的彈子臺，凹陷成十分複雜的不規則的綠色地毯。

我們離蘭州不遠，便看見了肥沃的黃土層連亘起伏，幾千萬年來大風與河水從那兒挾帶着沃土，遮過了大部分中國的北部，從空中看，這些黃土層的起伏，景色之美，難以置信，但是我看到這些山便由不得想到它們代表着一個正在決心開發西北的中國富源。水利工程，發電廠，肥沃的農田和牧場。整個的城市都在這個區域裏建立起來。我覺得這兒所缺的只是人。

我在中國的期間，我不知道有多小次糾纏着這一般的飛行。第一，這個西北區域的空曠和中國南部富庶區域是個鮮明的對照。第二，和我談話的各個中國要人都談論西北與現在正以運輸、合作社、現代科學開發西北富源的奮鬥，是中國對日作戰和建立戰後強大現代國家的偉大任務中最主要的希望。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我覺得迪化與蘭州和迪化與蘭州之間的地方酷似剛開闢時的美國西部。人民似乎高大而且富於機智，是比我在成都或重慶擁擠的街道上所見的許多人更強壯的一個類型。日本掌握着沿海的半個中國，一切大的工業城市和港口，和許多肥美的農田，所以現在中國除去開發自己的西部而外，別無他途，最我高興的是，在西北從事開發工作的中國人裏，我沒有看見失望或勉強的態度，他們反而高談闊論，而且有點誇誇，很像美國我父親那一代的人們。

在蘭州我參觀了幾個中國的工業合作社。在那兒我遇見了沉靜誠懇的紐西蘭人艾利（E. W. A. Ellis）他使「工合」成了一個國際的字眼兒和決心靠自己力量站立起來的一個人民能力的象徵。我看見艾利時候，他正遇着許多困難；我想他要繼續有困難的。但是我不懷疑，我在西北各省看到的中國工合運

動正在開發亞洲的心臟，創造着世界經濟地理中一個驚人的變革。

亦在美國；關於中國這種經濟的奮鬥比關於中國對日本侵略者的軍事的奮鬥寫得少。但是我見到的一切，使我相信那都是英勇的。倘若我們美國的海岸被敵軍攻陷，我們美國人自然能夠退入龐大的內地；在那兒找到武器和熟練的勞工繼續戰鬥。但是在龐大的中國內地沒有這種便利，中國人不得不把他們的工廠搬到內地；不是用火車載，不是用卡車裝，甚而不是用騾車拖，却用人力一件一件背到內地的。他們背着機器零件，溯上大河的流域，越過了山嶺。

在機器轉動的聲音從本鄉的遼遠的高地裏，他們把零件放下，再裝配到一起。從這極遠來的比較不多的工廠裏產生了一千多工廠——大多數是小的，製造的規模也有限，但是每個都貢獻了它對新中國建設隱盡的努力。

我們美國人一定能夠懂得牆壁上高的字。這個新中國的開發在現代史上正好和我們美國西部的開發先後輝映。我們知道那一種人民的奮鬥，我們知道他們的希望，我們也都知道他們曾有什麼成就。現代中國宏大的經濟目的是很像我們開發美國似地開發他們的中國。他們要創立一個經濟基礎來提高他們人民的生活水準。許多專家相信中國的工業化一旦開始，進展的速度比我們的還要快。新中國是用進步的技術來開始的。我們的開發曾經不等待火車頭的緩慢的發展，但是他們能用一小時三百英里的飛機來開始。

他們還沒有飛機；也沒有火車頭。在蘭州我看見了進入中國唯一的陸路，俄國公路的終點。有些美國人依然懷疑從中國人民英勇抗戰了五年多的中國帶來的少數幾篇故事，是否過度渲染。我希望這些美國人都能看看這個公路的終點蘭州。

我們一越過阿拉木圖以東的蘇聯邊界便在這條公路上空飛行。阿拉木圖是個大的城市，有鐵路和航空線與俄國本土，蘇聯的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的工業及原料聯接着。從阿拉木圖，沉重的卡車沿着一條路面堅硬的路滾滾東行，通過迪化，哈密，直達甘肅的西部邊界。我們在這些卡車上空飛行，我們覺得這些卡車在這條古代的絲路上——也許是歷史上最古的駝道了，馬哥孛羅到古代的中國去就是走這條路的——空實不相稱。

沒有路莊，沒有汽油，沒有卡車的這條公路的中國境內的終點，很能代表這條大道的歷史傳統。中國人用騾車，駱駝，和苦力代替卡車，用四天工夫從國界達到甘肅邊界的蘇聯貨物要用七十多天運抵蘭州。但是還沒有到一個鐵路的臨時終點，還須用最原始的運輸再走多少天纔進了人烟稠密急需這種貨物的地方。

在蘭州城外的飛機場與縣城之間，我們看見了一長列往俄國運貨的運輸隊。那是用二輪小騾車組成，輪子是橡皮的——這在我橡皮意識的心目中是奇異的——車上高高堆載着羊毛、鹽、和茶、騾子耐心地站着，軍隊卻延數英里，車夫站在騾子旁邊，等待出發的命令。我聽說他們一步一步地往西

走兩個多月，纔能換到蘇聯的汽油、飛機零件、引擎，和軍火，這些貨物大多是以信用貸款輸往中國的，現在這筆貸款已達到驚人的數目。

這條路是用以支持龐大重量的一根鞋帶，倘若這根鞋帶斷了，我們就都成了失敗者。關於公路的運輸總量我沒有得到官方數字，這比被日本切斷的滇緬路的運輸能量低得多了。但是除了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到達中國的美國飛機和滲透整個對日戰線的搶運而外，它是中國和外界唯一的聯繫了。

蘭州在黃河岸邊，比潼關離黃河水源近得多——一兩星期之後我們會隔着黃河遙望日軍陣地。蘭州是個大約五十萬人口的城市，沒有一條鐵路。沒有六年以上的重要的工廠。但是有個偉大的前途，甘肅省是富的地方，有龐大的發展可能。

到蘭州後，朱紹良將軍領我到私宅去見他的夫人。我們出城登上一座俯瞰蘭州市和黃河的小山，山頂附近有一座中國的廟宇，作了陝甘寧青新西北五省的軍事指揮部，在這兒我們同朱將軍和朱夫人坐下喝茶，吃大餅。從朱將軍的辦公室外的洋台眺望，可以看到廟宇的瓦頂，蘭州的市景，和已使甘肅土地肥沃了兩千年的黃河水利工程。

那天夜裏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在勵志社設宴招待我們，我們也就在那兒下榻了。除去主人而外，還有別的要人作陪：後方勤務部長俞飛鵬，和農林部長沈鴻烈，他們談到甘肅的林業，農業，水利問題。和毛織工業，其中有個毛毯工廠，第二天早晨我去看過。我雖戰時首都重慶還有幾天路程，但是我已

始感覺到這個令人驚異的國家發退日本的力量源泉了。

第八章 自由中國用什麼抗戰？

第八章 自由中國應作什麼抗戰？

我們從蘭州南飛到成都，然後越過羣山而抵中國的阿都重慶。由中國回國時，我們一度北飛到西安，後來折回成都，再啟程越過北部中國，作長途飛行，經大戈壁沙漠而至西伯利亞。這其間我們會作較短的飛行到四川，雲南境內的美軍司令部或軍營。除了轟炸外還沒有被日軍染指的自由中國所有各省，我們到過了一大部分。

這樣的省份還有十個，五個在西北，五個在西南。在西北部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將來。在西南部，尤其是在四川省——成都和重慶——我們看見了它的現在的精華。

現在不是土地，而是人民，給了我最強烈的印象。無論是誰，要完全瞭解那個國家的無黨的人的來源，都是困難的。已知道中國自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企圖征服中國後沒有到過那裏的人們告訴我說：中國人民的活力，創造性，勇氣，和對他們自由事業的忠誠，總使他們驚異不置。

參觀了中國的紗廠，它的兵工廠，陶器工場和水泥廠，與它們的經理和成百的工人談了幾小時話以後，我的始真正體會到中國人的才智在現代之工業中的獨創性與適應性。此外，我會與大學教授和中小學教師，討論那種擺脫過去羈絆不可抵抗的推進力，這個力量已使中國在短短幾年之中把識字能力

從少數人的特權變爲羣衆的權利。經過這番討論後，一般人潛統地叫做中國之覺醒的那個東西，在我實在感到了一些真實的意義。中國人現在識字的差不多已有一萬萬。在各大學校中，學問已不是單純靠淵博來衡量一切了。中國今天的學者把中國豐富的文章學術用在現代生活的許多問題上來。他們不再憤世嫉俗，置身世外，而競相發現服務社會國家的更好方法。

我在成都會見了當地八個大學的校長，和他們談論了一些問題。有六個大學的教職員是從日本佔領區逃出來的，它們輪流使用着兩個原大學的設備，使其樓房、圖書館和試驗室幾乎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沒有空閒。

有一天清早，我到這些大學的一萬學生演講，每當我提到自由時，他們就致以洪亮的歡呼，那個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我永遠不會忘却的，在中國各地我會和許多小小的學堂負責人談話，在這些學堂裏，中國的農工子弟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讀書的機會。

在現今所謂日出中國的地區裏，十年前祇有一百家報紙，今天却有一千家了。每一個相當大的城市都有一兩家報紙，而且它的社論翻譯給我聽時，是鋒銳有力的。中國的中央通訊社以其職業化的集散新聞方法，可與我們自己的新聞社和英國的路透社媲美。

我是下午傍晚時分在一個離城幾英里遠的飛機場到達重慶的。我們的汽車還沒有進城，人們早已擁列在街道的兩邊了。在我們到達城中心以前，羣衆已擠滿了店舖前面的人行道。男女成人和兒童，長

鬚的紳士，有的帶着呢帽，有的帶瓜皮帽，挑夫、走卒、學生、拖着孩子的母親，衣着有的講究，有的襤褸——他們在我們車子緩緩駛向下榻的賓館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擠得人山人海，他們在揚子江的對岸鵝喉嶺。在重慶所有的山坡上——重慶一定是世界上最多的城市——他們站在那裏，笑，歡呼着，揮動着小小的紙製的美國和中國的國旗。

任何一個參加過美國總統競選運動的人，對於羣衆是習以為常的。但對這樣的羣衆却大不相同，我可以暗中依我所願地貶低他們的善意，但沒有用處。人民揮動着的紙國旗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來那位殷勤而富於想像的重慶市長吳國楨博士在這個盛大歡迎的設計中會參與其事。很明顯的，並不是所有這些人民，其中有許多敝衣跣足的人，對於我是誰或者我爲什麼到那裏，都具有明白的觀念，我還向我自己說，那每個街頭巷口喧鬧不絕的爆竹，畢竟不過是陳舊的中國人的熱情表現。

但是，儘管我這般努力減低它的意氣，這個景象和深深感動了我。在我所注視的面孔上，沒有一點人爲的或虛構的成分。他們看我是美國的一個代表以及友誼和即將到來的援助的一個具體希望的代表。那是一個羣衆善意的表現。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單純力量量的動人表現，這個力量也就是中國民族最偉大的富源。

像這樣的羣衆，當我初到蘭州時也會見過一次，不過規模較小。後來我又在西安看到另外一次，也是向如此的人，他們因爲我們的飛機到達遲了，竟在雨中等候了好幾小時。他們實在是深刻地感動着

我，在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作一次短短的旅行，要想如願建立密切和私人的友誼，藉以知悉一切外國的人民的精神和觀念，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些中國人民大眾却給了我一種切實和歷久不渝的感情，致使我對中國的表面印象得到一種根據——在那成千成萬的面孔中誰也不會看錯的根據。

我後來熟識了的那些中國人都是某一方面的領袖，他們之中有的一些我要在後邊加以描寫，而且要大書特書，但是任何崇高的讚揚都不足以頌譽中國無名的羣衆。

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我從來沒有見過，當我在中國時給我寫了一封信。他是一個學生，在信尾上貼了一張他自己的照片。他所用的是那樣的一種英文，唯有一個對他自己和他的字典有深深的信心的纔能運用的英文。

「親愛的威爾基先生，」他寫道，「讓我向你保證，中國——所有盟國中最勇敢最忠誠的一個——在遭逢一切困難之中從未氣餒或變心過；因為我們完全瞭解我們是爲自由與正義的神聖大業而戰鬥。並且我們堅決相信，一個光明的前途在等待着我們，上帝會給我們那孜孜以求的勝利的。」

他在信中附了一個建設戰後和平的草案，那的確是一個有趣的方案。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精神，正如我到處見到的中國羣衆的精神一樣；他提議建立紀念碑，使人們厭惡戰爭。而不稱讚戰爭；他提議這次戰爭的最後一天，應該規定爲全世界公眾犧牲日，名之曰，「和平、自由、快樂節」。

他的方案中有一項題爲「增進人類間的親愛。」他並且提議，每一國家應撥出和平基金，用來獎勵

科學的造詣。他向我寫道，祇有科學「纔能解救人類的痛苦，彌補自然的缺陷，提高人類的生活水準，使全人類與自然界而非爲人類自己相鬥爭。」

在我們這邊作戰的恐怕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像中國那樣被一個人的性格所支離着。他的名字就是蔣中正，在中國的人們普遍稱他爲「委員長」。

我和蔣委員長有好幾次長談，還和他及蔣夫人單獨喫過幾次家庭便飯。

有一天傍晚，我們開車到蔣委員長夫婦的郊外住宅，墜落在揚子江邊陡峭山坡上。董顯光先生和我一道。在他們那樸實的房子前面有一個大的做驢。我們坐在那裏憑眺重慶的山崗。下邊的江上有許多小船泛行在激流中，載着中國農民和他們的出產順流而下，到市場去售賣。那是重慶炎熱的一天，但在這裏却有微風拂面，爽人肌膚，蔣夫人向我們進茶，蔣委員長和我便開始談話，詢和董顯光先生輪流替我們傳譯。

他論到過去和他的政府想把中國從一個幾乎純粹農業的社會變爲現代工業社會的目標。他希望在這個改變之中，一面保留住原有傳統的精華，一面藉着廣泛分佈的大量小工場的設計，避免西方大規模工業發展的社會脫節現象，他相信他曾在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關於工農合一之社會的遺教中，發現這個途徑。不過他很願意同一個從西方來的人討論這個問題，於是他向我提出許多問題。我向他解釋說。他要避免的那些由於美國大量生產和大規模工業合併而發生的社會問題，並不如他似乎在想

的那樣，單純因爲爭權奪利而來，固然這些因素有其作用是沒有疑義的。那些社會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爲經濟的需要而發生的。這就是說，大量生產大大減低了成本。

我向他舉出了汽車這個例子，因爲他希望中國用低廉的成本製造汽車，在中國公路上行駛。我告訴他聽，一個小工場製造一輛汽車，比起一個大工場在科學管理下按照分工合作的方式製造一輛汽車，成本要大四倍。我向他說，造成高廢生沽水準的若干物品，如果必須完全由小工廠製造，它們的價格必然很高，決不是人民大眾所能負擔的。我向他說，每一個有思想的美國人都知道，在許多場合之下，我們所有的大規模工業合併並不必要的。我又向他說，爲了我們的社會與經濟的福利計，對於小工業應該予以最大的鼓勵和優先權。但是，我說，爲了維持我們的生活水準起見，若干工業實行大規模生產是必不可少的。我向他講，我們承認把成千成萬的工人放在一個工場裏，隨時有發生整個社會陷於失業的可能，這種情勢造成了社會的，經濟的，甚至違反民主的失調現象。我們覺得遺憾的是，由於這種態度的結果，我們的人口分化出一種永久被僱傭的階層，個個人作爲自己事業的主人的機會，因而減少。我並且告訴蔣委員長說，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切的答案。但是我們的確知道，解決辦法決不是把必要的大單位分裂成許多效率不良的小單位。

我提醒他說，有一種試驗在進行着，那是在西方世界中比較和他最接近的，就是俄國的共產主義的試驗，但是它的成功一部分是由於爲着完成一種特定的目的而運用大集團的大規模生產技術。

他表示說，他可以找出一種解決途徑，就是必要的大單位一部分歸政府所有，一部分歸私人資本所有。

我們討論了好幾小時，然後由我們充任翻譯的蔣夫人，便以一種愉快的但是堅決女性權威的口吻說道：「已經十點鐘了，你們大家還沒有喫一點東西呢。好了，來吧，我們必須進城，至少喫些點心去。你們改日再結束這番討論吧。」

後坐在別的時候，我們當真又談了好多這個問題，還有許多其他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整個東方，它的要求，它的目的，怎樣可以使它配合在一個全世界範圍的秩序裏面。談到戰略，談到日本和它的資源，談到珍珠港事件和新加坡的陷落，以及這些事在東方反對西方態度所發生的心理上的深刻影響。我們談到我在中東各國，在俄國，和當時在中國眼見其蓬勃發展的那種緊張甚至狂烈的民族主義日趨增長的精神，以及這種精神會如何影響世界合作的可能。我們談到俄國以及中國國內的共產黨，談到英國及其東方政策，談到維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

事實上我和蔣委員長在一起的那六天中，充滿了談話。

我祇要寫到中國的事，便不能不提出我自己的結論，就是：蔣委員長無論作爲一個常人還是作爲一個領袖，都比他在民間傳統中的聲望，要來得偉大。他態度安詳，談吐溫婉，他不着軍裝時，便穿中國式衣服，這便就越發給人一種學者的——甚至是一個總院學者的——印象，而不是一個政治領袖的

印象，他雖然是很會聽人談話的，常能把擔任別人的頭腦，當他同意你的話時，他點點頭，不絕地輕輕地說着「是的，是的」；這是一種微妙的首肯的表示；同時也能解除與他對談的武裝，在某種程度上使人家和他一致。

據說，蔣委員長每天有一部分時間祈禱和讀聖經。他從這個習慣中，也許是從他的兒時的影響中，養成了一種反省的姿態，安詳的豐度，和一種偶然的想得神的表情。毫無疑問，他是真誠的；他的尊嚴和鎮定，幾乎含有一種凜然的素質。

蔣委員長之有今日的地位是經過極苦奮鬥的，這是他引為自豪的一件事。在二十多年中，他知道了一個國家誕生的最繁重問題。也許是因此之故吧。他對於和他聯姻的那個非常的家族和他早年共患難的同志們所具的忠心，是歷久不渝的。我不能用文件來證明這一點，但是凡在重慶的人沒有不能體會出一件事來的，就是：這個年青的共和國，儘管還在青春時期，却已展開了它所特有的一種「老派的紐帶」，自然而然地使某些人居於要津，主要佩帶些這種「老派的紐帶」的人，是他與軍閥作戰時代的袍澤；現在他們都還沒有變為老人，這也是中國之福。

我沒有意思表示我在重慶遇到的領袖們沒有相當的幹才。他們是有的。但是他們並不全是四方意義之下的代表人物，猶之乎中國對民主的概念在若干方面與我們的不同一樣。它的領袖們生活的型式。他是與我們不同的。統治中國的國民黨在其推進中國的自治計劃中，包括一個訓政的時期；在

這個時期之中它正把新的生活和思想習慣教育給民衆，使他們以後成爲一個完全民主的好國民，也有選舉權。

在這個訓政時期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是：中國的領袖們應該具有相當訓練的，或者在外國大學中，或者在戰爭和政治中訓練出來的，而不是由人民以代表他們爲主而選舉出來的。實際上正是如此。我到了中國纔相信，這纔是一種因素，一種重要的因素，說明爲什麼應特別在同情中國的外國人方面對於重慶所實行的中國生活的集權統制，有不耐煩的情緒。

中國新派了它的幾個最傑出的人物回答我的問題並使我知道它的作戰努力。把所有那些給了我強烈印象的人們的名字一一列出是不可能的。

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在他的私邸設宴款待我，那座房子在重慶的一座小山頂上，俯瞰着江水。我當時和他談過話，並和史迪威將軍，陳紹寬海軍上將，以及中國陸軍中的許多軍官說話。後來我會和廣西三傑之一的白崇禧將軍有長時間的討論。

林森主席在他的官邸正式招待我。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博士在那重慶最精美的住宅草坪上舉行了一個露天的宴會，教育部長陳立夫博士，經濟部長翁文灝博士，以及當時的宣傳部長王世杰博士，都提出了很多的時間，把中國怎樣應付危機，解釋給我聽。

蔣委員長本人在軍事委員會親自主持一次宴會，那個會址在一年前被炸，但已重新修好，這裏

我在全世界參加的正式宴會中最動人的了。因為它是那樣簡單樸實，在這種必須犧牲的歲月中居高位者有如此的風氣，誰也是喜歡的。餘興中有些樂師彈奏中國古代的樂器，其中有許多是單鼓的，而且樣子和結構都似乎粗淺，但是歌曲却是中國古代的民歌，節奏很柔和。

席間有一段插曲，是我們一行人始終想起來就覺得好玩的。原來柯爾斯君頭一天有點小恙，那天席上他爲了試試自己的胃口，便喫了些有奶油的魚脣，於是飯後食品上來有很好的老式甘草冰激凌，他就特別高興。他向重慶市長說出了愉快後，市長解釋道：「四月間衛生當局深怕中國發生霍亂傳染症，他們既沒有治霍亂的鹽水，而霍亂又是藉牛奶而傳播的，他們便由市政府布告，凡是供給冰激凌的都予以刑事處分。」

「不過，」他接着說，「冰激凌是這樣好喫的點心，而且威爾基先生到重慶來使我們太高興了，所以我昨天決定下令把這禁例開放一天，使我們今天晚上可以用冰激凌來招待諸位。」

此後幾天中我們都急切地要看我們的防禦亂針究竟有無效果。

我們殷勤的主人們留給我若干餘暇，說是爲了休息，却使我得以見到許多許多其他的中國人，宋子文博士的寓邸是一個方便的會客地點。我又有很大的好奇心。中國人想來會見我的心情，簡直沒有止境。

舉例說吧，我就是在那裏和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周恩來作了一次從容不迫，單獨而不受阻斷的談

話，他住在重慶，在那裏協助主持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並參加目前中國最近假代議制立法機關的國民參政會。他的夫人是參政員。

我第二次見到周恩來將軍是在孔祥熙博士的宴會上，主人應我之請坐邀了他和他的夫人。會中作為他的僚屬的那些人有一種愉快但是相當矜持的姿態向他寒暄，同時他的舊交史迪威將軍也以熱烈的尊重態度和他談話，這種情形看來很有興味。

周恩來將軍穿的是一套藍布衣服，一面表現着中國的傳統服制，一面又有技術工人服裝的線條，他的高龐大體，眼睛大而嚴肅。他緩慢地說着英語。他向我說明中國戰時統一戰綫所賴以建立之妥協的性質，他承認他對於中國國內改造進行之遲緩感到焦灼，但向我保證說，這種統一戰綫一重到打敗日本為止都必然會持續下去的。當我問到他，他是否以為戰爭完了以後這種團結還能維持不壞時，他坦白地表示不願意作什麼預測。不過，他對於蔣委員長大公無私獻身國家的忠誠，具有無可置疑的尊敬和信仰。

另外一位給了我深刻印象的人是張伯苓博士，他氣宇軒昂，有學者嚴肅沉思的豐度，但又具有一種溫爽的幽默感。他是中國主要學校之一的南開學校校長，也是一位國民參政員。無論我們論到印度，戰爭，還是英國的大學，他的知識背景和判斷，在美國都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重慶另外還有兩個人，他們顯示給現新的中國，與我在任何描寫中國傳統生活的書本上所讀到的，

迥乎不同。一位是蔣委員長最的私人秘書李惟果先生。他年青英俊，聰明過人，而他的幹練又足以說明一個偉大領袖如何需要醇厚的幹材。另外一位是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將軍。這位將軍身材高大，體格魁梧，笑起來非常豪邁。我們不難形容他是一位特殊幹練的東道和經理。他的任務之一，是爲在中國居住的美國空軍籌理招待所，這件事他辦得非常裕綽。但在他那海濤的神情和他的社交本領以外，我還看過這人是一個富有想像的，堅忍不懈的，爭取中國勝利和更好的世界的戰士。

在中國不乏優秀的人物擔當重要的任務。但還不管那標準如何之高，宋氏一門在中國生活中自成一格。三位比伊和三位比她都美過美以美會教士和美國大學的訓練，成爲中國精明幹練，富有政治幹材和財產的一組高貴人物，而於效忠這一青年的共和國努力不懈。他們形成了世界上最顯赫的家族之一。

我在華盛頓時已認識了宋子文，他是中國的州交部長，是聯合國大政治家之一。他的三位姊妹我是赫重慶見到的，一位是蔣委員長的夫人，一位是掌管中國財政的孔祥熙博士的夫人；另一位是中華民國奠基者故孫中山博士的夫人。在孔博士招待我的草坪上的宴會中，我坐在首席，一邊是孫夫人，一邊是蔣夫人。我們說話復坐談，交際時非常欣幸。兩位夫人說着流利的英語，消息靈通，機智豐富。酒店過後，蔣夫人及她的兩臂說：「我帶你去見見我的另一位姐姐。她神經作痛，所以不能到戶外來參加宴會。」進了房門，我們看見孔夫人有一隻手臂繫在一個吊帶上，她很想知道她一度旅居過的

美國的事情。我們三個人說得很高興，簡直忘了時間和戶於的人們。

大約十一點鐘光景了，孔博士走了進來，輕輕地責備蔣夫人和我沒有回到席間去，那時客人都已散去，他便坐了下來，我們四個人一道兒談論宇宙世界各種問題。

我們談到瀾漫東方的觀念上的革命——這是一個我走到任何地方都會提出的話題——談到印度和尼赫魯、中國和蔣委員長，以及亞洲成萬萬人民要求受教育，要求更好的生活，尤其是要求擺脫西方，享有獨立自主政府的權利，這種向自由邁進的奮發萬鈞，波瀾壯闊的浪潮。

這個談話使我不覺神往。他們三位都知道他們自己的事實。他們三位，尤其是蔣夫人，都有強烈的意見，使談話內容豐富出色。最後，當我們要起身辭出時，蔣夫人向孔祥熙博士和孔夫人說：「昨夜席間威爾基先生示意說，我應當到美國去，作一次善意的訪問。」孔氏夫婦注視着，好像在詢問他地。我說：「不錯的，我想我担出這個意思是對的。」

這時孔博士鄭重地說：「威爾基先生，你真有這個意思麼？如果有，爲什麼？」

我向他說：「孔博士，從我們的談話中你可以知道，我如何強烈地相信，使我們美國人瞭解亞洲的問題和亞洲人民的意見是很重要的，你也可以知道，我是如何相信世界未來的和平大約要靠戰後東方問題的公正解決以爲好。」

「現在必須在這裏有一位有頭腦，有說服能力，有精神力量的人，幫助教育我們關於中國，印度及

其人民的事物。夫人說可以是一位完全的使節。她的偉大的才能——我知道她會原諒我以這樣親切的口氣說話——她對中國的偉大忠誠，在美國是熟知的。她不但要受到愛戴，而且有非常的效果。以她的機智和才華，一顆慷慨而透澈的心，一種溫暖美好的豐姿儀容，和一種熾烈的信念，她正是我們所
需要賓客呢？」

現在她已來到美國了。她對國會發表了纏綿動聽的演說。她對總統作了令人嚮往，意味深長的一天助自助餐」的辭語。從那以後，美國對她的豪邁和聰明的任務，無有不傾佩的。

美國駐華空軍司令陳納德准將，凡是和他會談過的，都不會忘記那個硬漢。他身材高瘦，皮膚作櫻黑色，他的兩頰和眼睛帶着一種剛硬的氣質，和他那路易西安那州的慢吞吞的鄉音，非常不調和。他最初到中國是作一個單獨的飛行員和航空戰略家，幫助訓練中國的空軍。後來他組織了美國空軍志願隊，在中國和緬甸獲得盛譽。他現在已正式編入美國陸軍，美國陸軍中有他參加是可慶幸的。

他和他的部屬的成就，已經是家喻戶曉。他們以十二比一到二十比一的比率，在戰鬥中擊落了大批的日本飛機。我在重慶時，中國方面記載他的隊伍和日本空戰七十餘次，雖然每次在數量上都不如敵人得多，但沒有一次不打勝仗。他的參謀長古柏上校有一天同我一道在重慶進餐，告訴了我許多故事，說這個將軍把正統的空戰戰略和奇異的非正統的戰術溶為一體，那結果是日本人已經明白表示爲他的所不喜歡的。我們的司機凱特少校告訴我，陳納德將軍的氣候情報系統，空中飛行情況，

以及地理狀態，就他所有的便利來說，實在是很顯露人。原來在中國沒有好的氣象台設備給飛行員必需的情報。陳納德將軍大部分依靠中國信差在羊腸小路上傳送到廣大區域的情報。

我自己已打聽出，陳納德將軍在中國的人望為何人所不及。一個波都的教員，當我調到他那一個美國人是他的學生最熟知的和最愛慕的，他直截了當地答道：「陳納德將軍」。我還聽見中國最重要的領袖們反覆談論他，而且永遠是帶着極大的尊敬和愛戴地談論他。

我會與陳納德將軍作過幾次會談的約會，但同他鄉談的交談終於跑到他在重慶附近的一個司令部去看他。我看他止在他自己的飛機場上，面對着排成行列的各式的作戰飛機，每一架都漆成一條巨大的紫黑徽的，這時我纔瞭解為什麼他很難測量機隊。

他以直接的親自的指揮擔任我所看過的最繁忙，最感動的根據地之一。他的任務不僅包括重慶昆明上空的保衛，還要防禦從印度經過緬甸到中國的最重要的航空線。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額外的任務，即轟炸廣州，香港，以及靠近萬里長城的開羅煤礦。他的空襲偵察辦法是我所聽說過的最獨特而有效的。他的部下幾乎全是南方人，台克薩斯州的人尤其最多，都宣誓效忠於他，並替他完成了奇蹟。

他手頭可用的材料之貧乏，我看見後大喫一驚。誰要看到他所指揮的人數那樣有限，對他所完成的業績就愈難置信。陳納德將軍屬於美國戰鬥人員的偉大傳統，他手下的空軍值得享有我們所能給與他

們的最好的和最大的一切。

他所請求的東西少得驚人，而我們已經供應給他的尤遠不及他所請求的那一點數量。陳納德將軍以沉着的口吻，但偉大的信心說明，可能做些什麼事來制止在中國的日軍，切斷他們通過中國海的供應線，援助中國軍隊使他們在得到一種空中掩護之後便能向東部中國邁進反攻。他告訴我，以目前的航空線越過喜馬拉雅山運輸汽油，零件，及各種補充，仍能維持一種有限度的軍軍攻勢。

他對於美國國內官吏未能認識他所看透的事物，有一種不平之感。

在這裏發動一種攻勢，其作用不僅在於軍事方面。它會給中國軍隊新的信心，給中國人民新的勇氣。我從中國回來之後，深深相信，我們應該不計任何代價避免給予中國一個觀念，即以爲我們要再忽視他們一年，並且集中我們的作戰於其他戰場。姑無論這種觀念對中國的抗戰有何影響，它會加重一種已受物價惡化了的民氣問題，而且會使賴以建設和平及戰後世界的與中國諒解之堅實基礎，無由奠定。

我在中國之日，天天都可以體會出中國對日抗戰已有五年多的這個事實。從重慶全體市民一遇敵機轟炸便躲入進去的那些無法置信的山洞，我可以見出。從中國人民在空襲之後立即跑出那些山洞，重建他們被燬的城市並且繼續戰鬥下去那種氣魄，我可以看出。

在中國的敵後，英勇的民衆繼續抵抗着；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我雖未眼見，却已耳聞，並且可以在

重慶得到種種的實證。我在重慶時，還有些脚酸腿痛但快樂的英美人不斷從日本佔領下的上海，香港，北平抵達那裏。他們在一半個大陸上，由一部分游擊隊交代給另一部分，這些游擊隊深入在敵人最後方形成了藉的抵抗的連續。所有中國的農民都在他們日常的英勇舉動中，表示出他們與自由是何做難以及他們爭取自由的熱望。

我還有到實證，證明中國為完成一個現代的軍事組織而有過長期的奮鬥，這對我是一個新聞，而且後來我知道這對於許多中國人自己都是一個新聞。過去許多美國人對中國軍隊的印象，依然是一羣職業化的匪徒；他們的官長都是和敵人互通款曲的專家，這差不多祇是一幅支離破碎，技術落後國家的軍事方面的風刺畫而已。在今天，這樣的印象作為風刺畫都不存在了，中國在軍事方面已經統一起來了，它的領袖是有訓練的幹練的將領；它的新興軍隊，儘管顯著地缺乏現代作戰裝備，却有堅強的戰鬥的隊伍；他們既知道為什麼而戰，也知道如何為它而戰。在中國，正如在俄國一樣，這是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戰爭。即使是很有地位的人的兒子也有入伍作士兵的，這是三十年前募兵時代根本想像不到的事。

有一天下午，我站在成都城外一條泥底但流得很急湍的河上的窄橋邊。我的面前沿岸一座很厚的牆後，有煙子升起。我可以透過濃煙看見機關槍火的閃爍，我背後的田野上傳來一陣迫擊砲聲。河裏面有許多中國青年，奮命洩過激湍的河水，有些在頭上舉着步槍，有些拿着長繩子繫着一座浮橋。

一嘗他們全身沉入最急的流水中時，我差不多可以下很重的賭注，認為他們決不能活過去。但是他們居然將那座浮橋運過了河，這時突然有成千百的其他士兵從我背後的田野上一躍而起，他們的鋼盔和制服都很仔細地偽裝起來，我一點都未曾發現。他們跑過浮橋，一擁而至河對岸，展開陣柵，對一個大約一英里外的村落作攻勢姿態。

他們最後佔領了那個村莊，但在佔領以前，他們會切斷滿佈地雷的鐵絲網，掀起好多股地雷爆發的濃煙，沒有任何掩護，匍伏通過一塊空地。他們帶着全套武裝進入村莊，停下來後遍身泥土，醜態而疲倦，但因舉行一次野外複雜的作戰行軍，新添了一層知識之故，又顯出得意之色。

這是在中國最大的威爾中央軍官學校舉行的一次演習，一種戰鬥訓練。組織這一次演習的，是美國西點軍官學校的中國華學生，他站不中的身姿，在演習進行之際，可解釋各項的法則。該校學生一萬名中至少有一部分參加了這一次的演習。這是一個很動人的表現，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同種演習比較起來，決無遜色。我在那一天下午以及後來一再看到的情形，在我覺得是表現一個時代的終結——四萬萬中國人已被日本，英美，或任何軍隊隨意蹂躪的時代之終結。

第二天在中國空軍訓練學校，我又看到了中國打了五年多年的這個事實。這裏成千百的中國青年軍官學生——這些人們在以往幾年以前還有人稱他們「不是一個戰鬥的民族」——用粗大的木棒互擊，在彼此搏鬥扭打中吼叫，作着我所見到過的最堅毅的個人肉搏訓練。我又在這裏看見中國的童子軍，

有些纒八歲，接受全部紀律和軍事生活的訓練，準備充任職業化的戰士。

我向董顯光先生說，我想看中國的一部分前線。最初，這似乎是不可能。後來我纔知道，蔣委員長對我在中國射擊的安全入關切了，必須向蔣說通。董顯光先生要求假以時間來準備一切。最後終於安排好了一次旅行。雖然我們所到的地方沒有我們預料的那樣危險，我們却仍能得到另外一次證明中國在五年餘全面抗戰之中學習了多少東西。

我們飛到西安。然後驅車出城，藉着一條山路上沿途的短促的照耀，攀登到另一個軍官學校。當天夜晚我們每出發到前線，很不調和地在蒼藍的臥車中車行。

第二天黎明我們下了火車，乘上鐵軌上的手搖車走了十五英里。這裏離渭河幾英里，也就是這一戰區的前線，有一個同心的軍官認為我們使渭河的日軍看去太像射擊的目標，於是我們就開始用自己的腿，在黄土層中深深踏下去的道路上步行了最後幾英里。

前線原來是一個村莊，四面有網狀的壕溝環繞。黃河在這一點上有一千二百碼寬，但是在一個前進的觀測所用砲兵的望遠鏡看去，我們可以看見日軍對準我們這邊的砲兵陣地，和他們自己陣地裏的士兵，當我們在那裏時，一切是平靜的。但是顯然不是永久平靜無事的；事實上，在我們到達那裏的一刻功夫以前還有過砲轟。

我在這個線前上會見到蔣委員長的公子蔣緯國上尉。他說着一口流暢的英語，以整整一天時間向我

解釋爲什麼日軍不能在這裏越過黃河的原因，而這個地區的羣山中還有一個缺口，是歷代向中國南部侵入的孔道。

我們看見了砲兵，步兵，鋼甲車，和建築在山裏的工事，準備對付日軍進攻的。我們檢閱了蔣委員長精銳部隊之一的第XX又師，訓練精良，服裝整齊，有好的現代的裝備。我會向那些士兵講話，他們大約有九千人站立在烈日之下，他們注目着我站着的小木台，在我看來好像還有一個人在我講完以前稍稍移開他的注意力，雖然我說的是英語。當我的話給譯成華語時，他們如此之高聲歡呼，甚至日本軍隊都一定會聽見了而奇怪爲什麼這裏這樣高興。

走向我們火車，坐下喫飯時，蔣緯國上尉向我斷然表示，我適才看過的決不僅是一個專爲參觀的場所。他走進餐車裏邊，抱了一堆日本騎兵的刺刀來作爲贈給我們一行的禮物，還有很好的法國酒。這些都是突擊隊夜間渡河神速地襲入敵軍後方竄獲回來的東西，他們常常帶回這樣的竄獲物；還有更重要的戰利品，如俘虜和軍事計劃等。蔣上尉告訴我，這些突擊隊有時在敵後停留數星期之久，切斷交通，組織破壞工作之後纔返回到河西岸自己的司令部來。

第九章、中國的通貨問題

我離開中國時，對於它的當前經濟的和通貨的問題，不覺有些氣餒。很明顯地，它的通貨情形若以貨幣經濟的眼光看去，也許早已不可收拾了，然而中國始終還未達到財政上不可收拾的境地。不過你會感到它的處境正是瀕於危殆的轉角處，而且好久便已如此了。

中國的物價指數決不能滿足一個美國銀行家，使他對於應付通貨膨脹的情勢有所決定。在我們所訪問過的幾個城市中，物價相差甚大。而且我一天天明瞭，極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主要不靠貨幣經濟生活，除了少數衣食必需品和幾種日用的製造品外，不大受物價的拘束。但是，即使承認有這些條件存在，我們對通貨膨脹的表徵，依然是使一個美國人極其困惑不安的。我聽說，重慶的批發物價已至少會漲到戰前水準的五十倍。零售物價在若干場合已超過從前的六十倍。在我十月間到達當地以前的一兩個月中，物價的會漲率大約是——百分之十，這就是說，許許多多的人民，尤其是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們，很多以前消費的物品，現在已得不到了。

在成都時，有兩個青年女教師為我擔任了一天很忙的翻譯工作。她們都是受教育的婦女，說一口很好的英語。在一個正急需有訓練的人材的青年共和國中，她們顯然是最優秀型類的公民，但她告訴我

說：生活費用已增漲得如此之高，甚至於她們要的東西竟不如那最低下的運貨苦力，他們不靠固定薪水而是靠工資生活；工資却也反映了通貨膨脹的情勢。

在我同中國大多數大學的校長討論教育的那個城市中，我發現許多大學的收入還維持着它們的戰前數目，有的還增加了，美國統一援華會更盡極大力量維持大學預算在它們的戰前水準上。但是物價漲了五十倍，美元折日法幣的官價僅僅增加不過三倍左右。所以，結果是現在大學本身和它們的教授學生都遇着同樣的危機。

依我看來，這種通貨膨脹有幾個原因。第一是中國不能不藉發行紙幣籌措戰費。一九四二年中，政府開支祇有四分之一是由稅收來應付的。新設的政府公賣，現亦包括鹽、糖、火柴、菸草各業，對於增加財政尚有裨益，但不敷向多。中國幾乎沒有公共儲蓄來消納政府公債。因此之故，政府爲了繼續作戰就不得不利用鈔票。

一部分原因也是政府未能採取一種貨幣和物價管制制度？一種適合的庫收和其他租稅方法，和吸取因通貨膨脹的本身而造成的若干部分人物增多了的利潤和收入。政府也未能嚴格制止對於基本物品的操縱居奇。人人都向我說，蔣委員長正致其最大努力以剷除種種軌外行爲，造成一種金融的秩序，並肅清一切貪污腐化分子。

這種通貨膨脹發展的第三個原因？是自由中國裏面貨品的尖銳缺乏。這個一部分是由於我們自己未

能把貨品送給中國，一部分由於日本佔領了中國大部分以前開發過的區域和切斷了除中蘇中印外中國與外界所有的通路。自由中國在其現有範圍以內發展任何大規模的生產，都需要原料和若干基本的機器，這兩者在今天都極其不易得到。

就我目睹所及來判斷，中國人在應付這個問題上的確有許多奇蹟，但是奇蹟是不夠的。經濟部長翁文灝博士有一天在重慶領我看一家由河南遷入四川的紡紗廠，和一家在一九三八年由上海遷去的造紙廠。他向我證，政府一共騰不過十二萬噸的設備移入內地，其中大多數是鋼鐵和紡織工業的。

那兩個工廠大小適宜，看來頗講效率。它現在的生產能力是每天可出紙五噸到九噸。翁博士向我說，將這個數字與自由中國所佔着的一萬萬人民的需要加以比照，就足顯示出中國在戰爭中開努力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基礎所碰到的嚴重問題。

中國上層合作者是我在國外見到的。會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因為種種問題，意見不一，困難頗多。經營上命的人們相信有些中國的金融和產業勢力在設法破壞它。但是我會同蔣委員長詳細討論過他們的問題，他是他們的一個堅守的朋友。不過，無論如何，沒有重工業基礎，又沒有任何適當的運輸系統，要它們在接近未來應付戰爭中的生產需要總是困難的，自由中國所保有的鐵路不到一千英里。中蘇公路，如我上面所指出的，是陸路唯一的一條出入口的通路，而越過喜馬拉雅山的航空線和通過日軍防線的走私路線，運輸量都是極有限的。

所以，這就是當前的問題，我在中國遇到的許多思想最優秀的人物，有的是中國人，有的是外國人，正在設法求其解決。這個解決之道究竟如何，我不大加以研究是不能說出的。但是我以斷言，它一個主要特點必須是放鬆對於中國經濟生活和遺產的嚴緊控制以及動員全國偉大的人力泉源，從事遠較現在爲更大的貨物生產和勞役。

我想政府人員的傾向，對於通貨膨脹的看法，遠不如與我談話過的美國人那樣嚴肅。他們指出，祇有中國的中間階層的收入是靠固定收入生活，因而他們的生活標準受了通貨膨脹的影響，但這個中間階層畢竟是全國人民中的極小一部分。他們認爲苦力，一般勞力的人，和多數農民，都不靠固定收入，得到的代價比前高得多了。實際上反荷得着通貨膨脹的利益。

對於那類觀點，這祇能以一句話，就是：無論是誰，若要拿我們的經濟中同樣的問題來衡量中國的通貨問題，一定會得出大謬不然的結論，我遇到一位對中國經濟最有研究的學者，他向我估計說，中國人有百分之八十自給自食，沒有什麼金錢的需要，他們的金錢購買力幾乎都是沒有意義可言的。

但是這種說法未免籠罩過正。它雖然可以使目前的情勢看來好像不怎麼絕望，但這種說法却表示出前途希望不大。四川省政府主席張寧是我在中國曾見到的最精明而深思的行政官吏之一，他曾告訴我說，四川省內實際耕田的人有百分之七十是完全的佃農或半佃農。他說，這些人都是以實物而非金錢

向地主交租，因此之故，糧價無論怎樣上漲對他們的好處極微，然而他們必盡確實的那些少數貨物應要對等加價起來，就會將中國大多數農民的脆弱的生活侵蝕掉了。

最重要不過的，是中國經濟仍然貧困，貧困的厲害，這個冷酷的事實。爲了支應戰爭需要，或爲支應戰爭結束後的復興工作，它必須對它自己的天然富源有一種大得很多很多的生存性的組織，無論是誰，凡是看見過它的人力與原料富源的人，凡是感覺到中國人民開發這些富源的深沉而勇往直前的決心的人，都不能懷疑這個事實。

在我看來，對於中國通貨問題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恐怕是就技術上講說中國所能接受的更大量地滙入貨品和技術家。中國人要怎樣來組織和資助這種更大量貨物與技術的流入，那是他們自己去決定的事。實行比我在中國各地所看到的更普遍一些的土地所有權，就是說增加自耕農，是會有幫助的。在我與西安和蘭州的一些中國青年的銀行與工廠經理談話之後，我想金融統制若有較大限度的開放，也會有幫助。政府當然不可避免地要佔一個主要的角色，但在我看來，使人民在這上面負起更大的責任是賢明的辦法。不過，這些問題到底是教中國人自己去決定的。

同時，美國所能幫助的地方還多，首先，我相信，我們對於和我們並肩作戰的中國人的友誼，必須更真實些，更具體些。我們必須藉着通過蘇聯，橫越喜馬拉雅山，或奪厄繩甸，或三路並用，送給他們所必需的機器，飛機，軍火，和原料。

但是我們也必須爲我們自己凝思一下這個同盟，並決定它對我們的真正意義。我們必須決定，我們究竟能否在東亞找到另外一個比中國更好的盟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預料一定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就必須有所準備來履行一個盟國的義務。這些義務之中，包括經濟的合作和目前的軍事援助。但是這包括一項義務，就是瞭解中國人和他們的問題。中國人對於高貴的詞藻如空洞的表示，已經沒有什麼信心了。

第十章 善意的寶庫

十月九日我們離開成都，差不多經歷中國一千英里，穿過了蒙古與戈壁的廣漠原野，穿過西伯利亞幾千英里，橫越白令海，縱貫阿拉斯加及加拿大。十月十三日返抵美國。經過子午線後我們把日子提前一天。

當你在四十九天之內環飛世界一週的時候，你纔知道世界不但在地圖上變得小了，在人們的心裏也變得小了。全世界有千百萬人抱着一些共同的理想，好像他們住在同一個市鎮裏一樣。其中有一個我能夠毫不遲疑地報告出來的，對於我們美國人具有非常意義的理想；那是尊重與希望的混合物，全世界以尊重與希望的心情期待美國。

不論我同巴西的貝朗(Belon)或納塔爾(Natal)的一個居民談話，或同尼及里亞的一個把東西頂在頭上的人談話；或同埃及的一個首相或一個國王談話，或同古色古香的巴格達的一個蒙着面紗的女子談話，或同現在名叫胡胡的充滿神話的波斯的一個國王或一個織毯工匠談話；或同好像我們美國中西部城市的安哥拉街裏的一個土耳其國父的信徒談話，或同俄國的一個手腿強壯神氣堅決的工人或史達林談話，或同中國偉大的蔣委員長的夫人談話；或同前線一個中國士兵談話，或同西伯利亞人談

罕到的森林中帶着皮帽的獵人談話——不論我和這些人民之中任何一個人談話，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紐帶，就是他們對於美國深摯的友誼。

他們每個人都往往以近似純愛的友誼屬望美國。我確實認識了一件清晰而有意義的事實，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對於我們美國人民的一個龐大的善意的寶庫。

創造這個龐大寶庫的，有許多事物。首先是美國人——傳教士，教師，和醫生——在世界的遼遠的角落裏建立的醫院，普通學校和大學。許多古國的新的領袖——今天推動着伊拉克，土耳其，或中國的人們——是交過只以散播知識為唯一目的的美國教師的教誨的。現在，在我們危急時期，這些爲我們創造友誼的男女是值得我們感漸滌零的。

那些開闢新公路，新航空線，新航路的美國人也爲我們儲存了善意，好像在銀行爲我們存下款子一樣。因爲他們之故，世界上的人竊說我們爲一種推動貨物 and 思想的流通和加速這種流通的人民。因此他們尊敬我們，他們尊重我們。

我們的電影在建立這個友誼的寶庫中也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我們的電影在全世界到處放映。各國人民都能親自用他們的眼睛看我們是什麼樣子，聽我們發什麼聲音。從納塔爾到重慶，不斷有人問我關於美國電影明星的事——女店員和給我端咖啡的人熱烈地問，總理和國王的夫人也熱烈地問。

我們在國外的善意的寶庫，還有別的原因。不論工業化或未工業化的國家的人民都敬佩美國勞

工的志趣和成就；他們聽說過，他們也渴望效法這種志趣和成就。他們還愛了美國農工商業技術的盛勳。在我到過的各國裏，差不多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美國人建造的偉大的水閘或水利工程港口或工廠，我發覺他們喜歡我們的工程不僅因為我們的工程能使生活更加容易更加富足，而且因為我們證明美國的企業不一定導向政治統治的企圖。

我到處發覺對於外國統治所懷的恐懼。人民心裏以為我們和這種統治沒有關係，這一點促使他們高度地贊許美國。那種贊許的崇高是我所不敢想像的。我發現世界的人民何等洞曉我們不設法在任何地方或任何區域把我們的統治加諸他人身上或強索特權，我爲之驚訝不置。

全球的人民都知道我們對於他們沒有陰謀，都知道縱然從前我們退出國際舞台走入錯誤的自給自足之路，卻是沒有惡意。他們還知道我們在這個戰爭裏，我們不爲利潤，不爲戰利品，不爲統治其他人民的生活或政府的代管權而戰。我想這是我們全世界的善意實存存在的唯一最重要的原因。

我週遊了世界，到處，確實是到處，我見到了美國陸軍的官兵。有時他們只是很小的部隊；到了某些別的國家，我又見到他們住滿了多麼英畝的龐大的兵營。無論在那兒，我見到他們，我發現他們正增加着外國人民對美國的善意。

這兒有個顯著的事例，就是我們C-54式陸軍飛機的全體服務人員。除去這次因戰鬥任務被派到外國的之外，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官兵從前會到外國。他們不是受過訓練的外交家。他們大多不說外國話

但是我們無論在何處着陸，他們便爲美國交下了朋友。當伊朗國王生平第一次坐了我們的飛機之後，他和我們的駕駛員凱特少校握手，他的神情，我只能說是一種欽佩與羨慕的混合。他那種神情，我將有一個長的時期不能忘掉。

我到處看見的美國士兵，我很引以自豪。我感覺有一種自信，我們美國人民的軍隊不願意把自己局限爲職業軍人，而自願地協助保存我們這一代人繼承下來的善意的寶庫，同時經由直接的經驗看出爲什麼這是美國的戰爭。

因爲就我的眼光來看，這個寶庫的存在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一個政治現實。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有這樣一個寶庫。我們必須利用這個寶庫在人類對自由與正義的追求中，團結全球的人民。必須堅定地保存這個寶庫，然後全球的人民纔能和我們一起，向摧毀我們所愛護渴求之一切的那個萬惡勢力戰鬥和工作。保存這個善意寶庫是個神聖的責任，不但對於全球有偉大抱負的人民如此，對於在各大洲作戰的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因爲這個善意的蓄水池裏的水是清潔的激勵奮發的自由之水。

只要我們不嘲弄我們鄰邦有奪取的理想，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日本天皇便都不能用他們的宣傳或他們的武器把我們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善意的團結力量搶走，或者使我們自己分裂，或者使我們和盟國分裂。一個穩定政策並不便宜。因爲這種政策將使我們失掉全世界人民對於我們的理想與技術之信仰所產生的極寶貴的精神與物質的財產。

倘若我們自行捲入舊世界的陰謀活動，以及宗教的，國家主義的種族的集團，我們就真地成爲「票友」了。倘若我們忠實守住我們基本原則，我們將發覺我們是全球各地人民渴望實現的那種世界中的「內行」。

第十一章 我們爲什麼而戰？

說這次戰爭是全世界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一種革命，已不足爲奇了。但眼見着那個革命的進行，却有些驚心動魄，而那正是我所見到的。它令人興奮，又有些嚇人。它令人興奮，因爲它是新的實證，證明人類內心中有一種鉅大的力量來改變他們的環境，爲爭取自由而戰，而且具有一種本能的清醒的自信力，以爲有了自由，他們便能完成一切。它同時又有些嚇人，因爲聯合國所有不同的人，撤去他們的領袖不論，對於他們爲什麼而戰，對於我們必須用來武裝我們戰士的那些觀念，還沒有達到一致的意見。

無論槍炮刺刀在人類的發展中作用是如何重要，觀念的作用尤其重要得多——而且在長時期內更有決定性。古往今來，人們有過無數次的征戰，決不是爲了互相廝殺以自娛。他們總是爲了一個什麼目的而戰。有時那個目的並不很響亮，有時它是頗爲自私的。但是沒有目的而打贏的戰爭實際是沒有得到勝利的戰爭。

具有一個目的而打的戰爭，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我們自己的美國大革命。我們並不是因爲恨英國人，要殺死他們，纔發動革命，而是因爲我們愛好自由，並且要建立自由。從自由對世界的意義

而言，我們可以公平地說，在阿克城打贏的勝利是從來用武力打贏的最大的勝利，但是這並不是由於我們的軍隊膽大驚人，而是由於我們的目的，是那樣的鮮明，那樣的真實，那樣的確切。

不快意的是，對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戰爭，我們却不能這樣講。那是一次沒有獲得勝利的戰爭，已經差不多成爲歷史的真理。當然，在我們進行那一次戰爭之際，我們總以爲或是說，我們是爲着一個崇高的目的而戰。我們的大元帥威爾遜會用流利動耳的詞句表明我們的目的。我們作戰是爲世界在民主方面得到保障——並不是用口號來保障，而是藉着實行以「十四點」聞名的那一套原則，藉着建立以國際聯盟爲名的矢志效忠的國際機構，來保障它。那當然是一個崇高的目的。但是等到把它現在和約中時，一個致命的罅隙便顯露出來了。我們發現我們和我們的盟國並沒有真正同意於那個目的。在一方面，我們的盟國中有幾個已捲入一些秘密條約之中，而且它們處心積慮想實行它們的那些條約，進行傳統的縱橫捭闔的外交，而不願打開威爾遜努力刻書出來的新的遠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真摯地效忠於我們昭告天下的目的，如我們使全世界相信的那樣。最後的結果便是大家對戰爭所要爭取的許多目的，棄若敝屣。因爲那些目的都被放棄了，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斥責上次的大戰是一種大規模無謂的屠殺，成千百萬的人民喪失了性命，但是從他們犧牲的灰燼中並未生出新的觀念，新的目標。

現在，我想這些考慮引導我們走向一個結論。我想我們必須認定，在戰爭期間如果沒有贏得什麼東

西，在和平中也是不能贏得什麼重要事物的。我所說的是重要的事物。當然，有許多詳細節目必須在和會席上與和會以後的若干會議中擬定——那些細節決不能在戰爭壓迫下按照法理來製訂，是不言而喻的。舉例說吧，我們——以及我們的盟國——不能停止下來不打日本，專去擬製一個勝利後如何處理緬甸的詳細計劃。同時我們也不能爲了現在解決波蘭前途的預細問題，而放棄我們對德國的壓迫。我們現在在戰爭期間必須贏得的，是原則。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解決路線是怎樣的，請再讓我與美國大革命爲例。當我們打那次戰爭時，我們對於美洲合衆國的實際構造，一些影子都沒有。誰也沒有聽到憲法，聯邦制度，三權分立制，和小州可以加入聯邦裏來的那個輝皇的相互妥協方式——這一切都還是後來的發明，祇在幾個偉大政治家頭腦中孕育着罷了。而那些政治家本身當時也仍是不十分明瞭的。然而那個變成爲美洲合衆國的偉大政治構造的原本原則，却無可懷疑地包括在「獨立宣言」中；在當日的歌詠和演說之中，在士兵的火營周圍和大西洋沿岸各地茶餘酒後的討論和私人的辯論中。雖然像麻薩諸塞和唯吉尼亞那些大州感藉最空洞的宣言和最脆弱的政治結合（「大陸議會」）團結起來，但是它們所有的公民對於他們爭取的事業和他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

麻薩諸塞州和唯吉尼亞州在戰爭期間如果沒有同意起來，它們對於和平的原則一定不會一致。他們在和平中所贏得的，正是他們在戰爭中所贏得的——不多也不少。這個真理，如果還不夠彰明昭著，就可以舉出我們的一樁災禍來反證。當時，那幾州的人民在黑人的自由或奴役問題上就沒有一致的意見。

見。結果，南方被奴役的黑人周圍便發展起一種與北方不同的經濟，而其影響所及，則產生了另一次更血腥的戰爭。

從這個簡單的教訓和歷史的同樣教訓中，我們還不能理解我們今天的任務麼？我們必須理解。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在將來的和平中祇能贏得我們在戰爭中所能贏得的一切——不多也不少。

首先，要決定我們想贏得的是什麼？顯然必須和我們的盟國達到具體的同意。這與也像我們自己的大革命一樣，對於細節的同意是不必要的。或者甚至說不合乎要求。但是除非我們準備重複上次大戰的不幸歷史，否則原則上同意是必須贏得的。而且，這裡同意不可以僅存在於盟國領袖之間。我所想到的基本的同意，必須在盟國人民自己中間建立起來。我們必須確保：我們基本是為爭取同一事物而共同戰鬥的。

這到底是什麼意味呢？它的意味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橫越太平洋，大西洋，以及在國內，自由和坦白地說出並交換意見的義務。除非英國人民瞭解我們在美國思想的道理，記取在心中，除非我們對於英國和不列顛協約國的人們的思想也有同樣的概念，否則沒有達到同意的希望。我們必須懂得蘇聯與中國獲取人民目的在那裏，而且我們也應讓他們懂得我們的目的。

任何一國的公民，都為怕使他們領袖們的當前的，有時是殃民的政策，蒙受禍患，以致緘口不言，這種立場是極頂的愚蠢——甚至和自殺差不多。

例如說，有人告訴我們，普通公民，特別是那些不精通軍事的或那些與政府無端的人們，應該力襄發表關於戰爭行爲的意見——無論是軍事的、工業的、經濟的、還是政治的。說者謂，我們應該秘默，一任我們的領袖和專家們去解決那些問題，不受任何煩擾。

我相信這一種立場實際上可以變成一堵堅硬的牆壁，把真理排斥出去，把誤解和虛妄的安寧鋼鎖在裏面。當我去年秋天回國以後，我會向美國人民報告說，在許多重要方面我們都沒有做出好事來；我們是在打這場大戰的途中，但是我們曾遭一個大險，就是我們會耗費遠較我們必需耗費者爲多的人力和物資。那一個報告是爲公眾而作的。這樣的報告就不應該被檢查掉。應該把它們公開於全體人民。因爲除非我們承認並改正我們的錯誤，否則我們會在戰爭完了以前失却我們一半盟友的友情，然後還要失却和平。

顯而易見，要打赢這次戰爭，我們必須把它認作我們的戰爭，我們大家的戰爭。要如此，我們必須儘可能知道它的一切，違反軍事安全需要的場合，自然另當別論。措置失當的檢查制度，是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

法國有過一位軍事領袖，名叫馬奇諾。一個有遠見的法國公民偶而表示意見說，在現代戰爭條件之下，建立在下的堡壘恐怕對抗埃里克是不適當的呢。馬奇諾立刻向他警告說，關於這種事情，他應該聽命於專家。

這一次戰爭直到現在為止的紀錄，還無法使我們深信我們的政治和陸海軍專家有牢不可破的權威。軍事專家以及我們的領袖，必須經過不斷接受民主的放大推動力的考驗——這種力量就是從誠摯的自由討論中發展出來的輿論的彙策。

舉例說吧，因為有輿論對於隆美爾大勝下盟軍在北非的慘敗加以批評，總促成了當地指揮權的變動。當我在埃及時，制止住隆美爾的就是那個新的指揮部。從那以後，它又將他逐出非洲的四分之三土地以外。我以為那個勝利一部分應歸功於英國的輿論。

美國人民大都以為在極權政治的各國中，沒有什麼輿論或輿論力量的運用。事實上我所到過的每一個極權政治的國家中，它的政府都有其密設的方法去決定人民在想些什麼。史達林有他自己的民意測驗方式；史稱拿破崙在登岸造極之時，他諳在他的白馬上，脾氣着莫斯科的斷瓦殘垣。還是每天急切等待他的信差逐日帶來關於巴黎或我們想些什麼的諜報。

我環繞全世界所到各國，都曾見着某一種輿論很有力地影響着戰爭的發展，並且影響着徐徐滋長起來的和平觀念。在巴拿達，我從每一間咖啡館中的談話裏可以見到，而這種咖啡館當地很多很多。在蘇聯，它表現於大的工場會議中，和到市民衆的談話中。他們差不多和我們一樣自由地在私人談話中交換意見，與我們想像的蘇聯情形完全不同。在中國，新聞紙雖然不若我們那樣毫無拘束，但也以驚人的自由反映並領導着輿論，在中國與我接談過的人，無論是共產黨的領袖，一個工廠的工人，一個

大學教授，或是一個士兵，似乎都沒有任何猶疑地發表他的意見，而且其中許多意見未必都與政府的政策一致。

到每一個國家我都發現出火線後方的人民內心中存有疑慮，他們正在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從他們所問到的關於戰後英國，關於英國，以及當我在中國時關於蘇聯的種種問題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在我看來，全世界都處於一種熱切的、急切的、渴望的、野心的狀態之中，準備接受任何重大的犧牲，祇要他們能看出一些希望讓那些犧牲不至虛擲。

一九一七年的歐洲，大約也是處於和現在同樣的狀態中。這是血和戰爭困頓的不可避免的產物。那時、一九一七年，列強給了世界一套答案。不久以後，威爾遜又給了一套。沒有一套變成爲戰爭的血與肉似地一部分，而都是加諸戰爭之上的。所以沒有一套解答償還了戰爭的犧牲。結果是一場停戰，而不是真正的和平。

我不相信這次戰爭一定也如此。在戰爭期中的今天，即使是相隔很遠的居民，住在英國和各自治領的人民，美國人，俄國人，中國人，心目中已有了共同的目標。但是我們還必須將我們的這些共同目標弄得清晰而真實。

人民必須在戰爭期間確定他們的目標。我會故意在世界各國的人民中間認真討論那目標。因爲我經常害怕着，也許在世界的人民對於他們爲什麼而戰以及他們戰後希望些什麼還沒有得到共同的瞭解。

戰爭已經終止下來了。我是上次大戰中的一個士兵，在那一次戰爭完了以後，我眼見我們一切美麗的夢都消逝了，我們的信念的口號變成了善謔者的笑料，而這一切都是由於作戰的人民沒有在戰時期間得到共同的戰後目標。我們這一次必須決心不蹈覆轍。

成百萬的人民已經死在這次戰爭中了，戰爭終了以前還有無數萬人犧牲。除非英國人，加拿大人，俄國人，中國人，和美國人，在共同致力於戰爭之際找出戰後共同努力的工具和方法，否則我們人民大眾便又白白渡過了我們這一個時代。

我們的領袖們，有時共同地有時單獨地，已會表明過我們的一些共同希望。最精彩的表示之一是蔣委員長於去年十一月在「紐約先鋒論壇報」上對西方世界發表的一篇文章。他的結論說：

「中國並不期望以東方式的帝國主義或任何種類的閉關主義，代替西方式的帝國主義。我輩應將同盟集團及其他特殊作用的團體，進而持有組織的全世界的結合。我輩以爲新時國家間平等互利的世界，非東方式的閉關主義，亦非歐美式的閉關主義，而係全世界整個的合作，乃得消弭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而代之。」

此外，有我前面引證過的一篇史達林關於目的的聲明，這是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紀念十月革命時發表的，那是一個特殊明快而確切的聲明：

「一種族特權的廢除，民族平等，它們的領土的完整，被奴役民族的解放，它們主權的恢復，每一民

族依照它的願望處理本身事務的權利，對於受難民族的經濟援助，對於爭取物質福利的協助，民主的各項自由的恢復，希特勒式政體的毀滅。」

羅斯福曾宣布過「四大自由」；邱吉爾曾與羅斯福一同向世界公布過「大西洋憲章」。

在我看來，史達林先生的聲明和大西洋憲章有一個共同的虛妄處。它們都預測西歐將重行割裂為許多舊式的小國，各自有它本身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主權。正因為有這種陳腐的制度，纔使着成千百萬的歐洲人民殺希特勒的「新秩序」所俘虜了，即使在希特勒暴政之下，他們還至少看出一種希望，就是創造出一個區域，其範圍之小，足以使現代世界的經濟能夠成功地發揮其效用。他們已從痛苦的經驗中體會到，在許多個獨國家主義的高牆下分裂開的受限制的貿易區，以及隨之而來的縱橫捭闔的政治，使貧困和戰爭無法避免。

歐洲的許多小國家作為許多政治單位而重行創造出來，這是對的；把它們作為許多經濟的和軍事的單位而創造出來，如果我們真地希望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以及世界的和平與經濟安定計，使西歐穩定下來，就不對了。

不過，蔣委員長聲明，史達林先生的宣言，大西洋憲章的規定，四大自由的提出，每一個都是進步的標幟，並已激起了全世界高度的希望。

但是，如果在實行方面趕不上各種已有的表示，或者，如果使其實行陷於不可能的各個國家自己的

希臘從中作梗，那時世界人民就要趨向一種憎世疾俗的態度，使世界秩序永無實現的希望。

每一個地方的人民，無論有表示的還有沒有表示的，都是留心注視着宣布過這些文件中的原則的領袖，是否心口一致。

在我動身旅行以前，邱吉爾先生關於大西洋憲章會有過兩段聲明：（一）它的作者「主旨所在，首為現在的停戰條件下歐洲各國與各民族的主權、自治、與國民生計的復原」；（二）大西洋憲章中各項規定，「對於不時發表過的有關印度、緬甸、或不列顛帝國其他部分之各項政策的聲明，並無任何改變。」幾乎我所到過的每一個國家的總理和外交部長，以及無數的人民，都問過我，這意思是否是說大西洋憲章祇能適用於西歐。我告訴他們，我當然不明白邱吉爾先生的意思，不過邱吉爾先生既然說它的作者主旨所在首為歐洲各國，他未必一定是將其他國家完全除外。聽我這樣說的人不耐煩地將我的回答一下子駁了，說我這是法理主義和枝節的看法。這是我後來大大感覺苦痛的理由之一。當我聽見邱吉爾先生下面這說話的時候，他說：「我們的意思是保持我們自己的一切。我不是為主持不列顛帝國的解體而作國王陛下的首相。」不過，後來我同許多住在美國的英國人談話，留神英國的報紙，並和英國以及不列顛帝國人民有過極大數量和繼續不斷的通信之後，我又高興地發現出英國的輿論在這些問題上甚至比美國的意見還要前進。英國人不存什麼懷疑——並且據我所能見到的，不存多少遺憾——認為陳舊的帝國主義必須過去了，不列顛各民族的自由為一體（British Free Commonwealth）。

West of Nations) 的原則必須以急速的步伐擴張到不列顛帝國的一切角落。

也正因為我們領袖們在實行上是否合乎他們的聲明，還在考驗之中，所以我們自己的北非政策在我看來確是一個悲劇。它是從羅斯福總統宣布美軍勝利地進入北非之日即已開始。總統在聲明中並沒有表明我們進軍的正大光明的理由，而祇是以那陳腐過時的外交詞令作爲理由，這種詞令從未騙得過任何人，當然更沒有騙得希特勒以同樣理由侵入它們領土的比利時與荷蘭。「爲了預防防止德義對非洲的侵入，免其成功之後構成由西非經越比較狹窄的海洋對美洲直接威脅，一校強大的美國軍隊今天在非洲法屬殖民地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岸登陸了。」

接着便是在「暫時性的軍事權宜」理由之下與達爾朗的來往，那是一切自由人民已經曉得鄙視的象徵。而那個理由又使人們難於批評，因爲如果加以批評，就似乎顯出不忠於一個剛剛和英國艦隊合作之下完成了一件有組織戰略上精彩傑作的高明軍事統帥。但是那個解釋對於許多根本不相信這是士兵的主章的人們，都無法予以滿足，而且他們感覺到他們又一度看見外交手法把我們已經昭告天下的原則置之不顧。

緊接着回來的維琪駐美公使拜魯頓之被任命爲北非高級官吏，更證實了他們的疑慮。我們之中所感到皇惑的人，都希望比表面更好的一些事物終於要表現出來。但是即使那事會發生，我們可以斷言，倘如美國在世界上的善意的寶庫不是如此之富厚，它就決不能支持這樣重大的打擊。因爲蘇聯，

革國。以及歐洲被征服的人民都覺得受了背叛而感到氣餒。甚至在遙遠的中國，由於我們隨意應允將越南歸還給法蘭西帝國，故，那裏的人民已經受了震動，這同更加抑了他們的信心。

邱吉爾與羅斯福並不是言行受到注視的唯一的領袖。史達林先生未能把蘇聯關於東歐的希望公布於世，也知道了一般人對於領袖們所宣布的目標不能盡信的心理。

無論領袖們的宣言，還是世界人民的意見，不管是它們怎樣明快，若是我們在戰爭中不計畫，不將計畫付諸實行，依然是毫無成就的。

當聯合國共同宣言公布之時，南美洲，非洲，蘇聯，中國，不列顛協同體，美國，歐洲被征服國家，以及遠東的東方陣營，另以民衆，都以為他們已看到了一個遠景，就是簽署於那個宣言上的各國攜手並肩成爲共同鬥爭的伙伴，一致進行解放人類的工作。他們以為那些國家在戰爭中間會共聚一堂，商討世界的新秩序，並且計畫未來的世界。因爲他們祇有這勝，戰爭纔會更快地結束。他們也知道，現在學習共同工作就是最好的保證，保證各國能學會在將來共同生活。

那個共同宣言簽署以來已過一年多了。今天聯合國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和一個同盟的條約。但是我們必須回到一個事實，就是：如果不使滿懷希望的成億萬人民失望，如果要實現——哪怕是部分地實現我們所想的世界，那麼，聯合國就應該在今天，而非明天，變成一個共同的會議，不僅來爭取戰爭的勝利，並且來爭取人類的幸福。

當我們作戰之際，我們就必須建立一種作戰完了後還要存在下去的共同努力的機構。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國際的政府成功的機構，都是逐漸成長的結果。它們不能在一天之中創造出來。若在死灰復燃的國家主義的衝動中，在追求私利之中，在道德的墮落之中，以及在戰後時期平時常發生有經濟與社會的脫節之中，把它們創造出來，希望是不多的。這些必須在共同危險所促成的目前團結力量之下創造出來。它們必須在解決共同問題的日以繼夜的努力中，變為可以運用自如實行無阻的機構。

空談在戰爭完了之後創造一架防止經濟戰和促進國際和平的機器，是完全無聊的，除非那架機器的許多零件在力求擊敗敵人的一致努力與共同目標下已經裝配起來。除非我們在一致作戰的目前學會和衷共濟，相互尊重和瞭解外，單靠國際貿易與戰後發展來談全部就業，不過幻夢而已。除非我們今天能夠展開一種與中國一致的共同戰略，試問我們能夠幾個的半獨立種所預測那樣，發展對中國和遠東的規模貿易關係麼？除非我們學會與蘇聯的戰略家和它的政治領袖在共同會議中一致工作，試問我們能希望把蘇聯及其驚人的潛力納入一個將來相互協調的經濟世界的軌道內麼？

我們今天所希望的是：一個聯合國的會議，十二個大國共同計畫的會議，而不是三個少數國家各行其是，指導或僅僅協助別國的會議。我們必須有出一個世界軍事戰略的會議，凡是負有作戰重任的國家都有代表參加到甚至我們會從中國人學會一些東西，他們以少數的物力打得那麼好，那麼久。或者可以從俄國人學會一些東西，他們近來似乎已懂得些戰爭的藝術了。

我們必須有一個共同會議，來糾合聯合國家的經濟力量從事整個的戰時生產，並共同研究未來經濟合作的可能性。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們作為聯合國的成員必須在目前擬訂一些原則，使我們一步步走向解放被征服國家之路時，有所遵循。而且我們必須設立一個若何機構，處理那些與我們勝利部隊逐步推進以俱來的無數問題。如果不然，我們自己便不覺游移於左一個權宜辦法右一個權宜辦法之間，不但在我們努力解放的人民中而且甚至在聯合國本身中間散播下來不平等種族的、宗教的、政治的不平等種子。被世代懷有好意的人們，希望變為空幻，就是這種不平的結果。

第十一章 這是解放的戰爭

我環繞世界所看到的這一次戰爭，正如史達林先生所說，是一個解放的戰爭。它是要把某些國家從納粹或日本軍隊下解放出來，並把別的一些國家從它們的軍隊威脅下解放出來。說到這裏為止，我們都是同意的。我們是否已然同意解放的涵義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東西呢？具體地說，目前一起作戰的二十一個聯合國是否已經同意，認為我們共同的解放任務中，包括給予一切人民以他們一有能力時立即統治他們自己的自由呢？並且給予他們以永久自治必須賴以存在的經濟自由呢？

我相信以上這兩方面的自由，便是我們對這一次戰爭所懷良善信念的基石。我相信我們必須將這兩者都包括在我們作戰力爭的自由概念之中。否則，我敢斷言，我們決不會贏得和平，至於能否打贏戰爭，也是不能斷言。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我在重慶向中外報界發表了一篇書面談話，我在這篇談話中試圖將我旅行全世界所得到的一些結論表明出來。這就是我當時發表的一部分：

我已旅行過十二個國家。我看過英國，蘇維埃，共和國，委任統治地，殖民地，和附屬地。我

看了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和統治以及被統治的方式，其種類之繁多幾乎使人迷惑。但是我已看到若干事物爲我訪問過的各國與那些國家中和我對談過的一切普通人民所共有的。

他們都要聯合國打贏這次戰爭。

他們都要在這次戰爭完了時有一個機會生活在自由和獨立之中。

他們都以不同的程度懷疑世界上佔領導地位的民主國家是否有決心，並負責實現其他人民的自由。這樣懷疑損害了他們參加我們這一邊的熱情。

現在如果沒有這些普通人民的真正支持，打贏這次戰爭就將士二萬分困難。要想贏得和平，更幾乎不可能。

這一次的戰爭不僅僅是作戰部隊的簡單的技術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場爭取人心的戰爭。我們不但要保住英美，非特東亞和歐洲的世界大約四分之三的人民同情心，並且要把他們的積極的，進取的，攻擊的精神，一齊運到我們這一邊來。我們還要做這事，並且現在也沒有這樣做。我們非做不可了。

人們進行並打贏這樣一種戰爭，所想要的不僅是武器而已。他們需要對於未來抱有熱情而且擁有一種信念，就是號召他們作戰的旗幟的雖是燦爛輝煌，光明正大的。目前的真象是：我們作爲一個國家而論，還沒有立定主張，究竟勝利降臨之時我們要力求實現的是怎樣一種世界。

特別在亞洲這個地方，普通人民都感覺我們之所以請他們參加我們這一邊，無非因為日本的統治會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壞。在這個大陸上，西方民主國的行為紀錄頗為長久而複雜；但是人民們，這裏有十萬萬人民，都決心不再在外國統治下討生活了。自由和機會是對於亞洲人民具有現代魔力的字眼，而我們却在逼日本人民，現代世界上最殘酷的帝國主義者，盜用了這些字眼，並且在他們使用之時，將它們腐化了。

亞洲大多數人民從不知道民主為何物。他們也許會也許不會要求我們這樣類型的民主，很顯然地，他們都不準備有人在明後天將民主丟在一塊托盤裏交給他們。但是他們都決心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政府之下制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甚至大西洋兩岸這個名字，都使與我會談過的每一個有思想的男女感覺不安。這些人詢問道，那些簽字在它上面的人是否同意將它實施於太平洋方面呢？我們必須就我們的立場作一種簡單明白的聲明來回答這個問題。此外，我們還必須努力處理一切問題，就是把這樣的一種聲明變為對我們這成萬萬的盟友的生命具體而有療養的計畫。

我深深相信，在大多數美國人心中，這樣一種聲明可能導引出的計畫有些仍然是明若觀火了。

我們相信這一次的戰爭必須意味着一件事，就是一些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那種帝國主義勢必結

東。例如，從今以後，中國的任何一尺土地，除了居住其上的人民外，誰也不應該或能夠統治它。而且我們必須現在這層說，不能等到戰爭完了以後。

我們相信一個世界的任務是，找出某種制度來幫助那些參加聯合國事業的殖民地人民變成自由的國家的國家。我們必須制定明確的時間表，根據這個時間表他們能夠制定並訓練他們自己選擇的政府。我們必須確立明確的保證，在所有聯合國共同執行之下，使他們不再陷入以往的殖民地地位。

有些人說，這些羅旨在得到勝利以前不應該討論。真理恰恰相反。現在尋求進步的解決方法的艱難努力，可以對我們的鬥爭發生更大的力量。記住，凡是反對社會改革的人永遠是藉口現在的危險來鼓吹拖延的。要知道戰爭以後，那改革就會太少和太遲了。

我們必須在各國中間發展貿易和通商道路，其規模之強大應該足以給一切人民以同樣在和平時可得到的利益，就和我們在美洲所得到的一般。

在美國，我們現在爲了粉碎動心不得不暫時捐棄我們的個人自由與經濟的自由，我們戰後必須恢復這些自由。確保我們一定恢復美國傳統生活方式並使大家享受日漸增高的生活標準，其唯一途徑便是創造一個到處的人民都能自由的世界。

這一片談話引起了很多的批評。有一些是憤怒的。但大部分的回響却使我非常高興。因為它證實了我的那種感想，就是深巨的輿論潮流，薄地但有力地起着作用，已然進步到我們的許多領袖們對這些問題意見的前頭了，而且它在不久以後會促使我們在世界面前公開承認我們的最堅決的信念。

在我們所存的人們中間，有一種大的誘惑，就是把一個戰爭的目標縮小起來，說，我們會希望我們所使用過的大言英語，到了議和桌上就變得小些，希望我們能避免那些爲樹立與保障一切人民真正自由所必需的鉅款而艱難的調整工作。

從非洲到阿波斯羅，許多與我接談過的男人和女人問過我一個似乎變成全亞洲的象徵的問題：印度怎樣呢？我本會到印度，我不開討論那個複雜的問題，但是有一層是我應該報告的。從羅蘭斯以後，它隨時都留在我的心中。在印度的，一個最聰明的人向我說：「當印度要求自由的希望給推延到一個未來的某時候，損失了遠東人民熱心的不是英國，而是美國。」

他向我說：由於我們的對印度問題保持鐵腕之故，我們曾經大大地損壞了我們在東方享有的好意。東方願意傾賴我們的，像傾賴來，當我們到印度問題的溫度中，他們不能斷定戰爭終了時關於東方另外幾萬萬民衆，我們想如何想法，從我們的空河游後的談話中，他們不敢講，我們是否真正主張自由，或者我們對自由作何解釋。

在中國，從他們的審庭流亡出來一千英里的學生們向我，聽後我們是否還要訪問上海，在貝魯特種

黎巴嫩的人民向我們僱傭者美國布魯克林地方的總統選舉世界主席三空之一黎巴嫩人住在美國，是
否會幫助勝派英法佔領戰後退出敘利亞和黎巴嫩，並且讓他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非洲，在中東，在整個阿拉伯民族的世界，以及在中國和全部遠東，自由的意味就是逐漸地恢復
照預定程序地廢除殖民地制度。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這是事實。

不列顛國家協同體就是世界出這樣一種程序的最彰明昭著的事例，那一個偉大的試驗之成功，該應
是對於聯合國最大的鼓舞力，促使它們處理以後的自治政府問題。世界大部分還在殖民地制度統治
之下，儘管有這個協同體，英國還有許多殖民帝國的殘餘，有的有一點，有的完全沒有自治可言。——
雖然英國國內和協同體內有成千百萬的人民大公無私地並且以極高的智慧力求縮減這些殘餘，擴張協
同體來代替殖民地制度。

英國決不是唯一的殖民地統治者，法國還號稱擁有在非洲，越南，南美，和世界許多島嶼的帝國。
荷蘭人也仍以東印度的一大部分和荷屬東土的非洲島嶼。葡萄牙，比椰時，和其他國家還是存有殖
民地的。而我們自己雖已負起責任，但對全部西印度人民並沒有允諾給以完全的自由。

除此以外，我們還有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

但世界終於醒悟了，一國的人民統治他國的人民，並不是自由，也不是我們應該從再戰爭來保全
的。

我們盼望前途，棘手問題還多得很。這些問題因委任統治地和殖民地之不同而各異其趣。並不是全世界上一切的人民都有了在明後大實行自由的準備，或已能保衛自由了。但是今天他們都需要有一個日期作爲努力的目標，和一種保證，證明這個日期必定信守不渝。他們並不請求我們在將來替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既不是如此愚蠢，也不是如此意志薄弱。他們所需要有一個機會藉經濟的和政治的合作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因爲世界上的人民希望自由，不僅是爲了他們政治上的滿足。也是爲了他們經濟上的發展。

第十三章 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

我談到世界上的帝國主義時，還提到我們自己國內的帝國主義。這一次戰爭已經給我們打開了新的景象，我們一向是個以致力國內事業爲主的國民。我們現在却已變成一個把最大興趣放在海外的國民了。俄國的、緬甸的、突尼西亞的，中國的城鎮名字在我們的報紙上最吸引人的注意。最熱烈期待的信件是從分布在澳洲、新幾內亞，瓜達康納爾，愛爾蘭或北非的我們青年們寄給他們家中的信件。我們的興趣跟着他們的興趣走，而且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全世界各地打完仗後，回家時已不是有地域性的美國人了。他們也不會這樣看我們了。這一切都是什麼意味呢？它的意味是，我們雖然是隨着較早的那一次世界戰爭開始興盛起來的，但現在纔完全從一個關心國內事務的青年國家變成一個具有國際興趣和世界眼光的成年國家。

一個真正的世界眼光，是與一個外國帝國主義——無論統治的國家心裏是如何高尚——相背馳的，它與一種可能在國內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也同樣不相容。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字眼。如果我們要享受它，爲它而奮鬥，我們就必須準備把它擴張到每一個人身上，無論它是富是貧，與我們的意見是否一致，也無論他的種族和膚色是怎樣的。我們自己如果沒有決定使所有住在美國的人自由，我們就

不能懷着好的良心希望英國確立一種解放印度的具體程序。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已與四萬萬中國人再結盟，並將三萬萬印度人民看成我們的朋友。和我們並肩作戰的還有菲律賓人，爪哇，東印度和南非的土人。合計起來，這些人差不多佔了世界人口的半數。大多以美國人與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都沒有種族的聯繫，但是我們從這次戰爭中懂得了一件事，就是把人羣結合起來的並不是種族的劃分也不是人類學上的考慮，而是休戚與共的觀念和相互接近的目標。

我們懂得一個國民的考驗是看他們的目標，而不是看他們的膚色。縱令希特勒的高不可及的種族壁壘，也因為承認與「名譽上的亞利安人」（日本人）有共同目的之故，而被衝破。我們也有我們自然的盟友。我們從今以後必須以我們民族的命運和一切其他民族的命運合為一致，不管他們的種族與膚色怎樣；祇要能把自由視爲他們自己和他人的天賦權利。我們從今以後必須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共同擁護那個造成世界上戰艦不絕無寧日的帝國主義。

讓我再強調一句：種族與膚色並不在這次鬥爭中什麼人是友，什麼人是敵。在東方我們便有一個鮮明的例子：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因為它對較弱國家施行野蠻暴虐的侵略；而且標榜一種帝國主義學說；設法統治並奴役全世界。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因為它用險詐而未經人挑釁的攻擊來發動它每一次進攻，遂行它的征服計畫。

中國是我們的友人，因為它像我們一樣不存征服的迷夢，而珍視自由。它是我們的盟國，因為它爲各國中首先起而抵抗侵略和奴役他國的。

這裏是兩個東方民族，一個是我們的敵人。一個是我們的友人。種族與膚色和我們今天所力戰爭取的事物沒有任何影響。種族與膚色並不能決定我們要站在那一方面作戰。這也就是白種人在這次戰爭中學會的事。這些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事。

甚至於我們的敵人日本都會覺悟過我們的種族自滿心。它曾粗魯地喚醒我們注意一件事，就是：白種人並不是一個上選的種族，也不僅僅因爲它過去的進步和飛達而享有什麼優越的權利。一年半以前我們一般都看不起日本，認爲它不是一個可能的敵人。現在我們却要承認。我們已遭遇到一個可怕的敵人，非集結我們的全力不足以應付了。

我們的盟友中國也教育了我們一種新的健全的謙讓精神。我們已看見它曾猶地，沒有任何現代的裝備，抵禦着那個同一的可怕的敵。歷五十年之久。在今天，我們還準備負起的全然責任之時，它的人民始終不懈的抗戰。白種人生活着的精神氣圍在改變中。它不但在我們對遠東人民的態度中改變，而就在我們國內也改變了。

對於國外的世界存有帝國主義企頭是好久以前的事，但是我們一向在國境以內還因襲着等於種族帝國主義的事物。美國國內膚色的公民對於黑人的態度還具有一些不令人快愉的帝國主義的特點——

一種種族的優越感，和一種嚴密保障的人民的慾望。我們向自己解釋說，這種結果終是仁厚的，而且有時候也的確如此。但是有的時候它的結果也正是帝國主義的，並且它存在其中的精神氣氛，是和人們談起一個人的負擔字時的氣氛，沒有二致。

不過那種氣氛正在改變之中。今天凡是深思熟慮的美國人都一天天明瞭，我們不能同時打響帝國主義的勢力和觀念而又在國內保持着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戰爭對我們的思想起了這樣的作用。

美國國內的有色人種得解放還是以一種戰爭的措施而實現的。這是一個軍事上必要的措施。它顯然沒有戰爭也會在一種緩慢的人道主義的改良與社會的啟蒙過程中來到。但是現在却由於一個殘酷的戰爭總將這個人類自由問題提出，非加解決不可，而這個從奴隸方面打破枷鎖的過程，僅僅在一小時以內便完成了。我們現在可以見到，在這個當前的衝突的壓力之下，歷史悠久的壁障和偏見，正在一一瓦解。由於我們的民主抵抗外來的威脅，使着它在國內未能貫徹之處更為彰明昭著了。

我們自己所宣布的我們所力戰爭取的究竟是什麼，這還表示，已使我們自己的不公允處暴露出來了。當我們談到一切國家的自由和機會時，我們自己社會中滑稽的反常現象就變得太明顯以至無法忽視了。如果我們要談自由，我們的真意必須是其他人們和我們享有同樣的自由，我們國境以內與國境以外同樣的自由。在戰爭中間，這一層尤其重要。

現在戰時，對於種族的，宗教的，甚至政治的少數人口的威脅，是從兩件事發生出來的：一、羣衆過度

激烈要求與多數人口所享選舉取得一般的平等，以及在緊張的情感下悠久的種族與宗教之不信任心的復活。於是少數人口往往是被謀負起戰爭本身以及一切由它而生的脫節和不舒適現象的責任。他們往往被人用嫉妬的心情來研究，究竟他們應否享有各種特別的好處。

我們都熟知一種積習，就是在戰爭心理之下，不平常的人物總是被猜疑的；不正統的事物總被認為與敵人的陰謀有關。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在任何社會中都會發生。我們在一八二二年的戰爭中有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青年被捕了，理由是他有間諜嫌疑，因為「他手持一條厚鞭，褲子上繫着多得出奇扣子。」每當事情不順當的時候，公眾自古以來總是找尋一個代人受過的羔羊，而第一個找尋的地方便是在少數人口中。

倘若我們沒有看到一度似乎是開化的國家中竟有許多執迷不悟暴戾恣睢的事例，倘若——這一點更加嚴重了——我們已經在我們自己的國家中沒有眼見一種潛滋暗長的反猶太主義，那麼，以上這些話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中說來未免可笑。最好我們是不斷地記在心中，我們今天所戰鬥的，是爲了反對偏狹與壓迫，如果我們失敗，這些現象將無可收拾，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象在國內滋長，而我們祇埋頭在國外打敵人，那末我們也要大大削弱我們的戰鬥力。

我們的國家包含着不祇一個種族，一種信仰，或一種文化遺產。它是一個差不多三十個民族的大集團，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哲學和歷史背景。他們之所以結合在一起，是由於他們對我們，在民主制

度的信任，這些制度就是表明在「獨立宣言」之中，並由憲法保證給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的。

我們這個各州合衆國的公調是自由——每個人依照他所選擇的對象去崇拜，依照他所選擇的對象去工作，依照他的意思去生兒養女。自由，如果是爲了一切人們的，就必須用可以最普遍給與的基本保證來保護它，而且任何人都不能要求侵犯別人權利的特權。儘管我們有許多乖張的官僚機構，我們有時雖有過度多事的立法，還有——可悲的但幸而是孤立的例子——取締券民法。不過，我們在美國這裏，在一個半世紀多一點的經驗與調整過程中，竟然得到了有史以來未有過的最合理的自由的表現。

從整個國家來說，我們至今爲止所得到的成功，並不是由於我們建設了許多大城市大工廠和開墾了大塊的土地，而是由於我們促現了一切物質發展所依恃的這個自由的基本保證，以及容納了和學會利用了我們多種多樣的特點。

我們依然是一個比較新興的國家。僅僅二十年前，我們半數以上躡山和全部工業的三分之一還都是由海外來的移民經營。我們好幾個主要的農業州農村人口半數以上是外僑生的。

在一八二〇至一八九〇之間，我們的國家還在形成期內，有一千五百萬「新客」到達我們的海岸，其後一十四年間，直到上次世界大戰爆發爲止，來到的人更比這還多。換句話說，我們在兩百年歷史中不斷得到移民的生力軍，帶給我們新的血液，新的經驗，新的思想。我們創造成了一個強大的國

家。因爲這些新來到的人並沒有各走極端，在我們的政府形式之下，不斷紛爭擾攘，而是都無影友一設，共同從事整個的建設與鞏固的工作。在我看來，我們的文明的光輝，並不發自我們的大規模生產的工場，我們的發明，或我們任何偉大的貨物的發展，而發自一個事實：即各種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種族支派的人民能夠在美國這裏以共同瞭解，相互尊重和守望相助的精神生活在一起。

如果我們要看一看與這種美國制度相反的爭例，祇要看希特勒的軍事暴虐，日本的專制，和日寇西山的義大利獨裁便可以了。過去十年間德國的歷史，就是種族與宗教的偏狹迫害的歷史，在這個假面具之下，一個口口聲聲講和平的獨裁者起初引誘人民虐待少數人口，後來誘致他們參加戰爭，這一種偏狹心理成了德國一種完全講紀律服從的暫時的力量。實際上，它從根破壞了並削弱了社會結構，因而戰事一日逆轉下來，崩潰是會突然而且全盤實現的。

我當時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完全不談任何人道主義或正義或強者應該保護弱者這一類情感的理由，僅僅就常識而言，也應該毫不放鬆地保障少數人口的權利。因爲少數人口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寶貴財產，任何極權主義政府消受不起的財產。獨裁制度必然不可避免地害怕他們，取締他們，但是，在一個民主制度的包容之下，少數人口經常是新觀念的泉源，鼓舞着新的思想和行動，是一種的活力的經常的泉源。

取締少數人口的思想把少數人口表現，是會將社會凍結起來，阻止進步的。因爲多數人口的本身

是受少數團體的存在激勵着的。人的心智需要相反的表现來考驗。

我們現在在任何時期都更要在心頭上牢記一個事實，就是無論什麼時候我們若奪去我們所憎恨的人們的自由，我們便是打開一條路徑。從而喪失我們所喜愛的人們的自由。

我們在美國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強韌的但微妙的結構。它是許多紗線交織成的。它是數百年來經由無數愛好和平的男女以耐心和犧牲織成功的。它可以充當一件大衣，包含保護着貧的富的，黑人白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僑生和土生的人。

我們千萬不要撕碎它。因為它若毀掉了，誰也不知道何時何地人類可以再得到它的護體的溫暖。

第十四章 天下一家

僅僅在一個短短時期以前——不到二十五年以前——協約各國纔勝了當時德意志帝國所領導的征服與侵略的軍隊，獲得一次顯著的勝利。

那一次戰爭之後應該接踵而來時和平，竟告失敗，這主要的原因為人們心目中沒有把握住可以奠定和平的共同目標，因之世界和平就不可能實現。國際聯盟在分崩離析中創造出來；無論男人女人，除了擊敗一個共同敵人外，並未展開一致的目的；爭論不絕的禍是關於它的組織形式而已。此外，國聯之所以失敗，因為它主要是一種真誠的解決方式，在極端立異的各調之下保全真摯的殖民地帝國主義罷了。它對於遠東方面的迫切需求並未加以適當考慮，又未充分尋求將個世界經濟問題解決之道。它解決世界問題的企圖主要是政治性的，但是政治的目標主要沒有經濟的國際主義，不過是沙漠上築起的房屋。理由很簡單，沒有一個國家能靠自己實現它的最大限度的發展。

我相信在美國自己的歷史中也可以找出我們失敗的另一個線索。依照今天所進行的一切事物看來，我們的最顯明的弱點之一，就是我們的外交政策缺乏任何持續性。即使在過去短短四十五年之間，我們的兩大政黨沒有一個說得上是曾實行一種國際合作之穩妥或堅定方略的。每一黨都有它一個時期的

世界眼光——有些時候是帝國主義的——，也有它一個時期的嚴格的孤立主義。在野黨的國會議員依循美國一貫的政治慣習，不管是非如何，總是反對執政黨的方略。

然而若干年來，兩黨之中又都有許多人士承認，如果和平，經濟繁榮，以及自由的本身要在這個世界上繼續不輟，世界各國就必須找到一種經濟安定與共同努力的方法。

這些希望在第一次世界戰爭終了時，在威爾遜主持之下，產生了一個國際合作的方案，冀圖保障所有國之經濟軍事穩定，保護少數民族，並給與未來一個世代一些信心，相信它們能夠各得其所，各理其業，不至再來一次生靈塗炭的戰爭。不幸我們對於那個方案的細節如何想法，它的確是謀求世界和平的一種迫切的肯定的行動。倘使美國當時能支持它，影響它，以及參加進去，它的效果如何，我們是無法斷言的。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是我們試着走了相反的道路，而其結果是一無所獲。我們走進了一個對世界時事採取最嚴格孤離態度時代。我們的許多公眾領袖，有的是民主黨的，有的是共和黨的，到全國各地大聲疾呼，為我們被罵捲入七次的大戰，我們的理想已遭背叛，我們再也不准讓自已陷入世界政治的旋渦，而不可避免地走上另一次武裝衝突。他們認為我們得天獨厚，有天然的屏障，用不着關切我們國境以外那個極世界的複雜而不合胃口的任務。

我們用過高的關稅壁壘把自己摒諸世界貿易之外。我們對於歐陸的局勢不再干與，儘管德國重行武

裝起來，我們對歐陸的命運也不表示關懷。當歐洲的民主國家，除了德國落在行列以後外，都剛剛開始從顛盡它們活力的經濟蕭條中復甦起來時，當外匯的波動依然是完全復甦的主要障礙時，我們破壞了倫敦經濟會議，在這些舉動之中，我們犧牲了一個優良機會，來領導民主國家的強化與善後，保障它們免受侵略勢力的攻擊，而這種勢力當時正在方興未艾。

這個責任不能單獨歸咎於任何一個政黨。因為兩大政黨並不是以一個作為具有世界遠見的黨，另一個作為孤立主義的黨，而判斷堅定地絕對地立於美國公眾面前的。如果我們說共和黨政府在一九二〇年被壞了國際聯盟，我們就必須加上說，一九三三年使倫敦經濟會議折台的正是民主黨政府。

我曾是一個相信國聯的人。不過在這時候我一面不願對國聯的計劃加以褒貶，而却要指出我們美國這方面促成它失敗的各種步驟。因為這道論辯可以提供一個完備的例證，證明我們作為一個相信自由世界，公正世界，和平世界的民族，如果要完盡我們的責任，必須避免怎樣的一種領導的類型。

威爾遜總統沒有徵求參議院中共和黨領袖的意見，便在凡爾賽談判和平提議，他替民主黨包辦了這些事，因而在戰略上促使許多共和黨黨員——即使有國際頭腦的共和黨黨員——採取了反對的立場。他回國後，和約與國聯條約便提交美國參議院批准。於是發生了美國有史以來最戲劇化的事態之一，我在這裏不能詳細追述那一次結果使美國自己摒棄領導權的鬥爭經過。不過，今天對我們重要的事，是記住那幅圖畫的輪廓。

首先是參議院中所謂「死營」，或「決不讓步者」，或「幹到底」的一派議員。這一派是沒有政黨面孔的。他的首腦人物中有一個民主黨的演說家里德（James A. Reed），其地位的顯赫，與共和黨的波拉（Boyer）並駕齊驅，在另一個極端便是不妥協的戰時總統威爾遜，他以全付精力堅持要通過和約。在他們兩個極端之間，站着各色各樣的保留主義者，其中共和民主兩黨的人都有。

我們在今天不知道，恐怕永久也不會知道，當時參議院中的共和黨領袖洛洽（Henry Cabot Lodge）——現今我們常把他的名字與打敗國聯連繫在一起的——究竟是真地主張在若干保留條件之下贊成國聯，還是他藉着那些保留條件來消除國聯。縱便是他的至好朋友和他的家屬對這一問題意見也不一致。

但是我們的確知道，當這個問題從參議院轉到一九二〇年兩大政黨的年會上時，沒有一黨全部贊成或全部反對總統帶回國來的和約。民主黨大會的宣言中並未反對保留條件。共和黨大會宣言採取了一種妥協的語調，那種包容的程度甚至足以適應共和黨中堅決支持國聯的人。反對國聯的與會代表在這宣言之中也可以找到安全的立足點。

兩個宣言都是曖昧的。兩黨關於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問題都沒有堅定的歷史性的立場。加上當時共和黨候選人哈定的態度，他是和藹，愉快，但沒有堅決信念的人，這越發將這藉端弄得糊塗混亂起來。沒有疑問，民主黨方面的柯克思（Cox）是相當明確支持威爾遜和約的。雖然該黨的宣言也登

有保留條件的可能性而且許多民主黨領袖是強辯反對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敢說，究竟哈定是真正地鑿精會神打擊國聯呢，還是他存心在常選之後，再加以修正而支碎它。當時所能明瞭的，是牠感覺，既然國聯是民主黨所主張的，他就不能不加以反對。但在私人談話時，他却唯唯否否，投人所好。二置到選舉票收齊了以後，哈定竟坦白地對國聯「現在已經完結了」。

很滑稽的是，那一次決定選舉的爭執，主題在於別的一些問題。要在大選中加以測驗的美國與世界合作這個大事業，竟因兩黨的誤會而爲地中間的障礙。民主黨及其領袖湯遜企圖鞏固國際地位，共和黨則極力阻撓令其本身在戰略上被動。反的方向。現在時機到了，我們必須再度決定美國是否要在世界局勢中採取適當的立場。這問題在哈定決定時千萬不可再取決於買辦的戰爭的戰略了。

我所滿意的是，美國人民後來沒有接受一種國際合作方案的置之不理。他們對於哪個凡爾賽條約可能預其有修改，但並非完全不理其他國家的努力。他們祇是受那些沒有信念的，一味想着大量選票與一黨利益的領袖們欺弄了。

如果說在下次大戰之後，我們置身於世界事物之外，是促成這次大戰以及過去二十年間經濟不安定的一個因素——顯然事實是如此的——那麼，在這次大戰之後，我們若置身於世界問題與責任之外，結果簡直會無法收拾。即使說我們在地理上享有相對的孤立，這種孤立現在也不復存在了。

上次大戰終了時，不會有過一架飛機飛越大西洋。今天那個大洋不過是一根絲帶而已，經常有飛機

航行著。太平洋也不過是天空的海岸上一條略微寬些的絲帶。歐洲和亞洲都立在我們的大門口了。

這次戰爭以後，美國必須在三條路中選擇一條：第一，狹隘的國家主義，那個不可避免的含義就是連我們自己的自由也要完全喪失；第二，國際帝國主義，此其意味，就是犧牲若干其他國家的自由；第三，創造一個每一種族每一國家機會都是平等的世界。我相信美國人民將以壓倒的多數選擇最後這條路，要使這一選擇發生效果，我們不僅要贏得這次戰爭，還要贏得和平，而且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贏得它。

要想贏得這個和平，在戰前來有三件事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我們現在必須在全世界的基礎上策劃和平；第二，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國家方面還是人民方面，世界必須自由，和平纔可以在其中存在；第三，美國必須擔任一個積極的、建設的角色，使它自由並維持它的和平。

我說和平必須在全世界基礎上加以策劃，我的意思是很嚴格地說它應該包含整個地球。大陸和海洋從空中看去，如雲所會看到的。明明白白是一個整個的局部。英美是局部；蘇聯、中國、埃及、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也都是局部。無法避免，除非和平的基礎在全世界所有各部都安若磐石，否則世界任何一部分也不能有和平。

這單靠我們的領袖們的宣言，例如大西洋憲章裏面那樣的，決不能完成，它的完成主要是靠世界上各國人民能夠接受它。理由很簡單，如果第一次大戰以後，獲致國際諒解的失敗給了我們一些教訓，

那個試訓便是這樣的。即使戰爭的領袖們在戰爭進行之際表面上同意了這些廣泛的原則，並且他們樂到和簽訂。他們便依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去解釋他們自己的宣言了。所以除了在今大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英、美、蘇、中以及一切其他聯合國家的國民在他們的目的上得到基本的同意，否則漂亮的理想主義的希望表示，如本大西洋憲章中所有的，在不過和威爾遜先生的「十四點」一樣成爲欺世盜名的歷史去歸罷了。四方自由是不會因那暫時當權的人們的宣言而實現的。唯有世界上的人民把它們認成爲實際存在的東西，它們纔會變爲真正的自由。

當我談到想和平世界必自由時，我僅僅是報告說，有一個偉大的歷程已經發見，沒有一個人可以當然不是有特勤——自強而中它。全世界上的男女都在適推中，體力上，智力上，和精神上都是如此。經過了千百年的宗族無知，俯首貼身的生活之後，東歐和亞洲成億萬的民衆正問響本了。舊日的恐懼不再而懸在他們了。他們不再甘心爲西方的利益充當東方的奴隸。他們開始懂得全世界人們的幸福是相互依賴着的。他們已經下了決心，我們也必須如此，不讓他們自己的社會中存留帝國主義的餘地，正如不讓國際社會中存留一樣。一座屋上的大廈，四周都是湖牆草屋，那種景色已經失掉，令人迷戀的情調了。

我們的西方世界和我們預想的優越地位，現在正在受審判。我們的浮誇和一切大言壯語徒令亞洲心寒而已。蘇聯、中國、和東東的男女人民現在已經意識到他們自己潛在的力量。他們漸漸知道，關於

世界前途的許多決定操在他們的手中。而且他們希望這些決定將使每一國家的人民從外國的支配下得到自由，自由地從事經濟的，社會的，精神的進步。

經濟自由是和政治自由同等重要的，人們不但應有機會得到別國人民生產的東西，而且他們自己的出產也應有機會達到全世界人們的手中。除非我們找到方法使我們能打破妨礙貨物流通的不必要的貿易壁壘，否則不會有自由，不會有真正的發展，不會有經濟的安定。戰爭一完便突然毫不妥協地把關稅廢除，祇能造成災厄，那是彰彰明著的，但是我們所爭取的自由之一，正是貿易的自由，尤其非常顯然。我知道有許多入，特別是在美國，我們的生活標準比世界其他地方都高，他們對於這問題還景真。是驚慌失措，他們相信任何這樣的步驟都會降低他們自己的生活標準，然而真理恰恰相反。

美國的發展是許多原因造成的。我們國家富源的豐厚，我們政治制度的自由，以及我們人民的特質，都有其貢獻，毫無疑義。但是依我的判斷，最大的因素是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碰到了好運氣，美洲這個地方竟成功為世界上最大一個區域，在其中開貨物與思想的交換都沒有什麼障礙。我願意向那些懷疑這個人海關一個不可逃避的事實。我們的國貨在這次戰爭終了時將達到怎樣天文學上的數字，而且這個世界又因工業與運輸之發展大為縮小，因此除非貨物在全世界上更自由的交流起來，即使我們美國現在的生活標準，也不能維持。同樣一個不可避免的真理是包括世界上任何一地的任何一人生活標準提高起來，也就是在某種輕微的程度上提高了世界各地一切人們的生活標準。

最後，當我說這個世界要求一個具有自信心的美國全部參加進去時，我祇是轉達東方人民給我們的一個結果罷了。他們喜歡美國和其他聯合國家在這次大冒險中作他們的伙伴。他們要我們和他們一致來創造一個新的，由獨立國家所構成的社會從西方經濟的無道與東方政治的乖謬下同樣自由出來。但是在那個偉大的新團結中作伙伴，他們要我們切勿猶豫法懼。他們需求毫不猶疑，敢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非正義現象仗義執言加以糾正的伙伴。

我們的東方盟友知道我們要胡盡我們的富源進行這次戰爭。但他們希望我們現在——而不是戰後——使用我們的鉅大的給與的能力來促進自由與正義。其他還沒有作戰的各國人民還在同樣熱烈地期待我們接受這個有史以來最寶貴的機會——幫助創造一個新社會，使世界到處的男女都能在獲取獨立與自由的活力之餘，生活並且壯大起來。

譯者跋

本書全文譯畢將要付梓之時，忽得友人自美來函，說威爾基在本書最近的一版中加入了另外一章，記述他這一次週遊世界中間各地華國傳教士給他的細象，因此全書增爲十五章了。

這個新的一章原文尙未收到，待收到後當於再版時補譯進去，但有幾段扼要的話，先譯誌如下。

首先，威爾基認爲他們都是從事於「爲美國獲致好感的事業」，他們「對於未來的希望，無論是美國的還是其他國家的希望，都是關係極大的。」

他在這一章中寫道：「我在每一個地方問到人們，如果這些外國人侵入他們的國土，他們是否憎恨他們呢？答案是一致熱烈歡迎美國傳教士所做所爲的一切，以及他們所領導的生活。……（他們）到處都激起一種受教育的渴望。……當希特勒要驅使他的人民作戰時，他是將書籍焚燬了的，我們是要致力和平，就必須將所有書籍打開。……」

「中國，……現在正進行着一種教育的革命。……由於這一個程序，中國今天纔一反過去那種盲從的羣衆社會，而成爲願爲自由的將來而戰鬥而犧牲的民族。這一種工作，美國的傳教士是一向苦心孤詣，努力不懈的，也就是所謂領導也者的一個好事例。」

「傳教士的本身就是領袖。他們教育人們怎樣造成他們自己的領導者……啟發一種幸福、自動、與自尊的意識……我想美國能在世界各地獲得好感，這是主要原因之一。」

「天下」家原書出版後銷行之速，之多，已打破近年來美國出版界的紀錄，這是人所盡知的了。此外，關於本書的反響又有一件很值得報告的事，就是當代美國書評的權威「戰時圖書評議會」(General Board of Books and Writers)已於五月六日決議將它定為「戰時必讀」。

「戰時圖書評議會」是以下五個人組成的：退任海軍上將節露爾，紐約時報書評版編輯亞當斯 (D.D. A. Jones)，紐約先鋒論壇報書評版編輯多連 (I. Van Doren)。星期六文學評論編輯勒夫 (A. L. Lyman) 步兵雜誌主編格林 (J. I. Green)。

五月六日該會邀請紐約許多著名作家，新聞記者，批評家，出版家，參加一個招待會。節露爾代表該會贈送威爾基一本特別用皮面裝璜的「天下」和一個很大的地球儀，並朗誦該會對威爾基的褒狀題字，全文如下。

「給威爾基先生 一個政治家。他以他的才幹，他的道德的勇氣，他對全世界及其希望的直接知識，他對走向公正永久和平道路的確大眼光，對於他的國家完成了一個偉大的業績。」

「威爾基先生在他所著「天下」一書中給了我們關於許多盟國領袖人民和他們對未來希望的一個生動的圖畫，這本書的出版，在我們對國際景象的態度上是一個確定的轉捩點，一個新的

出發場所。它現在所受到的順利反響，和它將來之成爲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是和這次戰爭的最後勝利，同爲不可移易的。戰時圖書評議會指定本書爲「必讀之書」，是與威爾基先生同樣感覺光榮的。」

威爾基氏於接受褒狀之餘，曾致簡短的答詞說：「我的生命充滿了快慰，以至不能令人相信」，而對他這本書的評語，尤其引爲「至高無上的快慰」。

本書中文版因翻譯時間意外地延長，而使讀者至今纔能見到，這是要聲明抱歉的。譯稿中除了一二語句爲了很明顯的原因略去以外，自信是做到盡量忠實的程度。孫伏園先生審校全稿，朱寰光先生和蕭餘先生協助翻譯一部分，都應在此聲明致謝。

一九四三，七，一〇。劉季棋於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天下第一家全一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原著者 威爾基

翻譯者 劉尊棋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發行人 孫伏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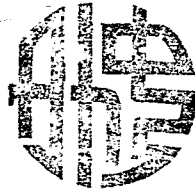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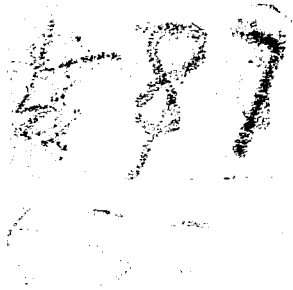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重慶上清寺美專校街一〇六號

重慶南岸馬鞍山三十一號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八五三號



定價

90.00

乾
人生的財產